

● 李静 廖心文 编

周恩来交友录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周恩来交友录

疾风知劲草 患难见真情

周恩来与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年），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与领导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1934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6月就义。主要著作收入《瞿秋白选集》和《瞿秋白文集》。

——编者

瞿秋白与周恩来，同是江浙人，都是由破落“仕宦之家”的逆子贰臣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与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创时期和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俩建立起了政治目标一致、革命策略相通、自觉舍己为人民的高尚友谊，一直被人们赞颂，传为美谈。1946年3月周恩来给瞿秋白幼年挚友羊牧之的信中写道：“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周恩来同志用“耿耿丹衷，举世怀仰”八字以对先烈瞿秋白光辉品格的赞颂，其实也是周恩来同志毕生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两人间崇高革命情谊的精辟概括。

瞿秋白与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最先表现在大革命时代，为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志同道合，彼此呼应，通力协作。

1920年6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在中国，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等人，都是较早率先响应并实行这一指示的中共党员。瞿秋白曾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的领袖地位”。同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起了领导作用。周恩来后来回忆道：这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周恩来刚自欧洲考察归国，即欣然接受党的派遣，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国共合作促成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与瞿秋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以后，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认识的一致，他们的革命友谊与日俱增。会后，周恩来回到广东黄埔军校，参与领导了广东革命军征讨旧军阀，使广东全省成为统一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且，早在1925年11月，东江平定，广东基本统一时，周恩来就明察秋毫，发现蒋介石已表露出了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特地从汕头前线赶回广州，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另组国共合作部队。但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专横独断，反对这一计划。1926年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这一重大阴谋活动，周恩来对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大义凛然的周恩来面前，蒋介石只得将扣押的人释放。

与周恩来在广东战斗的同时，瞿秋白活跃在上海党中央理论宣传文化教育战线上。他致力于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培养革命干部，批判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的戴季陶主义，同时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在广东进行的武装斗争擂鼓助威。1925年9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明确指出：“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阁的胜利，没有工农的赞助，没有C·P（当时常用C·P作为中共和共产党员的代称——笔者注）的出力，决办不到。”这是党中央执委中，较早肯定周恩来等同志在统一广东斗争中的功绩。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以后继续反叛革命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当时正因肺病住院的瞿秋白，闻讯抱病提前出院，迅急赶到广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量，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9月，他回到上海，作了《由粤回来的报告》。之后，瞿遵医嘱休息时，还对前来探病的中宣部干部说：“在我党推动下，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粟裕等一大批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干部，目前都在北伐军里担任主要骨干。看来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他坚定地说：要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每一战役的胜利；“要进一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参加北伐，支持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是作为党中央执委对周恩来等同志参加并领导北伐的肯定与支持。

同时，共同的历史使命，使周恩来和瞿秋白经常来往于国民革命中心广州和中共领导中心上海之间，联系研究革命工作，两人互相切磋理论，讨论实际问题，展望革命前景。他俩以及与毛泽东同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6年5月至9月，瞿秋白与周恩来，都应邀为毛泽东负责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瞿秋白讲《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周恩来讲《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都深得学员的欢迎。

人们还一直传流着周恩来隆冬赠送瞿秋白以旧皮袍、瞿秋白赞誉周恩来的故事：

“这年（1926）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听说宣传部要随中央迁往武汉的消息去看望秋白。……他一见我就问：‘什么时候就走？’我答以，‘在待命中’。他充满革命的信心，高兴地说：‘不久，我也要去武汉，当前革命形势是好的，就是身体太差了。’他指着身上的皮袍深有感情地说：‘这两天，全亏这件皮袍，这是周恩来去广州时说到南方用不着了，留给我的’。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并称赞他是一位永远不考虑个人安危，永远战斗在第一线，永远体贴和关怀别人的好同志。”

从上面引述的故事看出，周恩来对瞿秋白同志式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在当时处于中央执委地位的领导成员中，瞿秋白对周恩来的舍己为人民、冲锋进击在前线、千方百计为同志的共产主义风格与高尚品德是感慨良深的。这三个“永远”，也是对周恩来一生的真实素描和精神写照。

周瞿的伟大友谊，特别表现在政治危机时刻的明邃的洞察力与处事的勇敢精神。1927年4月，瞿秋白以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身份，与新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沈雁冰讨论编报方针时，就以“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作为宣传的首要之点。瞿秋白还说：“此人（指蒋介石）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又说：“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

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同年4月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兼江浙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掌握到确切情报：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制造一连串的反革命血案。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周恩来就领衔火速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瞿秋白则于五月中、下旬，撰写论文《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和在太平洋劳动会议（武汉召开）上讲话，振臂疾呼：“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与周恩来在党中央工作期间紧密合作，并肩战斗，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正确道路，有效地开展领导工作，为消除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为发现和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建立了不朽功勋。

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与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等人为正式委员，周恩来等为候补委员。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周恩来负责军事部。11月又决定吸收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然而，“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认识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因而在组织上开始了党内的过火斗争，导致了“左”倾错误。

1928年2月，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问题，作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指示。瞿秋白与周恩来一道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

他俩在莫斯科一道正确地处理了一桩诬陷案件。原来，1927年冬，俞秀松、董亦湘等同志在苏联受到王明宗派主义集团的诬陷，被打成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当时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向忠发听了片面之词，宣布“江浙同乡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不坦白就枪毙”。1928年春，瞿秋白、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后，坚持实事求是，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以及瞿秋白、周恩来亲自参加的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否定了这个“同乡会”的存在，为一批蒙诬的同志伸了不白之冤。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大会。瞿秋白除致开会词外，并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政治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虚心听取大会的批评，并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毫不推诿过失。关于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错误理论，本来那时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提出来的。但是瞿秋白却未推诿，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且写进了《政治决议案》。周恩来后来回忆：“‘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在自己执笔起草的会议决议案中勇于批评自己的失误，这种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风格，在我党历史上是从瞿秋白开始的。在大会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等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任总书记。以后瞿秋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在六大以后一段时间内，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是有成绩

的。但是，在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党内还潜伏着的“左”倾思想，在1930年5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又发展起来，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30年夏。瞿秋白经西欧回国。9月24日—28日，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向忠发作了《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在会上，瞿秋白正确地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些”的科学论断。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提出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了立三“左”倾冒险行动，即“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1930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周恩来等参加了会议。

从“八七”会议到1930年冬，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的协调工作，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制止“左”倾盲动主义，推进中国革命发展，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这些历史功绩，为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所肯定。也可以从敌人方面得到反证：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国民政府”发出密令，以当时最高悬赏金额两万元，通缉瞿秋白、周恩来，亦可见瞿周配合战斗效果之一斑。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下，瞿秋白、周恩来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瞿秋白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将近3年没有分配工作。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瞿秋白也于1934年2月到达江西瑞金。

周恩来和瞿秋白都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团成员。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在 frontline 指挥“反围剿”战争。瞿秋白在瑞金主管文教和“红色中华”编务等工作。当时瞿秋白患了肺病，邓颖超从几里路外，亲自送来了面粉、白糖。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营养品了”。而当时，邓颖超也由于病痛缠身而行动艰难。这就更显出了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对瞿秋白的关怀。

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英勇就义于福建长汀后，周恩来对瞿秋白的壮烈牺牲，一直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对他的遗属安慰劝勉。1939年秋，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见她总是抑制不住悲痛，经常哭泣，就劝她“要养好身体，继承秋白遗志，好好为党工作”。并且肯定：“秋白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忘我工作，英勇献身。”“这种崇高精神，是永远值得党和人民纪念的，也值得我好好学习。”他要杨之华坚信：“对党内的大是大非问题，党总是要实事求是地作出澄清的。”这些肺腑之言，使杨之华得到莫大的宽慰与鞭策。后来，杨之华等奉命回延安工作，途经新疆，被反动派下狱。1946年，党中央把他们从狱中救出来，一到延安，周恩来就来看望安慰杨之华，并告诉她：“党中央已经给秋白同志作了很好的结论（指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瞿秋白的结论），你好好看看，你就可以放心了，不要再哭了，保重身体，好为党工作。”

1955年6月18日，秋白殉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主祭。周恩来亲自抬着瞿秋白的骨盒，放进墓穴，瞿秋白同志的英灵得以安息。

* * *

从20年代到30年代，周恩来与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国际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是神圣的、高尚的。它将永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子孙后代所传颂发扬。注《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北京版

(王豪新)

周恩来与陈毅

陈毅（1901—1972年），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因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驱逐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军委书记。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等职。

——编者

1966年6月1日。

夜幕降临了，喧闹的都市恢复了宁静。夏日的繁星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水面上，使整个宇宙显得更加神秘、深远。在外交部劳顿了一整天的陈毅，打开收音机，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正在广播。以大将风度誉满全军的陈毅，仅听两句，竟象突然遭到雷击，朝着快步进来的杜秘书问道：“中央台在广播北大的大字报，怎么回事？”

秘书茫然地摇摇头：“办公厅没有通知啊！”

“我找总理去！”陈毅不等秘书叫车，“噌噌噌”，几步走出院门。

陈毅怎么能不震惊、气恼呢！5天前，聂元梓等人“炮轰”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贴出后，立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当天晚上，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学校局势才得以稳定。今晚突然将这张大字报撒向全国，难道希望在全国引起大乱？！

陈毅是周恩来家的常客，他向警卫点点头，径直走进总理办公室，急不可耐地问道：

“总理，政治局开会了？”

“没有。”周总理招呼陈毅坐下。

“那是撞鬼了！中央台为什么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还说什么‘革命’的大字报？把全国人民思想都搞乱了，都起来反对各级党的领导，究竟革谁的命？！中央台能负这个责任吗？！”陈毅越说越气，一巴掌拍在沙发扶手上。

“你别发火嘛！”周恩来口气平静地说。“我也是刚才知道。十分钟前，康生同志来电话，毛主席赞成这张大字报，并决定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哦，毛主席同意的？！”陈毅惊讶地反问，他见周恩来缓缓点头，竟一时语塞。陈毅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地喝着，大半杯茶水下肚，却没品出滋味。他搁下茶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伸手向周恩来要支烟，大口大口吸着。两人默默坐在乳白色烟雾中，相对无言。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各部委党的领导。

中央文革小组却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陈毅不客气，给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挂了电话：外交部的运动，中央是叫我陈毅负责的，请你不要插手！他事后毫不隐讳地对周恩来说：我看总是有人躲在后面，煽动娃娃们冲锋！真的弄到辱党辱国，对不起，老子要开刀的！

周恩来深沉的目光里分明流露出担忧，他以商量的口吻说道：陈总，如

果身体可以，我想请你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

“为什么？”陈毅惊异地问：“不是决定你去？”

周恩来有无法直言的缘由。就是几个小时前，周恩来把卫皮区司令员傅崇碧请来交待任务：我很快要出国访问。中央决定，C月下旬召开的亚非作家学会会议由陈老总主持。这是一次有国际影响的会议，警卫工作一定要搞好，不能有丝毫差错。

傅崇碧严肃地点点头，掏出笔记本和总理一起研究具体方案。

正在一旁理头发的江青恶声恶气地大声说道，“陈毅这个人，过去是反毛主席的，他这个人很骄傲！”

康生呷口茶水，接过话茬，火上浇油：“是哦，骄傲得很呐，骄傲得不可一世！”

江青巡视着傅崇碧，气势汹汹地说：“你不要看他是个老总，一有机会，他还要东山再起，还要反毛主席的！他是利用亚非紧急会议提高自己的威信！”

周恩夹脸色凝重，仿佛没听见江青、康生的诅咒，语气严肃恳切地说：崇碧同志，这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非常重要。中央把主持会议的任务交给陈老总，你一定要保护好会议。派一个团保护好会场。如果有人冲，失扣起来。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更熟悉他仗义执言、无所畏惧的性格，面对国内复杂的斗争局势，他有心让陈毅回避一下。

陈毅不肯，认为出访还是周恩来合适。周恩来用力握着陈毅的手，深情地摇了摇，说：“好吧，出访还是我去”。顿了顿，又接着说：“陈总，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搞，问题确实错综复杂，我想再提醒你一下：遇事不要急躁，谨慎行事。更不要不分场合地发‘政治脾气’，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保卫措施，你找傅崇碧同志落实一下，既要有防备，又要以宣传教育为主……”

陈毅一点头应承着。

娴静的月亮象技艺高超的摄影师，悄悄地按下快门，把周恩来与陈毅的身影，留在祖国美丽可爱、却又是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党中央对“文化革命”的集体领导取消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均变为执行“资反路线”的代理人受到造反派围攻和批判。

陈毅已经隐约感觉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偏入一条礁牙狰狞、风涛险恶的危险航道！他无力纠正航向，但是，他要坚守自己的指挥岗位，保持稳定。他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过：

“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掉我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

外交系统批判工作组大会，陈毅都去参加。没有“我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等最时髦、最能激起狂热掌声的语言，也没有吞吞吐吐，模棱两可、永远是“真理”的废话，他总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硬是要和稀泥！

当造反派狂妄地直呼其名问道：陈毅，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我决定跟毛主席走！”陈毅一板一眼，毫不含糊：“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陈毅的举动，当然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障碍。有人开始操纵造反派集中火力，向陈毅发起了攻击和围剿。

一个强烈的念头牢牢攫住陈毅的心，他想向毛泽东谈一谈。

1966年8月31日，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成了人海旗林。

天安门城楼上，身穿军装的毛泽东微笑着与陈毅握手，一同走进休息室，关切询问情况后说：我保你！

“主席，我要争取自己过关，我还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是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欣然应允。

自从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特别是11月2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发表后，凡是向陈毅提出邀请的群众集会，他都爽快地答应，并且只要参加，必定讲话。

这天，周恩来把陈毅请到自己的住所西花厅，明确地交待任务：“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讲话。”

“什么？什么？”陈毅惊讶地瞪大眼睛，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叫我不要讲话？！”

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

陈毅愕然。“文革”以来，有不少同志劝他不要讲话，少惹麻烦。总理没有劝过。况且，就是两三天前，周总理还请他出面讲话嘛！

原来，各地涌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如果听任停产串联的势头发展，后果不只是运输紧张、社会秩序混乱，而是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乃至崩溃！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决定：召开一次号召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海报已经贴出去了，数万张入场券也下发了，中央文革坚决反对开会，罪名是“以生产压革命”。明摆着，“文革小组”的决定不容抗拒。周恩来提出：“会议照开，这么多工人集合起来也不容易，就请陈老总给工人同志们作个形势报告吧！”

“可以，我讲！”陈毅满口答应。陈毅非常清楚周恩来的苦衷。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使他始终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他必须执行主席的部署，跟上“文革小组”的安排，不与他们硬顶，因为“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他又必须牢牢抓紧工农业生产等实际工作，尽量减少运动对生产的冲击和影响。因为他是总理，他肩上担着八亿人民的衣食住行。他必须正视现实，光靠革命口号，养不活几亿人民！陈毅日益强烈地感受到：周恩来正以其诚恳与智慧，竭尽全力寻找“向中央”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全力辅佐！

在这次会上，陈毅从国际形势讲到工人阶级的责任，讲到“当家人”要坚持狠狠抓生产，狠狠抓革命。这种发言，当然又遭到造反派的攻击……

周恩来话语充满忧虑，林彪批判了谷牧同志起草的工交系统文革十条规定，说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看样子，余秋里、谷牧同志今后都很难出面讲话了。这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的工作，我总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嘛！一年之际在于春，明年初部长们被围斗不能工作，全年的工作就要受影响了。周恩来见陈毅点头赞同，话头一转：陈总，我想让你带个头，你看怎么样，

“叫我带头向造反派检讨？！”陈毅顿时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我有什么错误？！要学生们顾大局，这话错了？要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坚持

业余闹革命，这话错吗？！只要我说的没有错，我就坚持！我就是不低头，不检讨！？”

“陈总！”周恩来双目注视着陈毅，几乎是恳求了：“就忍了这一次吧！”

“不！”陈毅断然回绝：“士可杀，不可辱！大不了一把刀子。”

接见外宾的时间到了。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陈毅说：“陈总呀。我希望你再想一想。你是外交部长，外事工作一天都不能中断，你要总是被包围、被批判。工作让谁抓？我要管的方面太多，我一个人顶不下整个天啊！”

陈毅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的周恩来，今天明显露出疲倦，憔悴的神色，他不愿再惹总理烦恼，有些含糊其辞地说：

“好！我回去再想想吧，想通了，我来找你。”

几天过去了。这天下午，中央召开例行碰头会议，研究有关运动的问题。

陈毅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每次开会，总是“文革小组”的几位“左派”包场，无限上纲的攻击性言辞，高八度的骂街腔调，令人腻烦。身边叶剑英递给他一张信笺，努努嘴，没吭声。陈毅一看，是首词：

串连炮轰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沙场赫赫旧威风，
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

陈毅提笔批了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绝妙好词！站在最后的感叹号，画得又粗又重，象陈毅伸起的大拇指！突然，他发现叶剑英正震惊、痛楚地凝视着一个方向……陈毅转目追寻过去，顷刻，他也象冷不丁掉进冰水中，坐在斜对面的周恩来，用右手支撑着前额，两只眼睛不断眨动着，眨动着，可是终于抵抗不住，慢慢地合拢了。

“周总理在打瞌睡！”陈毅简直不敢相信！当然，这只是几秒钟的情景。此时，周恩来已站起身，缓步走到墙边，向痰盂里倒掉少许冷茶，又提起水瓶，往杯里添些热水。几步的活动，他已恢复了精力，坐回座位，继续听取陈伯达喋喋不休的质问和声讨。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保持平衡了！他紧紧抵住双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记得有一次在非洲某国访问，长途的飞行，紧张的会谈，再加上炎热干燥的沙漠气候，陈毅直感到困倦不堪，在从机场开往宾馆的汽车里睡着了，周总理右肩托着他，左手不断向路边欢迎的群众挥动致意，精神饱满极了，直到进市区才唤醒陈毅……就从那一次，周恩来建议陈毅戴上副墨镜，凡由他出面主谈时，陈毅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会。但有一个条件：不准打呼噜……

可今天，周恩来竟也打瞌睡了！他实在太累了。

会散了，叶剑英在门口放慢脚步，等陈毅出来，上了陈毅的车。车开动了，两个却心事凝重，沉默无言。分手前，叶剑英握住陈毅的手晃了晃，说：“陈总，我们要分担责任，可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这种形势，没有总理不行呀！”

陈毅凝重地点点头。

周恩来刚进家门，陈毅也推门进来。

“陈总，找我有事？”周恩来见陈毅神情有些异样，亲切地询问道。

“总理，我想通了。我从今天开始，不再放炮。我检讨，一定深刻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谅解和信任，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

周恩来跨前一步，紧握着陈毅的手，激动而又深沉地说：“好！你就带

个头，以大事为重”。他揽着陈毅的肩，慢慢踱着步，叮咛道：“检讨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陈毅告辞时，周恩来留他吃饭。

“不了”。陈毅不忍心再劳累总理，他摇摇头：“张茜还在家等着呢。”走至门边，陈毅又站住了。他转过脸，望着周恩来说：“总理，你要多保重身体嘞！不只是为自己、为大姐，是为整个党，整个国家！”

陈毅喉头一阵发紧，他急转身走出门，让两颗晶亮的泪珠，躲过周恩来敏锐的眼睛，悄悄落在自己的前襟！

外交部天天能与陈毅打交道的造反派头头们首先发现，陈毅近来沉默了。凡向他请示，他一反经常果断干脆的作风，总回答一句话：“等我请示周总理以后再定！”

“陈毅肯定挨中央批评了！”“陈毅只得老老实实写检查了！”外交部造反派的窃窃私语，迅速从各种渠道传向社会，“外院”造反派批判陈毅的调子直线上升，竟然绘制了近百张批判陈毅的漫画，放在学校里展出已不过瘾，一纸“最最强烈要求”递至周恩来办公桌上：立即调拨一节火车，供“革命小将”专用。他们要把批判陈毅的画展运往全国各地展出。同时还强烈要求：陈毅必须滚到外院革命造反派面前低头认罪。

周恩来看到这份名曰请求、实为通牒的信，果断地向秘书布置：“请你安排一个时间，我接见他们。”

秘书迅速翻了翻手中笔记本，为难地说：“总理，今天实在安排不下，一昼夜只有24小时，现在已经排满16个小时了……”

“不行，只能安排在今天，夜长梦多，不能让他们这样胡闹下去！你想法插空，总之，一定要在今天。”

最后，“空”是“插”到了，当然，又插掉了总理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在外语学院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周恩来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的谈话记录，从1966年至1973年8年间共接见二十多次，其中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底，短短30天里，周总理接见外院造反派五次之多，累计二十多小时。有一半的时间，是为了说服造反派正确看待陈毅。当时，六位副总理都遭炮轰，为保护每一位战友，周恩来经受了造反派多少次轮番围攻，强咽过多么大的屈辱，这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周恩来每次接见造反派，陈毅并不出席。接见时的情况，周恩来也从未向他谈起。不过，周恩来每次接见讲话的内容，陈毅却能从造反派的小报上看到。有时候，读着读着，陈毅禁不住痛楚地闭上眼睛。他从字里行间不难想见造反派横蛮无理，咄咄逼人；周恩来苦口婆心、忍气相劝的场面。他常仰天长叹：无论从公从私，周恩来都是我的兄长，不是周总理用自己的身体遮挡着明枪暗箭，恐怕十个陈毅也早被撂倒了。

1967年1月24日下午4时，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广播的学生。

陈毅念着自己的检查——一份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语调沉重，态度虔诚。检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周恩来最后总结：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上的事，让陈毅同志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谢谢大家支持。会场掌声如雷，为总理对外事口的信任，也为陈毅的检查过关。

因为这是第一位副总理被“解放”，周恩来显得兴致勃勃。他拉上陈毅，依次走向大会堂四周各厅，与学生们一一见面。

陈毅军装整齐，胸挺得笔直，步子稳健有力。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他的微笑是严肃的，目光是凝重的，他不象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倒象是卸去沉重的枷锁，准备投身更严酷斗争的勇士。

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的问题，以四位副总理和四位元帅为代表，与林彪、“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会议当晚，周恩来没去“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碰头会上的争论情况——党内畅所欲言本来很正常，他是政治局常委，他一向给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决矛盾的办法。

然而，恶人先告状，历来如此。2月16日当晚，由江青安排，张春桥、工力和姚文元先后走进了毛泽东的书房。他们一番摇唇鼓舌，诬蔑栽赃，顿时激起了毛泽东的雷霆震怒。周恩来力图缓解事态的愿望无法实现了。

于是，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立即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向这批被他们视为喉中鲠、肉中刺的开国元勋，发起了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猖狂围攻。

陈毅被诬蔑为“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组成的一文一武政变中心的穿针引线的人”，“是二月逆流的黑统帅，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在中央生活会上批斗还不足打倒搞臭，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无视周恩来宣布的纪律，将中央碰头会上陈毅等老同志的发言内容大加歪曲、篡改，并冠以“二月逆流”的巨型高帽，通过造反派，向社会迅速扩散开去。

有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的极左思潮被煽动了、助长了，他们集中火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陈毅，并且不择手段地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制造种种事端，企图把陈毅从周恩来严密保护下抢到自己手中，听凭造反派从精神上乃至肉体上批倒批臭。

造反派每回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其实等于陪斗。偶尔总理外事活动无法分身，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并且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从头至尾参加会议，一为保护陈毅安全，二为自己能随时掌握真实情况，以防万一。

吃罢晚饭，陈毅接完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招呼备车，大黑后出发。

“又要上哪儿？”张茜不安地问道。

“噢，总理让我今晚住进人民大会堂，那里安静，能好好睡一觉，省得明天挨批判时打瞌睡。”陈毅口吻轻松，说完还笑了笑。

张茜望着陈毅明显消瘦的脸庞，凄楚地摇摇头。短短二十几天，陈毅已被大会、小会批判六七次。陈毅从没向她细说被批斗的详情。可是，如果没有特殊威胁，总理是不会让他住进人民大会堂的……想到这里，泪水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滚落下来。

“哎，你不要担心嘛！”陈毅扶着妻子的肩膀安慰道：“总理考虑问题一向仔细，他担心造反派明天再截我的汽车，就采取这预防万一的措施，你不必紧张嘛！北京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嘛！”

在人民大会堂边厅休息室里，陈毅早早熄灯上了床，为了明天精力充沛，他强迫自己闭上了双眼。没有高音喇叭的吼叫，心思再重也抗不注多日的困倦和疲劳，陈毅终于睡着了。

在同一座建筑的另一个边厅里，周恩来正在接见下午在外交部闹事的造

反派代表。造反派根本不听周恩来的批评，从半夜一直纠缠到第二天凌晨。

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 18 小时，心脏又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递给被造反派尊为“革命干部”的姚登山，他竟置之不理，听任造反派胡闹下去。

周恩来生气地站起来，严厉地批评：“冲外交部，不管怎么样，按中央的规定是不对的！”造反派立即毫无理性地叫嚷，高声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你们是不是跟我开辩论会？！”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批评造反派，更是一语道破幕后怂恿、策划者的险恶用心，“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 12 点到现在，18 个钟头了，我还没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姚登山面前愤愤地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起周恩来离开会场。造反派依旧在叫嚷：

“明天拦住陈毅汽车！”

“我们还要再次冲击会场！”

走到门边的周恩来陡然回转身来，两眼燃烧着愤怒的烈焰，严正警告：“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会场，我一定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在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场里被滞留了近 20 小时，至繁星满天的午夜，他才乘车回到家中。等候在会客室的卞主任立即戴上听诊器，为陈毅检查。

“卞主任，你怎么来了？”陈毅略觉吃惊：“为什么不去照顾总理？”

“是总理交代我来看看你的。”卞主任解释说，“总理担心您身体吃不消。”

陈毅眼睛热了，他动情地说：“谢谢总理了。听说总理早晨心脏不好，现在怎样？”

“休息一下，稍好些。”卞主任放下听诊器，“总理太累了，他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可是，唉，现在这种作法，我真不能理解……”

今天清晨，卞上任扶周恩来睡上床，吸完一袋氧气，脸上慢慢有些血色，呼吸均匀，脉搏平稳，渐渐进入梦乡。刚睡半小时，悬挂在墙外的高音喇叭，又一齐叫喊起来。卞主任急忙起身关紧北窗，可是无法挡住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周恩来被惊醒了，他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向床边卞主任问道：“我睡多久了？是不是该起床了？不能耽误接见时间……”

“总理，您刚睡了半小时，再睡会吧！”

总理轻轻“哦”了一声，又闭上双眼。不过，眼睑一直在颤动着，隔一会儿，睁眼看看枕边的手表，后来，干脆睁开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卞志强忍不住恳求道：“总理，我是医生，我不讲话，我就失职。您的心脏再也经不起这种嘈杂环境的折磨，您必须离开这里，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否则……”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罗嗦？！”周恩来突然发火了：“我早就说过，就是大炮轰，我也不能离开中南海！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造反派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里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这些老同志，我是一定要保的，毛主席也让我保，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阵地！我能临阵脱逃吗？！”

卞主任低下头，强忍着泪水检讨说：“总理，您别生气，是我说错了……”
寂静片刻，周恩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在卞主任的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说：“卞主任，请你原谅，我在外头受了气，就拿你们出气了，我知道你是好心，是关心我。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卞主任握住周恩来的手，热泪夺眶而出，他真想向周总理大声说：“只要您能心里痛快，只要您身体好，想说您就说吧！”可是，泪水便住了咽喉，他只能点点头……

卞主任为陈毅检查了身体，陈毅亲自把他送到门口，握别时又叮嘱一句：“请转告总理，我一切都好，不要担心，请他自己多保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摔死在温都尔汗！

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开始了。直肠癌已广泛转移，正进行放射治疗的陈毅坚持从医院赶来，满腔义愤，慷慨激昂，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开会，周恩来提出发言时录音的建议，陈毅完全赞成。他说：“我希望把记录保存下来，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参考。”

三万多字的发言，陈毅又讲了整整一上午，话刚讲完，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鼻腔里涌了出来。医生将他搀扶上车，送回医院。

为挽救陈毅的生命，保证治疗效果，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转到北京日坛医院，又亲笔批准日坛医院给陈毅作了胃肠短路手术。

1972年1月2日深夜，周恩来接到医生报告：陈毅同志现在神志非常清醒，似是回光返照现象。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乘车赶到日坛医院，急步走进陈毅病房，掩门长谈。

周恩来离去一会，陈毅又陷入昏迷……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

哭声骤然四起……

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沿着狭窄的楼梯，一级一级走进地下甬道，陈毅的遗体已经移到301医院的太平间。

陈毅静静躺在风口，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恩来清瘦的面容凝聚着深沉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周恩来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

立在旁边的张茜呜咽出声，她握住周恩来伸来的右手，抽泣着说：“周总理，您要多保重身体啊！大姐也为您担心。”

“谢谢。”

周恩来走到门口，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向安卧着的陈毅投去永别的目光，黎明时刻，陈毅的遗体也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不要赶散！”周恩来声音不大，态度果断：“组织他们进去告别一下！”这是回复中组部部长的电话。医院从早到晚聚了数百人，有地方干部，也有军人，都是按上定规格无权参加遗体告别的。

放下电话，望着桌上政治局委员一一圈阅的文件，周恩来沉重地叹息一声。

按照文件上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

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 500 人。地点八宝山。悼词连头带尾 600 字，简历占去一大半篇幅。

对于悼词，毛泽东圈去了“有功有过”四个字，这对周恩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现在悼词尽管对陈毅没有作充分的评价，但是肯定了陈毅一生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精神。他若在天有灵，是头首肯的。况且悼词张茜已经看了，她亲口对周恩来说：我只要“优秀共产党员”、“忠诚战士”两句话就够了！这是一位熟知丈夫情操的好妻子！

这几天来，宋庆龄副主席来过电话，她坚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亲自打印了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秘书还接到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挂来的电话，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又何尝不愿满足这种真挚情感的最后寄托呢？！可是，政治局定下的规格，他无权改动。

10 日下午 3 点，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了。中午 12 点，周恩来面前的饭菜几乎没动。往日宁静的西花厅里。一直响着周恩来沉重的长时间的踱步声。

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突然缓缓从床上坐起身：“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的电话，象严冬刮起一阵春风，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宏亮有力：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依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这既是周恩来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他机敏过人的才智和果断！

搁下电话，周恩来的“大红旗”风驰电掣，迅速超过毛泽东的专车。

待毛泽东走下车时，周恩来已用电话调来了十几只电热炉，调来了报社、电台记者。

毛泽东泪流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我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会场。毛泽东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夹大袍，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陈毅遗像前致悼词。他读得缓慢、沉重，不足 600 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这样的感情失控，出现在素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实属罕见，陡然增添了会场里悲痛气氛，硬压在心底的呜咽声、抽泣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形成高潮，是为陈毅，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屈辱的一切同志。

4 年后，1976 年 1 月 18 日，78 岁的周恩来总理也被“文革”和癌症夺去了生命。这一次，高龄病重的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他的追悼会，为历史留下永久的遗憾。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流泪为他送行。周恩来在烈火中含笑化为洁白的晶体，扑向祖国的江河湖海、苍茫大地。

周恩来、陈毅都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永远生活在人民心里。

（铁竹伟）

周恩来与廖承志

廖承志（1908—1983年），1924年加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愤而脱离国民党赴日本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德国做中国海员工作。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在红四方面军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被开除党籍并关押。直至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主要在广东、香港等地参加领导南方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副委员长、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领导外交、侨务、统战、对台等工作。1983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编者

心系祖国，胸怀宽广，情胜兄弟，最佳搭档。这是许多人谈起周恩来和廖承志时，共同发出的感慨和欣赏。周恩来1898年出生，比廖承志整整早了10年来到19世纪末中国这块动荡的土地上，他老家苏北淮安，廖家则是祖居广东的华侨世家。

周恩来9岁失去视他为命根的生母和养母，小小的年纪，便挑起破败的家庭重担，看多了有钱亲戚的脸色。尝够了艰辛生活的苦涩。

在日本呱呱堕地的廖承志，象只小水獭似地咬着白瓜子脸、叫阿叶的日本女子的乳头咕嘟咕嘟吸着乳汁，童年的他，去过动物园，养过小猴子，有过一把心爱的长柄刀和一个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小梅。（后来廖承志曾这样写到：“说是我最初的女朋友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她确实是我唯一的至好的女孩子。”

周恩来有幸受伯父资助到东北读书，小小年纪便认定读书为“振兴中华”。廖承志进了东京小星小学，在家中被女佣尊为“少爷”，被老师斥骂为“支那猪崽”，“中国人跟猪一样蠢”。为了维护人格尊严，他不得不时常和日本学生打架。当周恩来在欧洲加入共产党，1924年，被党召回国内投身国共合作，担任了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他和国民党左派、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之子，被喻为国民党四大公子之一的廖承志，终于有了碰面的机会和可能，才会有这近半世纪的兄弟情长，严师厚爱。

广州。初秋的一个晚上。16岁的廖承志从学校回家，在家门口，他看见一个穿白西装的人进来，父亲很热情地与来人握手，俩人一块低声交谈了好一会。客人炯炯有神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廖承志留下很深的印象。客人走后，他好奇地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你还不认识他？”廖承志摇摇头，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恩来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他和杨匏安同志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他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果然，黑幕被揭开了，那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干的事。

广州·东山百子路十二号。窗子围着黑纱，大门上还飘着白布的长条。墙上，新挂上了廖仲恺的遗像。叶挺团长进来，拉着何香凝的手，眼泪象一串珠子似地滚下来。廖承志无泪陪立一旁，眼睛里闪烁着只有成人才会有的刚毅目光。相对无言一小时，叶挺对着廖承志，向何香凝说：“他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的。”

果真会！“四·一二”大屠杀后，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间隔了10年岁月，廖承志才与周恩来再一次见面。这期间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后来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而廖承志受党中央派遣，转入德国共产党，从事国际海员工作，回国后被派往川陕苏区。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领导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生、邝继勋等同志。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都杀尽了。当时廖承志和罗世文、朱光等同志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一路打听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在往预旺堡行军的路上，周恩来碰见了廖承志。

周恩来从迎面走来，虽然蓄起了长胡子，廖承志还是认出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心跳陡然加速：自从广州一别，10年未与他见面，10年前见到他时我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再见面，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但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共产党员，自己这样的境遇，是躲开呢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打招呼、说话，真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可是，如果假装不认识，自己满肚子心里话，还有什么机会向中央倾述？……

廖承志正踌躇之时，周恩来走过来了，看见被保卫队押着的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说话，但同廖承志紧紧握了握手。

当天晚上，周恩来派通讯员找廖承志到司令部去。廖承志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认识廖承志，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认识吧？”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向廖承志厉声问道：“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得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都一一作了回答。“坐下来吃饭吧！”周恩来口气缓和一些，然而，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廖承志。吃过饭就叫廖承志回去。廖承志敬个礼就走了，心里真佩服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周到，斗争艺术高超，如果他批评张国焘，当天晚上张国焘就可能让廖承志掉脑袋。

1936年底，到达陕北后，廖承志被分配在红色中华通讯社，专门负责外国电讯翻译工作。后来在延安《解放》杂志社当总编辑。周恩来经常在外面，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有时就在中央礼堂作报告。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慧眼识珠，首先向中央建议，让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

一天晚上，毛泽东派人把廖承志找去：“恩来同志很会选人，知人善任，我举了手，这是中央的决定！小廖，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到南京跟叶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先熟悉熟悉‘行情’，再到香港开分号。”上海失陷后，廖承志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由香港飞到武汉。周恩来明确指示：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工作。于是，廖承志领导办事处同志，通过宋庆龄女士发起筹建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发动

广大海外侨胞和外国朋友捐了不少钱、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物资。这些物资先通过广州北运，以后又通过海防转到延安去。后来国民党卡住，不让这些物资进口，廖承志便把捐款存起来。1940年，廖承志又同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一起去重庆，参加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会议。当时，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在广东不要搞游击队”等错误观点。

廖承志听着频频点头。他一直主张“一切服从抗战”，但对王明大力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保留自己的看法。但他不是出言激烈的人，他有他独特的表现方法。1939年1月，张文彬同志去香港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当张文彬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廖承志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出一幅酷似张文彬面孔的“菩萨像”，下题“阿弥陀佛”四个字，递给身旁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看。吴有恒同感，又挥笔在漫画上方补“大慈大悲”四字。廖承志接过笔记本，微微一笑，接着又三笔两笔在旁边画出一幅漫画肖像，注以“孙悟空”。笔划简单，十分逼真，吴有恒一眼便认出，这是去年底从香港返回东江，组织了惠宝人民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的梁广同志。

1942年，香港沦陷以后，广东省委遭到破坏，廖承志在韶关附近乐昌被国民党逮捕。他秘密托人给重庆周恩来带去一封信：渝胡公：

我于五月卅日被捕，现在泰和附近的所谓青年训练所中。其中一切，纸上难述。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

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

志 9月28日

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多次向国民党抗议、交涉，要求释放。但在当时形势下不会有结果的。直到1946年初，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进犯解放区而被我军俘虏的敌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等，国民党释放叶挺和廖承志。

1946年1月22日下午，廖承志由重庆歌乐山上押送到旧政协邵力子办公室。他以为自己当面骂了蒋介石，肯定又要转移到别处继续监禁。突然，他听到楼下有人咳嗽，多么熟悉的声音！是胡公？！真是胡公吗？！廖承志热血沸腾，激动得说不出半句活来。周恩来一进门，见到廖承志，哽咽着叫了声“小廖！”便抢上一步，伸开双臂，把廖承志紧紧拥抱在怀里。面对国民党近4年折磨，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廖承志，此刻如同见到日思夜想的长兄，更紧地搂抱着周恩来，孩子般地泪如雨下，痛哭失声！

红岩村，石阶上人堆满了。一辆车停下来，鼓掌声，鞭炮声——身着西装，手握自制竹根烟斗的廖承志从车里钻出来。呵！疯狂地鼓掌！热烈地拥抱！夺眶而出的泪雨！闪着泪花的微笑！

后来，周恩来很认真地与廖承志谈了一次话，他说：你已经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了，你有了些粗线条的表现，骂过蒋介石，敢顶他，同志们选举你，但你还有不少缺点。你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处处要注意政治影响。廖承志郑重地点着头，他从内心深处感谢周恩来的帮助和提醒，他要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1946年5月，廖承志跟随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得到周恩来更多的教育和帮助。全面内战爆发后，9月，廖承志回到延安，担任了新华社社长。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轰炸延安，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撤退，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找廖承志布置任务，

明确指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在撤出延安的前一个钟头，廖承志亲眼看见，周恩来又亲自到杨家岭、枣园、清凉山各机关仔细检查，看看忘了什么，遗漏了什么东西没有，非常仔细周到。在廖承志将带新华社大部分同志东渡黄河以前，周恩来又找廖承志再一次布置任务。

全国解放以后，廖承志和周恩来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廖承志曾身兼十数职，青年工作、华侨工作、统战工作、世界和平运动、尤其是对日本的民间外交工作，周恩来把廖承志所有的特点和专长，包括家世、性格、擅长社会活动以及精通多国语言等等，可谓发挥得人尽其才，淋漓尽致。周恩来对同志是十分关心的，对廖承志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他爱用才干，决不拉帮结派，便显得对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严格。无论是工作、作风、思想，周恩来对廖承志要求都格外严，对廖承志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当面向他指出，有时在有关的同志面前对他作严肃批评。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知是父母遗传，是慈母之爱丰厚，还是从事国际海员工作，受到大海的洗炼和陶冶，廖承志幽默风趣，总爱开玩笑，似乎在他的人生字典上，没有“忧愁”这个词汇。外国友人特欣赏，海外华侨特喜欢，可党内和国内并不尽然。有人说他，在上级面前不以为自己是下级，在下级面前又不以为自己是上级，有“党内民主派”之嫌。偏偏他自己并不在意，听到说他太爱开玩笑的意见，他也不反驳，只是顽童似地挤挤眼睛，丝毫没有幡然悔过之心：“我这个人呀，到死那一天，也要讲个笑话，再自己跳到棺材里去。”他也由衷佩服周恩来的精密和周到，可自己大大咧咧，“胆大心粗”的毛病不断，经常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有一晚，廖承志忙到后半夜一两点，躺下就睡着了。他睡得又香又甜，突然，床头的电话铃响了。他闭着眼抓起电话，只听电话里问：“廖承志同志在吗？”他还没从梦中清醒，迷迷糊糊他说了句：“廖承志同志不在。”不料，电话中传来异常熟悉的声音：“你不是小廖吗？怎么说你自己不在？”哎呀，老天爷，这不是周总理的声音吗？廖承志这下被惊醒了。总理严厉地说：“我说小廖啊，你怎么能当面对我撒谎呢？不是急事，我半夜里能找你吗？幸亏我听得出你的声音，要不岂不耽误大事？”周恩来交待了要办的事，廖承志立即起身，干到天亮。又赶到团中央开会。并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昨晚挨周恩来批评的经过，最后说：“我这一辈子，也就这回，讲了瞎话，偏偏被总理抓住，我当引以为戒，今后即使在睡梦中，也当保证决计不说一句假话。”周恩来的严格，廖承志的坦诚，都被在场的青年干部记了一辈子。

有人说，廖承志在准的面前都敢开玩笑，领导人中，只有在两个人面前规规矩矩，钉是钉，铆是铆：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是肃然起敬，对周恩来则是犹如面对严格精细的兄长，与他的分析相比，仿佛自己永远不能思索周密，常常被考“糊”。特别是廖承志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时，周恩来非常注意对外影响，就某个问题考问大伙，廖承志回答稍有不准确，周恩来马上就问：“这话出自哪里？有什么根据？”如果听到廖承志说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就会马上批评，教育廖承志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

恐怕应了“学生最怕考试”这一规律，周恩来如果召集会议，只要不是廖承志主管的工作，他时常远远地坐在后面，有好些次，周恩来四下张望，高声问：“小廖来了没有？你干嘛坐得离我这么远？坐到前面来嘛。”廖承志这才起身，向左右邻座做个鬼脸，在笑声中走到前面去。

然而，作为周恩来外事工作的助手，廖承志更多看到的是周恩来的品格和情操，为之叹服，肃然起敬。周恩来甘当助手，他在任何地方总是首先想到毛泽东，想到如何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他的心里，没有“我”怎样怎样，只有党、毛泽东和群众。解放后，周恩来担任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精力充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周恩来并不是没有什么个人嗜好的，但他工作太忙，无法顾及。有时去看文艺节目，他也是在工作。

对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周恩来更是热情地接待，有些接见长达十几个小时，从午夜一直到黎明，毫无倦容。周恩来对他们谈及我党的方针、政策，阐明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总是深入浅出，使对方完全信服，而且还向对方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不把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周恩来是绝不终止的。廖承志曾亲耳听见毛泽东夸赞说：恩来同志是个不知疲倦的人。

是的，廖承志不仅自己感叹，也常对子女们教育：什么是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什么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眼前有个最好的典范，他就是周总理！

廖承志比周恩来会吃，他曾美滋滋地说过：世界上最好吃的肉是透明的肉，对大肥肉，对黄油，他一生没吃够。他还酷爱吃日本的生鱼片、寿司，酷爱吃有热带水果之王美称的榴莲，出访时，只要看见主人捧出榴莲，一向强调“客随主便”、非常尊重他国风俗习惯的周恩来赶紧托词离开——因为榴莲果肉虽如鲜奶油那样芬芳香甜，可外皮有股强烈的异味，周总理根本无法忍受。可你看陈毅、廖承志，大口大口，吃得津津有味。有位老华侨至今记得，廖承志曾很认真地对他说：老兄，我俩办个进出口公司，你负责出口榴莲，我负责“进口”榴莲。说得满堂皆欢。只因廖承志太爱吃，到70年代，周恩来还专门在他的病历上留下了亲笔批示：不许多吃，不许贪吃，不许偷吃。

廖承志比周恩来会玩，他爱好摄影，爱好演戏，爱看外文书籍，爱看武侠小说，爱看芭蕾舞，也看足球比赛。

但是有一条他与周恩来非常相似：都把党和国家的事业当成自己生命最大的意义。

自从建国初期，周恩来批评廖承志之后，只要是周恩来一个电话，无论是半夜还是清晨，哪怕是吃了安眠药刚躺下，他也立即起身，赶到总理办公室。

1972年的一天半夜，他被叫到会场，见他脚步趑趄，迷迷糊糊，周恩来一问，他刚吃了安眠药上床，周恩来问了几个急需知道的问题，便催促他赶快回去休息。廖承志出门时，听到总理在向秘书交待：“承志同志有心脏病，以后先给他的秘书打电话，如若吃了安眠药，就不要叫他了。”

刚刚受到母亲去逝打击的廖承志，朦胧恍惚之中，仿佛又看见慈母暖人心腑的微笑，感受到只有亲人才会这样周到，才会给予的体贴和温情。

是的，周总理对廖承志母亲何香凝的爱护和关心，一向也是无微不至的。

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工作那么忙，每逢老人寿辰，他自己，有时和邓大姐一起登门看望，还总是高高兴兴与廖家老老少少一块拍照留念。周恩来很少在别人的画上题诗词，可在革命老人何香凝为抗美援朝胜利画的一幅画上，他欣然命笔题词：

“鹊报援朝胜利，花贻抗美援朝英雄。”

1972年8月，何老太太病危，廖承志守护在病床前，一直轻轻握着母亲

的手，往事如烟，恩绪万千。周恩来走进病区，医生向他报告，老人已经昏迷不醒，连儿子廖承志也不认识了。周恩来沉重地点点头，快步走进病房。廖承志抬头看见周恩来进来，一时激动，俯下身去向已经昏迷的母亲呼唤着：“母亲，母亲，周总理来看你了，周总理来看你了！”

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人竟费力地睁开眼睛，干枯的眼窝里闪出一线生命的活力，声音很低，却很清晰：“周一总—理？周一总—理！”

周恩来急忙握住何老太太的手：老人家，我是周恩来，您安心养病，会慢慢好的。

老人费力地想摇头，没成功，她眼睛在动，仿佛在寻找。

“老人家，承志很好，你就放心吧！”周恩来一下就猜中了：担忧自己唯一儿子的安危，这是老人最大的心病。

“总—理”老人还在吃力地说着，声音更低了，廖承志几乎贴在母亲唇边才听清楚：“我请求死后运到南京，和仲恺合葬。”

周恩来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

革命一生、坎坷一生、辛苦一生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再没有任何牵挂，带着周恩来带给她最大的满足，含笑辞别人世。

廖承志双手紧紧捂着脸，泪水从指缝中流出。他是众人皆知的孝子，伤心之余，他又十分理智地请求周恩来：火化母亲的遗体。这当然有移风易俗的意思，也内含正在“文化大革命”风头上、不愿给周恩来找麻烦的心情。

周恩来反过来做廖承志和夫人的工作：“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她。”不久，中央派了专列，安排了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和邓颖超护送何香凝老太太的灵柩到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墓，同行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同志。

廖承志最清楚，不是周恩来过问，恐怕自己还会走在老母亲的前头。

不是周恩来把他保到中南海，他的心脏病，哪经得起游街、戴高帽子、大会批斗的“风雨世面”？廖承志一生，连“文化大革命”这次一共被囚禁七次半，（廖承志执意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保护性的软禁算半次）几乎占了生命的七分之一时间，基本是每七天半有一天不自由。他从没气馁悲观过，只是身体不饶人。1970年冬天，廖承志大面积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险。因是“审查对象”，北京医院没床位，不接收。周恩来亲自打了电话，医院才肯收。

得知廖承志病情恶化时，周恩来在百忙中又赶到医院，他没有径直到廖承志的病房来，而是让医生先把守在廖承志床前的夫人经普椿叫出去，关切地问她：“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我进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经普椿感动得连声说：“不会，不会！”三十多年的夫妻，她最了解丈夫，承志对周恩来绝对信赖，现在这种境遇能见到总理，对他恐怕是最大安慰。当她含着热泪请周恩来进去时，周恩来才进去看廖承志……

周恩来对自己这样细心关怀、体贴入微，廖承志一想起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恩来这样关怀同志，却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在万隆会议时，住在大使馆，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廖承志亲眼目睹，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想多搞一点菜，让周恩来吃好一点，他都提意见。

1974年，周恩来住院治疗后，廖承志几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见他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消瘦了，廖承志心里很难过，总是使劲忍着眼泪。客人们要离开时，周恩来还亲自送外宾出来。廖承志见周恩来走路已经很困难了，想去

扶他，周恩来不让扶，要自己走。廖承志体会得出：周恩来一向是为照顾别人而工作而生活的，他很不愿意，也不习惯别人把他当病人。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廖承志和全家人整日泣不成声，夜深了，也无法入眠。廖承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无法抑制的巨大悲痛，似乎使他的心脏也要停止跳动。1978年6月10日，廖承志还作了四首悼念周恩来的诗，其中有一首写道：

“周公一去不言归，八亿苍生尽痛悲；
飒爽英姿犹在目，混茫岁月已难追。
满房遗物丝丝泪，一纸真容户户垂；
岱岳黄河应莞尔，英魂忠骨遍顷飞。”

廖承志把为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遗愿而奋斗，看成是对周恩来最好的纪念。

到1980年，已经七十又二的廖承志却向中央打报告：要去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因为积劳成疾，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廖承志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当时国防部长罗瑞卿在西德手术，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逝不久，况且心脏手术的危险性也很大，多少人劝他取消这一决定，廖承志执意不听。他的理由也很简单：不能工作，成天休养，这比死还无法忍受，如果手术成功，我还能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几年，即便失败，也能为医学作点贡献。手术奇迹般地成功了，（在廖承志前一天作同样手术的一例病人，比他病情轻，年纪也轻，却失败死亡了，而廖承志在作一个危险性也很大的术前检查时，门外亲人朋友都悬着心，他躺在床上作着治疗，竟安然入睡了。）廖承志的生命又健康地延长了三年，使他能为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为大陆台湾之间的接触和沟通、为中日友谊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无人能替代的贡献！

天若有情，此刻，翱翔在宇宙间的周恩来和廖承志的英灵，一定能俯瞰中华大地，一定会笑声朗朗，一定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勤劳勇敢的人民美满幸福！

（铁竹伟）

青松磐石傲霜久

周恩来与彭雪枫

彭雪枫（1907—1944年），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1936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豫东抗日前线。1941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后兼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在战斗中牺牲。

——编者

1937年8月，洛川会议之后，为加强党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重托奔赴太原，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诸问题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进行谈判。

9月初，周恩来一行由潼关渡过黄河，抵达风凌渡。阎锡山派他的外甥、上校政训处长梁化之用专列前往迎接。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为借助红军之力实现其不出晋境的抗战，以达保住山西老巢的目的，对周恩来的接待十分殷勤。当专列抵达太原时，站台旁已排列着等候的仪仗队，奏起军乐，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在欢迎周恩来军政委员的行列里，有一位惹人瞩目的年轻军官，他中上等身材，身着黄呢军服，左胸前佩戴着八路军胸章，眉目清秀，潇洒英俊，风度翩翩，既有将军的威严，又有文人的儒雅。他含笑走到周恩来面前，十分庄重地敬了个军礼：“周副主席辛苦了！”两人紧紧握手，似久别重逢的战友。这场景既使晋军委员嫉妒，又给这位年轻的军官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就是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

1936年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晋军遭到沉重打击。在中共“停战议和，团结抗日”的号召下，阎锡山派员到延安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与其联络。11月，彭雪枫奉中共中央、毛泽东之命，秘密前往太原，以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身份，争取阎锡山与红军合作抗日。从此，彭雪枫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太原，他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与阎锡山交涉在太原开设电台等事宜。对后一个问题阎锡山久拖不决，直至1937年2月25日，才作出答复同意我们架设电台。彭雪枫连夜写信向周恩来报告这一重要情况。并于次日派专人将信急送延安。

彭在2月25日日记中写道：

“晚6时，化之（即梁化之）来，略谈即走。遂往山西饭店会周（即周恩来）。11时开始给恩兄（即周恩来）写信，12时一刻就寝。”

2月26日日记写道：

“晨6时半起床，续完给恩兄之信。”

周恩来接到彭雪枫的报告后，积极准备电讯器材，抽调报务、译电人员，由延安至太原的交通宋绍林带路，于3月20日抵达太原。

彭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6时尚未起床，绍林来相见，甚欢。并云同来者共9人。带来家书，捧读后不禁为之怡然。”俗话说“战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恩兄”之信自然就是“家书”了。他捧读后怎么能不高兴呢！过去远在千里之外的“恩

兄”，如今就站在面前，他怎么能按捺住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激情呢？！

车站欢迎仪式后，阎锡山用专车把周恩来接进专门招待贵宾的太原绥靖公署傅公祠高级招待所，并设晚宴款待周恩来一行。当阎锡山的副官把菜单送到周恩来面前让他点菜时，周恩来只选了几种普通的素菜，并对副官说：“不必这样豪华，只要吃些素菜米饭就可以了。”次日，周恩来就搬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去住。在这里，他同彭雪枫朝夕相处近两个月的时间。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设在霸陵南街的成成中学院内。抗日战争爆发后，成成中学的爱国师生，请缨抗战，组成抗日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学校停办，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由新满城西街迁址于此。为了让周恩来有个安静的工作环境，彭雪枫把进门第二排最靠里边的一个教室腾出来，这个教室比较大，室内又无其他东西陈设，显得十分空荡。为把房子布置得舒适一些，彭雪枫用一块大白布缝成布幔吊在中间，把教室分为内外两间。里间放了一张木板床，算是卧室，在外间靠窗户处用两张课桌拼凑起来，就是办公桌，并在窗户上挂一块白布作为窗帘。经彭雪枫一番精心布置，使这个办公室兼卧室的住所看上去虽然简陋，但却显得朴素大方。

在教室门口，有一棵大槐树，茂盛的枝叶迎风摇动，轻轻絮语，好像同办事处的主人一样，热情欢迎周恩来的到来。

二

为广泛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周恩来对几个负责同志的工作作了大体分工：周恩来、薄一波负责对阎锡山和山西省长赵戴文等军政首领的上层工作；程子华负责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及民众抗日武装工作；彭雪枫负责晋军高级将领、政界委员、教育界、中外记者等的安全保卫工作。彭雪枫不仅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成为周恩来在晋工作期间的得力助手。

自周恩来抵太原后，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就更加热闹起来，各界来访者川流不息，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络绎不绝地来这里寻觅革命真理，要求参加抗战。周恩来在百忙中尽量抽出时间接见他们，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为使周恩来腾出更多的时间处理更急迫、更重大的问题，彭雪枫总是尽可能多地代替周恩来接待来访者。一次，太原女师的十几个女同学和她们的老师来到办事处，要求接收他们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彭雪枫为了不影响周恩来的工作，在院中接待了他们，但他们的谈笑声还是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放下笔笑容满面地听取他们的要求，亲切地询问他们的情况，并叫彭雪枫把八路军在前线缴获日寇的战利品——饼干、罐头、糖果拿出来请学生们品尝，同时还给几位老师赠送了日本香烟。同学们边品尝战利品，边听彭雪枫讲述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当同学们问道：“我们女同学应当如何为抗战做贡献”时，周恩来告诉她们：“你们是学生，会唱歌、画画、演戏，这些都可以为抗战做贡献嘛！”周恩来赞扬她们的抗日热情后说：“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那里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欢迎你们到那里去。不过，延安还是很苦的，那里没有楼房，没有电灯，没有大米白面，你们要到延安去，就要准备去经受风浪，你们怕苦不怕呀？”

“我们不怕苦！”她们爽朗地回答。

这次生动、活泼、无拘束的谈话，给这些年轻人很大的鼓舞与教育。在周恩来的鼓动下，太原的一些中学和大学沸腾了，他们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

日救亡活动，其中不少人经彭雪枫介绍到了延安，进了“抗大”、陕北公学等校学习，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周恩来同阎锡山谈判期间，日寇正从晋北进攻雁门关左右长城各口，晋军一触即溃，夺路而逃，雁北 13 县很快为日军攻占，留在晋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只有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是时，彭雪枫得到一个重要情报：阎锡山以组织忻口会战为借口，要把第一二九师从晋北南调参加忻口会战，妄图让八路军正面堵击，以达假日军之手消灭第一二九师之罪恶目的。彭雪枫火速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在谈判中对阎锡山的阴谋进行揭露，并严正指出：“我们不能，而且不赞成打正面战，只能在敌后侧协同游击作战。”有力地挫败了阎锡山的诡计。

三

彭雪枫在工作上是周恩来的好助手，在生活上对周恩来十分关心。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凌晨 4 时。由于过度劳累，加之气候不适，他的鼻子经常流血。彭雪枫不仅多次劝他注意休息，而且还劝他去医院就诊，但他总是付之一笑，从不记挂在心。每遇鼻子流血，他总是用棉花将鼻孔塞上，然后用冷水淋淋额头，又继续工作。

一次，周恩来鼻子流血不止，廖其康再三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却不肯。廖实在无办法，只好向彭雪枫报告这一情况，彭立即赶到，劝他到医院治疗，但他仍不肯去。彭雪枫亲自到太原市立医院通过省委女交通许福静，请来最有经验的大夫为周恩来治病。并亲自外出买药，亲自护理，他再三叮嘱廖其康要多注意让周恩来休息，有事及时向他报告。

深秋的太原，西北风一吹，加之连下了几场雨，天气骤然变冷。彭雪枫见周恩来衣被单薄，就把自己的一条格军毯送给他御寒。1944 年 9 月彭雪枫光荣牺牲后，周恩来把这条军毯作为珍贵文物收藏起来，精心保管。直到彭雪枫牺牲 14 周年时，周恩来才将这条军毯送还他的妻子林颖同志保存。

1937 年 10 月下旬，忻口会战失败，日军长驱南下，国民党军队仓皇南撤，达官贵人、军政官吏和群众纷纷逃难，太原城内一片混乱。周恩来沉着镇定，一面不断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汇报晋境战况，一面和彭雪枫布置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南迁，商讨党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部署敌后游击战争。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和工作人员，而周恩来却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

11 月 5 日，日寇逼近太原，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太原古城。为了周恩来和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安全撤退，彭雪枫让张震参谋把办事处的汽车预先安置在太原城西，部分汽车到汾河西岸隐蔽待命。他仍沉着协助周恩来处理紧急公文，办理紧急公务。此时太原城的情况，《大公报》记者孟秋江报道说：“阎百川先生已于 11 月 4 日夜离开太原”，“11 月 5 日天明后，在太原城里的人物，可以数得清，除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周恩来、彭雪枫五位先生外，还有一位不负军政责任的新闻记者”。天黑以后，周恩来、彭雪枫一行开始出城，他们乘坐的两辆卡车，一辆小汽车行至水西门时，发现城门已被守城部队用装着泥土的麻袋堵死，无法通过。彭雪枫请周恩来在小车处等候，他即同张震前往城防司令部找傅作义将军交涉，傅将军立即写了一道出城手谕。但此时要想扒开已堵死的城门已不可能，只有在城门洞一侧预先挖好的人行暗道中通过。周恩来、彭雪枫稍事商量后，命令丢掉汽车，由警卫排的同志抬着电台和档案文件及必需的物资出了水西门。但水西门至汾河桥的一段路程，逃难的群众和国民党的溃兵混杂在一起，秩序混乱。周恩来

一行虽出城两个多小时，尚未挤到桥边。这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彭雪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如果天明前日军赶来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更为周恩来的安全焦急不安。他立即把人员作了分工，挑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在前边开路，令机要组长李金德及王宪文三位机要人员和警卫员廖其康负责护卫周恩来，一部分人员负责搬运电台，档案文件，其他人员作后卫。周恩来大声吩咐道：“我们一定要在拂晓前突过去，文件档案要保管好，发报机要带好，一个紧跟一个，不能掉队，跟我来！”说罢他即领着大家向桥边走去。在拥挤的人群中，还三番五次地回过头来，召唤后边的同志：“快点跟上！别掉队！把公文包、电台带好！”在通过其中仅有一尺多宽的独木桥板时，他过去后还守在那里，把后边的同志一个个扶过去。经过一个多小时，全体同志终于安全通过汾河桥，找到隐蔽在那里的汽车。次日他们安全抵达临汾。

四

临汾又名平阳，是晋南的一座古城。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卧牛城”之称。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阎锡山的省政府及第二战区首脑机关遂迁往临汾。周恩来、刘少奇、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亦先后抵达这里，临汾一时成了山西战时的省城和指导山西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

太原既失，晋局亦危，敌长驱直下凤陵渡只是时间问题。面对此严重形势，周恩来即时提出“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正确主张。他还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建议：为加强各军区的工作，“晋南以雪枫为主，兼负责军政党委，以集中和统一党政军的行动”。

在临汾期间，彭雪枫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频繁接待各界来访人士，并即时向周汇报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一方面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名义在临汾组织一次盛大的党政军民联欢会。由于周恩来要到会讲演，彭雪枫特别注意保卫工作。会前，他反复叮嘱有关同志：“这次联欢会很重要，它是我们到临汾后召开的第一个民众大会，周副主席要作重要讲话。大家要提高警惕，确保大会的成功与周副主席的安全。”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联欢会如期召开。

11月16日，深秋的临汾，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在临汾女师的大操场上人山人海，主席台上空横挂着“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的巨大横幅，会场四周贴满了各色标语口号。参加大会的除临汾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外，还有临汾学兵队、临汾师范、临汾女师及由太原南迁临汾的山西大学工学院、理学院、各中学师生、《大公报》记者孟秋江，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等中外记者。在彭雪枫致简短的开幕词后，周恩来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重要演说：

“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面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

市民、学生、商界代表、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川军军官及临汾学兵队学员——成百上千双眼睛仰望着周恩来。周恩来那锐利的目光扫视全场后接着说：

“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政策。”“华北若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

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的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他用他特别清亮的嗓音大声疾呼：“我们如不愿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

掌声骤起，全场群情激昂。有人哭了，有人从手指上摘下戒指、包在手帕里往台上扔来，并高声大喊：“我捐款，把今天的演讲印 1000 份 10000 份！”有人挤到台前，把衣袋里的钱全数掏出，并大喊：“老子再不向南跑了！路费捐给八路军抗日，老子留在华北打游击！”

负责保卫工作的张震参谋和学兵大队长何以祥急忙跑上前去维持秩序。更多的听众，更多更多的听众奔到台前，钞票、银洋、金戒指、铜钱、雨点似的落在周恩来脚下，有些人身上无钱，竟从自己身上脱下毛衣，扔上台来。周恩来看着这动人的场景，感动了，他的眼睛潮湿了。

最后周恩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坚持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而坚持抗战又“必须以坚持华北抗战为中心”。他呼吁国民党当局开放民禁，改造旧军建立新军，并号召八路军发挥自己的特长，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周恩来的讲话表达了山西和华北广大军民的共同心愿，坚定了广大军民抗战的信心。从而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华北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古城临汾被这一席振聋发聩的演讲激活了。会后，张震和何以祥脱下上衣，将成堆的捐款包起来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各界群众纷纷到办事处找彭雪枫要周恩来的讲话稿。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彭雪枫用各界人士的捐资，把讲话稿印后在晋南广为散发。后来这个演讲稿又很快被延安《群众》周刊全文登载，传向全山西，全华北和全中国。这个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有力地推动了山西及整个华北抗战形势的胜利发展。

五

1938年1月初，彭雪枫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以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身份，前往武汉参加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1月25日，《新华日报》记者陆治在汉口采访刚从山西抗日前线抵汉的彭雪枫将军，并把这次采访内容以《华北民众游击战的发展》为题，在《新华日报》上全文登载。文章说：“现任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先生因公来汉，我怀着亟须了解晋省民众游击战发展近况的期望去访问他。这期望，彭先生是给了很大的满足！”

不久，彭雪枫著的《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的小册子，由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武汉出版发行。这本小册子在武汉的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党军政界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时，彭雪枫的名子亦为更多更广泛的人士所知晓。

这时，周恩来也在武汉，他既要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长江中央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又要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他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鉴于南京、济南失守后，日军急于打通津浦交通线，兵分南北两路向徐州战略要地进犯；平汉路日军已突破黄河天险，妄图沿平汉路南下武汉的严重形势，周恩来认为迅速动员江淮河汉间广大中原人民进行抗战，已迫在眉睫。他广泛搜集情报，连续召开各种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

问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要派党的与军事工作得力军政干部，去组织与领导鲁豫苏皖的军事工作”的计划。

那么，由谁去担负“组织与领导鲁豫苏皖军事工作”的艰巨任务呢？周恩来在云集江城众多的八路军将领中，选中了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彭雪枫。

2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的联席会议。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建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并决定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工作。周恩来等在致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我们拟派彭雪枫同志到河南去担任这一工作。”电报还对调彭雪枫的理由作了阐述“因八路军临汾办事处已与总部靠近，可结束工作。教导团长可由张经武担任，经武在结束本身工作后即来总部。”电报最后说：“因鲁豫战事紧急，雪枫明日动身赴豫。”

彭雪枫根据周恩来等的指示，于2月中旬由武汉抵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竹沟积蓄力量，训练干部，组织武装，发展与扩大党的组织，发动与领导豫皖苏鲁广大敌后区域的游击战争，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同时，长江中央局还决定，彭在党内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对外以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名义开展工作。

彭雪枫抵豫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首先协助王国华、周骏鸣将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遂后又收编了活动于泌（阳）、确（山）、唐（河）三县边界的安可祥、段永祥两团绿林武装，充实了第八团，使八团扩大到1300余人。

1938年5月，徐州沦陷，豫东吃紧，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至竹沟。随着形势的发展，竹沟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因为它是临近战区的后方，时有遭受日军进攻的危险；它又处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的包围中，随时有遭受国民党顽固派袭击的可能。因此，周恩来对竹沟根据地的工作十分关心。他指示河南省委：一定要注意后方工作，重视竹沟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他说：“不要说革命，要饭的还要有个屏障和依托。”他还着重指出：“凡是主张共同抗战的河南省国民党县区机关，都要广泛联系，友军要广泛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河南省委建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彭雪枫任主任委员。他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抽调得力干部，分别对驻在信阳的刘汝明部六十八军、驻南阳的张轸部十三军、驻桐柏县的张克侠、何基沣部七十七军和驻洛阳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卫立煌的长官司令部等国民党驻军及南阳专员朱久莹、汝南专员张振江、宛西地方实力派别廷芳、信阳县长李德纯、桐柏县长朱锦凡、镇平县民团司令王金声等地方实力派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对发展中原地区抗战的大好局面，对竹沟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彭雪枫还亲自出马，去做泌阳县著名劣绅王友梅的统战工作，并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王不仅归还了先前抢去我们的物资，而且还支援了我们部分粮食和枪支。

为了开展豫东的工作和为进军豫东作准备，彭雪枫于8月上旬，同秘书黄林等一行4人赴西华、扶沟、周口等地视察工作。彭雪枫自豫东返回竹沟后，即于8月19日，将豫东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发展的情况，向周恩来、叶剑英作了详尽报告。

竹沟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与人民抗日武装的迅速发展，震惊了当地的国民

党反共顽固派和土豪劣绅，他们密谋策划联名上书国民党南京政府，诬告我党在竹沟发展抗日武装是“招兵买马”，“图谋不轨”，要求予以取缔。为此，蒋介石电令驻信阳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兼信阳警备司令王修身“派部前往彻查”。王即令其所部一八八团夏国华团长率部进驻竹沟，妄图制造磨擦，借机将我军挤走或就地取缔。时在武汉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获悉此情报后，即令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前通知了彭雪枫。在一八八团到达之前，省委机关即撤出竹沟迁往邓庄铺一带；战斗部队进山隐蔽待命；新兵补充大队由陈康率领开赴皖东敌后；只留没有武装的教导大队学员在竹沟。

当夏团抵达时，我们组织教导队学员、群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彭雪枫还特地请夏团长吃便饭，席间，他向夏团长递了上面印有“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名片，又将其随员向夏团长一一作了介绍。当夏团长听到彭雪枫、方中铎、夏农苔等都是冯玉祥西北军官佐子弟学校的学生，王恩九曾是冯玉祥先生的机要秘书、西北军少将，方中铎与王修身师长同为吉鸿昌将军旧部时，大为吃惊。

彭雪枫还向夏团长申明：“我们是按国共合作协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来此协助整编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开赴前线抗日的。这里除留守人员外，多为伤病员、本军官兵家属和一个没有武装的学兵队，希望夏团长能给少量枪支，用以抵御土匪侵袭，并望对留守处予以保护。”

夏团在竹沟驻了一个星期左右，把一个小小的竹沟镇里里外外仔细查看了数遍，但并没有发现什么“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之处。于是，夏团长在向上级的报告中说：“竹沟新四军非常友好，没有什么违犯抗日宗旨的不法活动。”嗣后，蒋介石亦在其致河南省政府电中称：竹沟留守处“与民间相安无事，所传各节均属不实。”

在夏团撤离后，河南省委机关、部队安返竹沟，避免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所策动的第一次磨擦。

1938年9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河南省委，应将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豫皖苏鲁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并同意彭雪枫率必要武装去豫东。开展敌后工作，加强豫东部队的领导。

9月3日，彭雪枫电复周恩来、叶剑英，对创建豫皖苏鲁边新局面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不仅汇报了深入敌后的计划，而且还对该地区的发展前途作了精辟的阐述。

9月29日，周恩来又致电彭雪枫：情势紧急，彭应速去豫东。

10月30日，彭雪枫根据周恩来等电令，于本日率两个新兵连和一批干部，共373人，从竹沟出发，踏上进军豫东敌后，创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

周恩来与彭雪枫之间，是上级和下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但又具有亲密战友间深厚的情谊。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工作上顾全大局，相互支持，配合默契，堪称后人学习楷模。

（张学忠）

周恩来与王幼平

王幼平（1910—），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调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建国后，调外交部，先后任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等职。

——编者

周恩来去世的时候，热爱他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共同的思念。那一天，在亚洲大陆南端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沉浸在悲痛之中，王幼平大使夫妇手执铁铲，肃立院中。他们面朝祖国思绪万千，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落下，滴在那为悼念周总理而刚刚栽下的翠竹和大叶红心蕉上。和许多老同志一样，王幼平对周恩来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给他的关怀、温暖和教诲最多、最及时。

周副主席扛来一领席

那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冬天，年轻的王幼平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他到新建立的白区工作部工作。报到前，组织部长李维汉约他谈话，告诉他：“白区工作部的部长暂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任，到了那里可能留在部里，也可能派遣外出。一切听从周副主席的安排。”

对周恩来，王幼平并不陌生。1933年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前夕，他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教育科长随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去总前指看望首长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首长交谈时，他只记得周恩来气愤地说：“流氓！流氓！（指蒋介石）我和他同过事，算把他看透了：善搞阴谋，堪称奸雄！”长征开始后，他随休养连一起行军，和邓颖超在一个支部，时常听到周恩来的消息。这一次，他要到周恩来身边去工作了，心里真高兴。他接过李维汉写的“恩来亲启”的介绍信离开了组织部。

当时，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瓦窑堡主街的南端，王幼平拎着背包找到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暂任军委作战处长的刘志丹迎了出来，见王幼平手持“恩来亲启”的介绍信，便摆手示意请他进窑洞的里间当面递交。王幼平走进去，那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看上去，周恩来消瘦了许多，长长的胡须，深陷的眼眶，长征的磨难分明还刻在脸上。周恩来起身同他握手问好，同时接过信去。他和蔼地问王幼平，有什么打算，是否愿做白区工作。王幼平回答：“服从组织的决定。”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说：“那就先住下。”说完，他亲自带着王幼平来到一个有五孔砖窑的独院，让他住在右边一座空窑里。因为长期没有人住，窑里满是灰尘，周恩来让王幼平找把条帚打扫一下，自己匆匆走出去。不一会儿，周恩来扛来一领炕席和王幼平一起把炕铺好，直到完全安顿就绪他才离去。

人们常说，时间是洗涤剂，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忘却的。然而，对王幼平来说，与周恩来相处的往事，哪怕是遥远的过去，哪怕是很小的事，都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却。相反，时间越久仿佛越清晰。这件小事在王幼平心中装了几十年。周恩来去世后，王幼平写下一首小诗抒发了当年的感受，诗中写道：“首长扛来一领席，还帮我把炕铺好，目送首长捋髯去，深受感动泛思潮，优良作风党之魂，敬佩首长以身教。”

实际上，中央这次调王幼平到白区工作部是打算派他外出的。外出之前，王幼平在瓦窑堡住了半年，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潜入驻绥德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部联络一个地下关系；另一件事是做东北军俘虏高福源的工作，这件事做得很有成效。后来，高福源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主动要求回去向张学良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又陪同周恩来来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对高福源的功劳，周恩来始终记在心上，1960年，王幼平陪西哈努克访华，在火车上同周恩来谈到高福源时，周恩来说：“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是有贡献的。他和王以哲同时遇难很可惜！”周恩来要王幼平了解一下高是否有遗属，说：“我们应予关照！”周恩来这种不忘旧朋友，广交新朋友的胸怀与美德对日后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的王幼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王幼平到绥德敌军内部和派遣去白区前，周恩来都同他进行了长谈，一再叮咛出去后要：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作啥像啥，举止从容，随机应变，自圆其说，时防意外，要营三窟。这段话被王幼平概括为“三十六字诀”牢牢印在心中，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运用，很快打开了局面。

战争年代的这段交往，两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解放后，他们在偶尔的闲遐中拉家常时，还常常谈起这段生活，谈到长征、谈到瓦窑堡、谈到西安事变、谈到在陕北窑洞渡过的日日夜夜……

深受教益的第一次使节会

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和第一任外交部长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他在领导繁重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擘画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是这项事业当之无愧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建国之初，外交队伍的组建是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任务。中央决定这支队伍以军队干部为骨干，另外还有军调处的干部和青年学生参加。中央的意图是要把我们党多年来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战略策略思想及经验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使它成为一支“文装解放军”。根据这一精神，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王幼平从南下的前线被调到北京外交部。

在日后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王幼平曾先后出任罗马尼亚、挪威、柬埔寨、古巴、越南、马来西亚、苏联七个国家的大使。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与周恩来有了更多的接触，得到了更直接更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1950年，除王稼祥已出使苏联外，派驻已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或公使确定下来，有耿飏、姚仲明、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王任叔、黄镇、倪志亮、吉雅太、曹相仁、冯铨、袁仲贤、姬鹏飞。他们都是周恩来亲手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因中央干部很缺，周恩来指示，由各大使自己提名组建各自的班子，要求他们尽快将名单报请中组部下调令。

各使馆的班子组成后，谁都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搞外交，这些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领们甚至连领带都不会系。因此，中央专门为这些同志组织了外事工作培训班，还专门请人教外交文书、外交礼节。组织他们参观外国驻华使馆，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学穿西装，系领带及跳舞等。出国后，为了及时总结工作，提高外交人员的素质和外交工作的水平，周恩来还决定定期召开使节会议。他每次必到会讲话，阐述我国的外交政策与方针，使外交人员心中明了全局，行动有所遵循。

王幼平印象最深刻的是1952年4月底外交部召集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会

前，王幼平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周恩来对他说：“这次使节会很重要，要对建国后的外交工作实践和今后方向进行认真的探讨。”

4月30日，周恩来在第一次使节会上做了题为《外交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阐述依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外交方针是，建立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在战略思想上要以国家为对象，人民为基础，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巩固和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不失掉立场、不依赖外援、对敌对国家要坚决斗争。战术上要“针锋相对、弯弓不发、相机而作、细水长流。”要求外交人员要明确上述方针和任务，理解确定外交政策与策略思想体系的依据，端正对业务的认识。

周恩来还带头检讨了二年来的外交工作，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要大家注意学习。他说：“进入外交战线，必须知彼，而且要知己。”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勉励使节们要注意树立新中国的形象，当好国家的代表。他说：“要谨慎严肃、谦虚认真。行动合乎立场，举止合乎身份，言语合乎分寸，礼貌合乎常规。”强调“必须加强使馆内部建设和党的建设，提高业务水平，保证任务完成。”

这次会议使与会代表们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对指导与推动我国的外交工作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王幼平曾深情地说：“这个会议是我从事外交工作三十多年所受到的最深刻的一次教育，周总理的教导至今记忆犹新。”他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终生难忘的关心与教诲

从50年代到“文革”前，外交部规定驻外大使两年回国一次。如果同时回国的人多，周恩来一定要安排他们晋见毛泽东，如果回国的人少，甚至有时只有一个人时，他也要见面谈话，了解一下驻在国的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他要求驻外使节在回国期间要抽空到农村、工厂看一看，了解国内的生产 and 人民生活情况；要求他们列席一些重要会议，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全局的了解。对国内外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周恩来总是同他们及时通气，打招呼。

1956年3月下旬，王幼平回国参加第二次使节会议的途中，在飞机的广播中听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他感到十分震惊、痛心，急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回到北京，周恩来同他谈话中，介绍了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周恩来说：“苏共二十大启发了毛主席的深刻思考，近两个月来，他反复想了许多，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十大关系’。”沉思片刻，又说：“这个问题中央还在讨论，还没有定下来，先向你吹吹风。”这件事使王幼平认识到我们党正在突破苏联的建设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国内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日常工作中，王幼平感触最深的是，周恩来十分注意纠正驻外人员的大国主义思想，教育他们要虚心向驻在国学习，尊重驻在国的风俗习惯，熟悉驻在国的情况。他常常说：“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懂得，但在外交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狭隘的大国主义、民族主义。”每当他发现哪里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便抓住不放，大

讲这种思想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

1960年，周恩来来到柬埔寨访问，为去世不久的诺罗敦·苏拉玛里特老国王吊丧。当时，周恩来到达的那天，从机场到市区的沿途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一段全是华侨，气氛十分热烈。周恩来到达住处后一边脱外衣，一边对王幼平发火：“你不要高兴。”王幼平楞了一下问道，“我高兴什么？”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为什么动员这么多华侨华人欢迎？”王幼平马上明白了，解释说：“柬方的欢迎部署是人家自己定的，没有征求使馆的意见。”听到这些后，周恩来口气缓下来，耐心地说：“人家正是国丧期间，你们也该了解一下情况。”周恩来的考虑是十分正确的。日内瓦会议后，在美国的操纵下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是美国企图控制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步骤。在这种形势下，奉行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处于战略意义的地位。我国的方针是一定要交好这个朋友，支持她奉行的中立国策，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不注意，就会伤害人家的民族感情，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1971年10月，王幼平做为驻越大使陪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华，这时中国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两国总理在联合公报签字后范文同起身时笑着说：“贵国恢复联大席位越南也有点小贡献。”这句话触动了周恩来，他回到住处后反复思索，立即找来有关同志，批评他们在起草文件时忽略了这一点。他对当时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这些人还能干几天？大小事还要靠我们把关吗？”这时，正巧王幼平走进来，周转过身对他说：“还有你，驻在人家的国家，也不帮人家说句话，是不是怕说你右倾啊？”

第二年3月，尼克松访华后，周恩来飞河内向越党通报情况。当时西哈努克也在越南，住在离周下榻地方较远的繁华的市中心。周恩来打算去看他，遭到王幼平反对。王幼平说：“总理这次不是公开活动，去‘王府井’怎么行？还是请西哈努克来吧。”周恩来觉得有道理，但听到王幼平把越南的街道比做“王府井”时瞪了他一眼，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大国主义，什么时候能断根啊，把人家的事物比做中国的事物，把人家的街道比做自己的街道。”

每次在使馆内举行活动，周恩来对桌上的摆设都十分关注，要求工作人员除摆上中国的东西外，也一定要摆上驻在国的物品和特产，以示对他们的尊重。

这些事给了王幼平深刻的教训，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他处处谨言慎行，注意在工作中戒除大国主义思想。

当驻外人员出现一些思想问题时，周恩来总是以理解的态度加以引导，认真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工作十分周到细致。

1958年，王幼平完成出使挪威的任务后，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请求。他的理由之一是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又不精通外文，工作有难处。这件事反映到周恩来那里。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他不同意王幼平的请求，但对王幼平提出的困难表示理解，因此决定批准他离职两年学习外文。细心的周恩来亲自找王幼平谈心，了解他的思想，嘱咐他学习期间不要死读书，要定期到工厂、农村看一看。以后，由于情况的变化，王幼平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十分感激周恩来体贴入微的关心。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周恩来每次出访也为使馆的普通工作人员带去温暖。他深知这些同志，特别是翻译同志很辛苦，因此常常在内部会餐时向他们敬酒，和他们一起照

相，表示心中的谢意。有时组织一些参观活动，值班同志不能参加，事后周恩来总是特别批假给以补偿。他格外尊重女同志，每次使节会或其他活动上都要为女同志说话，请女同志参加，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周恩来的关心与爱护渗透到每个人心中，是王幼平等外交人员能够做好工作的重要推动力。

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也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林彪、“四人帮”集团疯狂地迫害老干部，一些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被打成“黑帮”、“特务”送进监狱或遭到审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艰难，但他尽力排除阻力，保护干部“过关”，恢复正常的外交工作。

1967年初，王幼平作为第一批回国参加运动的人员从古巴回到北京。他对国内的局势发展没有思想准备，以为运动很快可以结束回馆工作，因此连行李都带得很少。回到外交部后，他立即被“造反派”夺了权，并挨了批斗。不久，造反派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内查外调。周恩来、邓颖超对他尽力保护。这恐怕也是在众多外交干部中他能较早获得“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8年1月，王幼平因右下肺炎急诊后在家中休养。一天，“造反派”来告诉他已将他“解放”，并让他看了上报材料。事后他才知道是周恩来让联络员询问外交部造反组织：“那么多大使就没有被解放的吗？”要求各使馆“造反派”上报材料，立即解放干部。

从1967年初以来，我驻外大使的岗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影响到正常的外交活动，周恩来十分焦急。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又催促外交部改变这种不正常情况，他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的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很快下达了任命，由耿飚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黄镇任驻法国大使，王幼平任驻越南大使。

6月4日，王幼平等人赴任前夕，周恩来特意约见了。根据“文革”期间特殊的外交状况，周恩来做了细致而重要的指示。他强调，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研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使馆内部要“搞好团结，实行集体领导”；在坚持使馆革命化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对使馆的建设，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谨、朴、不亢不卑”，初到一个地方要“多听少说或不说”，“要注意洞察一切，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谈到“文革”期间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要善于宣传”，“慎之又慎”。最后，他握着王幼平的手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透过这双温暖而有力的大手，王大使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和周恩来的期望。这些话对在“文革”这特殊而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外交工作的同志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还十分注意排除“左”的干扰。“文革”中，极左思潮也影响到驻外使馆，大家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王幼平回忆起驻越使馆的情况时说。使馆院中树了许多标语牌，之中有些是援越工程队用钢筋水泥铸成的，既结实又漂亮。特别是临街大门的影壁非常堂皇，上面是林彪的题词。援越工程队的运输车经常跑河内，车沿上的标语花花绿绿很显眼。这种情况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逐渐扭转的。

1971年3月，周恩来访问越南，这是“文革”期间进行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周恩来到达使馆之前，工作人员在大使夫人史洪潮提议下把办公室内一些“左”的标语都摘掉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王幼平没有同意史洪潮向周恩来汇报这件事。但不知怎么，这件事还是传到周恩来的耳中，在同使馆

工作人员照相时，他特意招呼史洪潮坐到自己的身边，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你做得对，坐到我身边来，我支持你。”史洪潮非常感动。她称周恩来是“最关心、最理解、最尊重人的总理”。

这一年的9月13日，王大使正巧在国内开会。由于越南发生特大水灾，处在最困难时期，周恩来要他立即回去。他本来准备这一天返回越南的。但是，由于民航班机突然取消而未能成行。晚八点钟，他接到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总理今晚可能接见。当天深夜，王幼平从睡梦中被喊醒，他得到通知：二时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他赶到后，听警卫人员说：“周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现在正在外边散步，马上就会回来。”不一会儿，周恩来走进来，表情很严肃，也很疲倦。落座后，周恩来宣布：“现在出了件大事，出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林彪叛变了。”沉静片刻，他的嗓音提高了，讲话中历数了从陈独秀、张国焘到林彪的错误，指出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提醒在座的驻外人员：“从侦察器的荧光屏上看到这架飞机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坠毁了，也可能是耍的阴谋，要注意他万一得逞之后，在国外发表声明之类的东西。”王幼平回到家中已是清晨四点半钟了。周恩来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这是他在“文革”中亲手处理的一次最重大的事件，他对粉碎林彪集团的历史功绩已载入史册。

1974年10月，王幼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当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依然坚毅不屈的周恩来步入大厅时，全场沸腾，雷鸣般的掌声不停地打断他的祝词，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水。这次会见，王幼平没有机会单独与周恩来谈话，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王幼平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周恩来最后的一面……

满怀深情的拥抱

1988年3月5日，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内洋溢着早春的气息，人们脸上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正在举行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以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周年。许多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和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最令人高兴的是邓颖超能够抱病到会祝贺。

一位头发花白、面目慈祥的长者静静地坐在代表席上，他就是王幼平大使。这时，他已经退出工作第一线，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代表们激动人心的发言，邓颖超满怀感情的祝词把他带入往事的回忆中。

他想起，胡志明去世时，周恩来到河内吊丧的情景。那一天，周恩来到住处就脱下了鞋，只穿着袜子在地上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对他说：“脚肿了。”那时候，他只以为周恩来身体不好，又过于悲伤劳累，需要休息。因此，每天只守在隔壁的房间，尽可能不去打扰。他还不知道，是沉重的病魔已向周恩来袭来……

他又想起，周恩来去世后，他第一次回国进入国境时，想到再也见不到总理，不禁心中一阵空寂，泪洒深圳桥头的情景……

他还想起，为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而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传出后，自己“并未感到惊诧”的心境，想起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欢呼雀跃，自己夜不能寐，起身集诗的情景……

突然，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他看见邓颖超从台上缓缓走下，沿着通道与老朋友们握手问好。王幼平悄悄地退到旁门口等待着。当邓颖超走近时，他伸出双手，快步迎过去。两位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对周恩来的思

念全部溶进这深情地拥抱中。每一位亲眼目睹这感人一幕的代表，都为这东方人并不常见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所感动，所吸引。就是在这次会上，笔者认识了这位外交界的老前辈。以后，为收集周恩来的资料，一次又一次推开了他的家门。这位“心声不愿外泄”的老人终于吐露了深藏心中的往事。

最近一次，当笔者满足地起身告辞时，他从窗台上剪下一株红叶吊兰，不无遗憾地说：“十六年前，为悼念周总理，我在马来西亚栽种的翠竹和红心蕉移回国后都未成活，只好以文竹和红叶吊兰替代。”笔者不由肃然起敬，心头一阵滚热。双手接过的仿佛不是一株小小的红叶，而是一位老大使珍藏心中的深重感情。

（廖心文）

周恩来与高崇民

高崇民（1891—1971），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秘书参与起草张杨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7年参与成立东北民主救亡总会。此后在北平等地建立东总地方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41年在重庆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从事国民党军上层将领争取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编者

先父高崇民经常向我们讲述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多少年，“悔恨自己过去太瞎摸海了”，直到1935年受到孙达生同志的帮助，他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称孙达生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1936年5月，他因写《活路》小册子，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而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张学良将军让王以哲将军派人把他送到天津英租界。在英租界，南汉宸同志每天为他讲解马列主义，先父称南汉宸是他中学老师。“西安事变”时，结识了周恩来，先父说：“周恩来副主席是我的大学老师。”

“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立即成立了“设计委员会”，作为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委高崇民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这个时候，西安方面围绕着“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如何解决，是和是战意见纷坛，莫衷一是：12月17日，张学良将军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以后，即召开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军、政干部会。在这次会上，高崇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会议一开始，张将军首先请周恩来讲。周恩来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下，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种形势下，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周恩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讲述了矛盾转化的理论，教育启发了高崇民。自从1935年夏，高崇民接受红军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方针以来，通过他自己的实践也认识到：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就是打内战对日妥协的政策。为此，要抗日必须反蒋。高崇民听了周恩来的论述，在其思想里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讲话中肯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革命的义举，在客观上批驳了当时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对张、杨的无理攻击。这使高崇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精神甚为钦佩。周恩来讲到事变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为蒋虽被扣，但其军事实力还在，特别是军权落在亲日派手中，他们借机挑起内战，使内战规模扩大的可能是存在的；一个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根据这个估计，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的意见，很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很有点杀气，他们在会场四周，布满了警戒，扬言：“有敢于释放蒋介石者，予以格杀。”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词严地指出了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周恩来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无人再敢发言。后来第一个发言的是王以哲将军，认为共产党

以救国抗日为先，不记前仇；和平解决的提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其后发言的有高崇民，他说：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何止万千，共产党这一决定是利国利民的，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公无私，古今中外无有先例。高崇民表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这时，又有不少同志发言附议这个意见。放蒋的问题，就是通过这次会议解决的。

在张学良送蒋走的第二天，即1936年12月26日早，杨虎城将军拿来昨夜接到张学良将军的一封电报，让高崇民看，并把周恩来和王以哲也请到新城。他们四人共同研究张学良让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及几十架战斗机的电报，研究放不放这四个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分析这件事究竟是张学良的意见，还是蒋介石逼张发的电报。王以哲说昨天在飞机场时张即曾嘱杨虎城放了这几个人。周恩来边听大家的议论，边沉思，然后他说：既然把蒋介石都放了，再扣押其他大员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四人一致的意见：把那些大员全部放走。会后杨将军发出晚宴请柬，欢送国民党大员回南京。

后来高崇民深有体会地说：“西安事变过程当中，虽一度处于危疑震撼的局面（指张学良被扣和‘二二’惨杀事条），终得安稳渡过，和平解决。”这主要是由周恩来根据和谈原则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折冲樽俎，才不亢不卑地把震惊中外、轰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平结束。从此，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之后，周恩来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他原来想只要东北军团结、三位一体屹立，这就是营救张学良的力量；没有想到，发生了“双二杀王（以哲）事变”，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化。所以，1937年3月18日，周恩来给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写信，强调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的群众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1937年4月，周恩来为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来到上海，对抗日联军第四军的代表李延禄作了指示，他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先在上海开筹备会议，再去北平开成立大会”。由于周恩来在上海，并有这个指示，所以，高崇民、栗又文、刘澜波、张希尧等人即从北平到上海。在上海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东北救亡总会的筹备会议。周恩来具体指出东北救亡总会的任务：“一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周恩来具体指示：筹备会要由高崇民、阎宝航、栗又文主持。这样周恩来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所指出的“在这些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的正确思想得到了实践。

高崇民、阎宝航等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37年6月20日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大会。高崇民致开幕词，栗又文作“东总”章程的报告，中心是促蒋抗战，提出恢复张将军的自由，坚决打回东北老家去。东北救亡总会选出常委三十多人，推选出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为执行委员，下设领导机构：一处四部。“东总”成立时，有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参加，有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大学的代表参加，“东总”成立，即把东北的各种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抗日力量。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不久，又发生了日本大规模侵华的芦沟桥事变，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士纷纷南撤。高崇民、刘澜波、韩乐然经天津到济南，在济南成立东总分会，组织收容平、津流亡来的东北民众。在中共一再倡导国共合作、发动全民抗战的情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抗战，但是对人民的抗日活动仍采取限制的方针。戴笠借口全民都已抗战了，没有必要再保留救亡团体，救亡组织都应取消。这时候，周恩来在太原。为了研究请示“东总”的工作，高崇民和刘澜波也到了太原。周恩来对他们说：抗战爆发了，但东北还没有收复，在关内的东北人民有必要组织起来，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奋斗，东北救亡总会不能撤销。“东总”在内地开展工作，必须在国民党政府立案。周恩来认为高崇民与戴笠在“四维学会”时相识，可去南京向戴笠交涉此事。因此，高崇民到南京约王化一，向戴笠提出此事，征得戴笠同意，“东总”得以注册立案，从此“东总”迁往南京。“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周恩来来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为了发展统一战线，周恩来指示要扩大团结的范围。他说，东北救亡总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争取合法很重要，应当吸收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东北上层爱国人士王化一、王卓然参加领导工作，有些事情只有他们能办，别人办不了。原来因为二王积极赞助蒋介石向张学良提出共同组织“四维学会”，以取代“复东会”的主张，“东总”的领导同志对二王有意见，故成立“东总”时就未吸收他们参加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937年10月6日，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的制度，改组为主席团制，除了原来的五个执委为主席团成员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周恩来的指示实际指导了这次“东总”组织机构的改组工作。

“东总”成立之后面临着日军侵华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年底“东总”迁到武昌明月桥。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团结东北人民的力量开展救亡斗争，在领导层中发生了分歧意见。高崇民主张：凡东北军驻过的地方、东北人民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成立“东总”分会或通讯处，使分散的斗争走上组织的联合斗争。有的同志不同意，认为各地的斗争，可以由各地区组织起来，“东总”不一定形成一个组织系统。争论比较激烈。有的同志把这两种意见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两方意见各有优缺点，不过还应该倾听高崇民的意见；要把东北救亡总会办成一个“同乡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东北同乡，尽管有各种不同立场，只要不愿当亡国奴的，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8年1月19日，“东总”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执委会的联席会议，在通过的“关于救亡总会目前的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在东北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团结运动，扩大并建立各地分会组织，争取大多数人参加本会”，是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根据这个精神，高崇民、陈先舟、于毅夫、栗又文、张希尧、邹大鹏等人分赴各地，和东北军各部队以及那里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联系进行建立各地分会的工作。先后建立的有在太原的山西分会，在西安的陕西分会，在深县的冀中分会，此外，还有成都分会和延安、宝鸡通讯处等二十多个下层单位，这样，就把分散于各地的救亡运动，汇集成了一股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抗日洪流。

1937年底，“东总”迁到武昌之后，高崇民收到了他的独子高存信从洛阳东北军炮六旅来的一封信。高存信在“七七”事变后，在平汉线北段参加抗战，正定滹沱河防线被日军突破后，随国民党部队溃退到黄河南岸。此时正是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之后。他写信要求脱离东北军，到八路军去抗日。

高崇民完全赞同，并亲自去向周恩来提出这个请求。周恩来深表欢迎，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他了解到高存信是黄埔军校十期炮科毕业，又在东北军干炮兵，当即写信给八路军总部，介绍高存信去参加即将成立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工作。高崇民持周恩来介绍信到郑州，住在华阳春饭店，对其子存信以及连长（前王以哲的随从参谋）杨之彦说：“前线溃退，全国局势也是一塌糊涂，抗战依靠谁已很明显，真正能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是延安。你们应当马上奔向延安，一切手续我给你们办。”

1938年春，高崇民到西安组建了“东总陕西分会”，他认为西安是通往延安的要道，很有必要建立分会。分会建立起来之后，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和往延安及敌后输送进步青年。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影响，他在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下，做了大量上层统战工作，并动员了几批东北爱国人士去延安参观。1938年8月，他也随参观团到了延安，晋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高崇民向他们提出了他对东北抗日救亡的意见，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他认为如能在八路军掩护下，组成近几万人的挺进支队，对于收复东北将是一支很大的生力军；他在国统区可以发动东北青年到延安参加这支队伍。中央原来即很重视东北干部的培养工作，遂后在1939年春建立了以李延禄为队长、张松（即李范五）为指导员的东北部队，夏天又建立了一个东干队（即延安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于1940年秋，由队长张学思、指导员高存信率领，挺进冀中平原根据地，投入敌后抗日斗争。

到延安后，高崇民向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了，只是履行手续而已，不过你还要从工作便利方面考虑一下再决定。”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对高崇民说：“你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从工作出发，服从了党的安排，自从那时起即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徐彬如在这段工作中对高崇民的评价是：“周恩来很尊重高，认为他是我们自己人，东北事情依靠他”，高崇民“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知道，但都是按党员对待，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告诉他，他知道什么情况也告诉我们。”

1939年秋，国民党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东总”陕西分会被查封，高崇民在杜斌丞的帮助下，在西安王家巷四号租了一所房子，名义上是高崇民的私宅，实际为“东总”陕西分会的地下机关。分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这时候高崇民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维持“东总”的开支，人们称呼他为“难民”。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进关，他就立志不作官，不经商，决心从事复土还乡的工作。他向张学良表示了这个决心，并要求能在生活上给以支持。张将军支持他的作法，每月给他三百元车马费，以维持生活。但自从“西安事变”后，张将军被蒋介石囚禁，高崇民的生活费就没有来源了。他就靠有钱的朋友，如胡圣一、杜斌丞等人帮助维持生活。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由林伯渠负责，林老几次给送生活费，高崇民都不接受。因为他知道我党经费十分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用朋友的钱，不愿增加党的负担，体现了他的一片爱党之心。这件事，被林伯渠反映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这时在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也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党为了保护干部，把“东总”已经暴露的党员转移。1940年7月，周恩来决定把于炳然撤退到延安。撤退时，周恩来对于炳然说：“你到西安之后，办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经

没有方法，林伯渠同志几次给他钱，他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于炳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西安将高崇民说服，林伯渠一次给了他三个月的生活费。高崇民领到党给他的生活费，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周恩来和林伯渠的关心，给了高崇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开展统战工作，尽心竭力地办好“东总”陕西分会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东总”的负责人之一的徐仲航和成员李羽军被捕。李羽军坚贞不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为了保护干部，周恩来决定将暴露身份的党员领导干部于毅夫撤走；尚未暴露身份的阎宝航、陈先舟等人，也另谋公开社会职业作掩护，坚持工作。同时决定安排高崇民到“东总”，以民主人士身份坚持“东总”工作。高崇民于1941年春，为办理乘飞机去新疆营救社重远手续，被戴笠骗到重庆，正处在被软禁的情况。周恩来找高崇民谈话，讲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现在形势比较紧张，为了使干部不再遭受损失，对他们能撤走的撤走，能隐蔽的隐蔽，安排你来坚持‘东总’工作，你以民主人士身份工作就更方便一些。”他指出：“‘东总’一定要存在下去，东北同胞一定要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收复东北老家，打到鸭绿江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路线，也是广大东北人民衷心拥护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并不要抗战到底，早在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抗战到底的解释是：‘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不要收复东北，牺牲东北，换取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的反动方针。广大东北人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东总’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只要东北救亡总会这个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从此，高崇民在重庆的五年，就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三

1941年6月，蒋介石视“东总”为眼中钉，为了清除投降路上的障碍，借口统一东北抗战力量，查封了重庆的“东总”。这时，周恩来指示高崇民坚决把“东总”的会刊《反攻》办下去，他说：“只要《反攻》的牌子存在，以这个刊物和蒋介石斗争，蒋也很难出卖东北。”高崇民根据周恩来指示，把《反攻》的主编由总会宣传部改为王卓然，发行人改为王化一。在国民党的查禁下，没有人敢承担印刷《反攻》的任务。高崇民请国民党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主任陈彦之帮忙印刷出版。高崇民爬山越岭，渡江踏水，到处约请进步朋友和名人撰稿，吸收爱国青年参加编辑工作，先后任《反攻》编辑工作的有张兆麟、白浩、秦笠、胡循、聂长林、孙汉超、刘仁等。高崇民终日联系出版、校对、编辑，写社论，约稿、审稿、写稿，他实际是发行人、主编和主笔，忙得不可开交。他在《重庆软禁锁记》中写道：“由猫儿石乡下到市内，或再到南山，须过江上山，走羊肠小路，最高石阶有千余级者。时余年已四十九岁，每天往返路程六、七十里，从未觉得疲倦过。”“有时阴雨，江水泛滥，淤没山脚达四十米宽，水退后，泥泞深处几乎没膝，余傍晚由市内归来，须两手触地，如马上山状。”环境如此艰苦，但想到党和周恩来交给的任务，便一身疲劳尽都烟消云散。

生活上的困难艰苦都容易克服，办《反攻》没有经费来源，则是更大的困难。1942和1943两年，《反攻》半月刊社经常断炊，编辑人员不要工资，但要吃饭，可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的编辑不得不去做点生意来维持

生活。党当时也给些经费，但党也很困难，经费来之不易，因此，高崇民总是尽量自己筹措经费，不给党增加更多的负担。他甚至将夫人的金、银首饰全部卖光，终不能长久维持。王化一向他提议，可在赈济委员会谋一挂名职务，得点干薪也可维持生活。高崇民到曾家岩五十号，向周恩来汇报，得到周恩来同意，高崇民遂在赈济委员会许世英的安排下，获“专员”名义，得月薪一百元，以维持《反攻》杂志社编辑们的生活。《反攻》杂志一直坚持到1945年9月18日，出版了一期胜利专号，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

千难万难，不如对付国民党的特务难。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高崇民的监视。在猫儿石《反攻》半月刊社周围布置了许多特务，轮流监视高崇民，甚至还向他的房东布置任务：向特务机关提供高崇民活动的情报。高崇民愤怒地给戴笠写信道：“余一寒士，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笠回信否认，从此公开的监视减少了，隐蔽监视增多了。高崇民则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他在各种场合都公开主张联苏联共，团结抗日，有时出入于新华日报社、曾家岩五十号和红岩村，甚至和苏联大使馆秘书安得列夫见面都不太避讳；偶尔与戴笠碰见，戴笠问起时，高崇民亦直言不隐，使戴笠也认为高崇民是国民党左翼而已。当然遇有重要问题，高崇民也是极端秘密地，有时候，带上夫人王桂珊，抱上孩子到周恩来那儿去。王桂珊和邓颖超在客厅聊天，高崇民和周恩来则在内室密谈。1985年10月，高存信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说：“你爸爸跟我们是老朋友了，在重庆时我们经常见面！”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消极抗战，日益明显，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日益扩大，由抗战开始的溶共限共转到取消共产党，在政治上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独裁的斗争，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如何解决》一文，指导了高崇民的斗争。文中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时高崇民考虑到只有《反攻》刊物为阵地，远远不能适应今后斗争形势，他和阎宝航、陈先舟、金锡如商量，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团结东北人士，开展民主斗争。大家同意之后，高即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很以为然，并把这个意见报告给延安。1944年11月，他们在宁武女儿宁京恕的家中，秘密成立“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因为是秘密的，吸收会员都是经过极严格的审查，基本上以“东总”的会员为基础，杜弘如、陈英乔、陈彦之、孙汉超以及《反攻》的编辑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东总”的继续。成立以后，他们又以“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名义，集体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组织起来之后，他们每两个月左右，在阎宝航家中集会学习一次。一般的情况下，周恩来都亲自参加指导。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座谈国内外的形势、学习党的统战政策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1944年上半年，敌后战场形势好转，我军主动发动攻势，作战明显增加。而日军为实行其“打通大陆交通作战”计划，向正面战场大举进攻，短短的八个月，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贵州。12月5日，贵州省重镇独山失守，日军威胁四川，使重庆陷入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也有迁往青海、西宁的谣传。在形势讨论会上，周恩来问：“独山失守了，各位都有些什么看法呀？”大家反映了一些人心不稳的情况后，周恩来说：“大家要安心，真的若重庆也沦陷了，不要紧，我们就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那时对抗战救亡工作，不是更可以大显身手，放手去干了么？”

周恩来的话稳定了人心，大家不但没有悲观情绪，反而增强了斗志和信心。

在重庆，高崇民很重要的任务是做统战工作，不仅要去做东北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还要做上层统战工作，周恩来直接领导高崇民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当时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尚清、刘哲、邹作华、万福麟、冯庸等，均住在长江南岸之南山。高崇民经常徒步从猫儿石到南山，向他们约稿和交换情况，但他们终日打麻将赌钱，言不及义。高崇民很气愤，在《反攻》上发表了一篇《希望于东北元老者》，批评他们失土有责，生活习惯如故，污南山之竹等等，使元老们恼羞成怒，向蒋介石告状，引起了一场风波。此事周恩来知道后，对高崇民说：“你的文章词严义正，但言词激切，方式上有点问题，以后还要注意方式方法才好。”有一次在学习会上，杜弘如提出：“冯庸太顽固了，他的工作真难做，我看对他放弃了吧！”周恩来马上说：“不能这样，你们看，蒋介石不是比冯庸更顽固吗？我们党现在还在对他进行工作呢？革命工作就是艰苦的，不能泄气，还得去做。”周恩来就是这样指导他们坚持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高崇民依然坚持经常去南山做“东北元老们”的工作，感情上有所扭转，工作上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日本投降后，“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会员，要出川回东北，高崇民去向元老们筹措经费，莫德惠当即给了两万元。

四

日本投降以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亲自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安排了高崇民去飞机场迎接毛泽东。毛泽东来后，大家都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和谈判的情况。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终于平安飞回延安。十分感人的是，第二天，周恩来就到高崇民他们的学习小组，一进门就说：“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已于昨日下午安抵延安，压在我心上的这块石头，这回算放下啦！”他坐下来又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到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东北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周恩来高瞻远瞩，对东北的工作，作了战略性的部署。

会后，高崇民到红岩村，向周恩来具体请示汇报。10月23日，高崇民在张之善家中主持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决定“东总”21人立即返回家乡东北，从事地下工作。要求大家各找回东北的门路。在此之前，蒋介石令何柱国组织“东北行辕”，何柱国动员吴一凡去“东北行辕”任职，吴表示不干，一口谢绝。回来后，吴一凡对高崇民和阎宝航讲了这个情况。高崇民说：“好样的！有骨气！”第二天高崇民到红岩村，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周恩来说：“吴一凡应去‘东北行辕’任职，我们想找关系打进去，都找不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当去才好！”高崇民觉得周恩来看得远，所说极是。他从红岩村回来，就找到吴一凡同志，告知他周恩来让他借机去“东北行辕”。吴一凡说：“我已经回绝了，怎么办？”高崇民说：“你想法转个弯，再去说说！”吴一凡又去找何柱国表示：我回去后经过认真思考，愿去“东北行辕”工作。“东总”的其他同志，大都是高崇民通过第六战区孙蔚如长官驻渝办事处处长王惟之的帮助，用他们的护照和介绍信离开重庆，分别回东北的。

1945年10月，高崇民为防备特务暗杀，已从乡下搬到王化一家，移住太平公司楼下。这时叛徒特务袁晓轩经常去高家，执行监视任务。一天高在街上遇到了老朋友马愚忱，马告知他：共产党已发表你为安东省主席。高崇

民听到之后，感到这个消息对他十分不利，遂立即到红岩村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原来也考虑高崇民受蒋介石的软禁，戴笠派特务袁晓轩以同乡名义，经常去高崇民家中监视；同时，高崇民又有妻子儿女，需要妥善安排，才能逃脱戴笠的罗网。现在情况紧急，需要尽快让离开重庆。这时候正值张友渔要随其爱人韩幽桐去上海，韩幽桐是共产党员，公开的职业是美国新闻处的记者，她随美国新闻处包租的船迁往上海。美国新闻处决定其职员可以带家属，韩幽桐即将张友渔的名字报上了。这时候周恩来把张友渔找来说：“你是公开的我党驻重庆办事处的人员，你离重庆比较容易，崇民是软禁的，他必须偷着走才能离开重庆，是否让崇民顶你的名字，坐美国新闻处的船走，可能不会出问题。”张友渔同意了。周恩来告知高崇民这个决定，同时让高崇民的爱人王桂珊带着孩子坐汽车走陕西。高崇民换了服装，在11月21日晚，顶替张友渔的名字，跟韩幽桐经上海、天津到了北平，潜住孟用潜的三嫂家中。1946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一天周恩来把张友渔叫去说：高崇民和韩幽桐已到了北平，应设法让他们安全地回东北，我说你写，起草个电报稿，发给张家口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电文是：高崇民、韩幽桐已到北平，请设法迅速安全地掩护他们去东北。2月底，高崇民、韩幽桐安抵沈阳。

1947年8月5日，周恩来从延安给高崇民带来一封信，内容是“民盟二中全会决议由李敷仁兄交来转托如下：（一）民盟二中全会决议，由总部派遣适当人员，任盟务特派员，分驻东北、华北，担任该区域内盟员之联系及解放区盟务与总部之联系……（二）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决议，东北解放区盟务特派员由高崇民同志担任。”从此，高崇民除担负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以外，尚负责东北民盟的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高存信白竞凡）

周恩来与夏衍

夏衍（1900—），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左联成立，被选为常务委员。1941年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影协主席、中国剧协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其主要著作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懒寻旧梦录》等。

——编者

“结交青松枝，砥行碧山石”，这是古人作为知己共勉的诗句。以松之坚韧、石之庄重来譬喻人的操守，颇为形象。用它来形容周恩来和夏衍之间的相交与相知，很是恰当。

夏衍是20世纪的同龄人。1927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夏衍入党前就知道周恩来的名字，入党后在从事文化工作前后也曾间接地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但正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文艺、新闻和文化统战工作，是从1937年8月开始的。从此，他不仅把周恩来当作一生征途的引路人，并且努力使自己的全部行止以周恩来为榜样。

从1937年初秋至1966年初秋，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仅仅29年。但是这一头一尾的两个阶段，恰巧是近30年来中国人民灾难深重、无限忧虑的时刻。作为长期密切配合的上下级和肝胆相照的战友，随着客观环境的曲折变化，他们之间更加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夏衍不断发表翻译作品，引起周恩来的注意，认为他可能是一位条件很好的文艺工作骨干。

夏衍入党后，最初编入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党小组长是钱杏邨（阿英），同组有孟超、戴平万等。开始在曹家渡和杨树浦一带从事工运工作，用的是真名沈端先。虽然过去他也在一些进步报刊投过稿，在日本就认识了郭沫若，回国后又先后结识了鲁迅、郁达夫和蒋光慈等，更早些时，他在《浙江潮》上的文章，还曾得到陈独秀的重视，但还只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和他同一支部的党员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都已是作家。后来，经人介绍，主持开明书店的夏巧尊和章锡琛请夏衍翻译日本作家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他就不断翻译了多部著作，还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尤其是他翻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当时，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兼任中央军委书记，经常在上海指导中央局的工作。他很重视文化统战工作，正在物色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他看了夏衍的一些翻译作品，又从潘汉年那里知道一些作者情况，认为沈端先“可能是个条件较好的文艺骨干”；他指示潘汉年作进一步的了解。潘汉年找到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即康生）。赵容虽是山东汉子，却圆滑机巧。他把夏衍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潘汉年，颇为世故地说：“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的。”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立即调动夏衍。当时，不仅国共双方斗争激烈，党内也正在清算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便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去了。

夏衍被推举筹建“左联”，从此决定了他大半生的命运——既是一位作家和编辑，又是党在文化统战方面的重要负责人。

在此期间，上海文艺界——当时作为进步文化中心的革命文艺团体和个

人之间开始了各种论战。

春天，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钱杏邨也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这两篇文章，都点名批评了鲁迅。鲁迅接着发表了反驳的文章，于是爆发了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论战。

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也展开了论战。创造社的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批评了太阳社蒋光慈的作品；太阳社的钱杏邨又在《太阳月刊》上对李初梨进行反驳。冯乃超的文章中又批评了前期创造社的郁达夫和张资平，形成了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斗争和创造社内部的分裂。这是20年代末期进步文化界的不幸。但这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进步文化界的状况。当时那些作家绝大部分都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青年，经历和阅历不足，难免浮躁。当然这同中国革命总的形势和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状况，也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的某些裂痕，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了新的发展，便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自建党以来，党中央深入抓文艺工作的开始。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中央向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指示；为加强文艺界各方人士的联合，还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李立三特意找鲁迅征求意见。鲁迅表示支持，并答允由他出面牵头筹办。接着，就是具体的人选问题了。

潘汉年和钱杏邨等推荐夏衍；在上海的鲁迅和在日的郭沫若也间接向周恩来推举夏衍。于是夏衍便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他在1930年和鲁迅、田汉、郁达夫等52人发起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接着又筹建左翼作家联盟。当时潘汉年以中央文委书记的身份领导筹建（后由阳翰笙接替）。夏衍是执行委员，还担任了文委的部分领导工作。他参加“左联”领导，不仅因为他的才能被发现，还因为他始终没有参加上述的论争，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关系都不错，他的实际能力和客观条件，都具有调和鼎鼐的条件。从此，就决定了夏衍的大半生的命运——既是一位作家和编辑，又是党在文化统战方面的重要负责人。

1929年冬天开始筹备“左联”，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成立。从此，夏衍开始了他的专业的文艺工作——包括从事编著戏剧、电影剧本和散文、理论的撰写，文艺报刊的编辑工作，以及文艺各个领域的组织领导和文化统战工作，开始了他的作家、评论家和文艺活动家的生涯。

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之前，安排夏衍与特别党员杨度联系。夏衍不负重托。

1931年12月，周恩来和潘汉年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入中央苏区。离沪前，周恩来想到，必须为与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杨度物色一个既可靠又能与之适当相处的联系人。研究结果，决定让夏衍来接替潘汉年。

杨度是当年劝袁世凯复辟登基的“六君子”之一，当过袁的秘书长。但是从20年代开始，他逐步看清自己走错了路，后来靠拢进步人士，并且为共产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1929年，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一名秘密共产党员。当时，他表面上是杜月笙的清客，住在杜的一幢别墅里，实际上这幢房子成了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点。虽然从前夏衍也曾进入这幢房子，却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杨度，杨度也不知道他就是影剧界有名的“黄子布”和“蔡叔声”（夏

衍当时的笔名)。自从接受任务，夏衍与杨度很快就熟悉了。杨度很尊敬这个刚满 30 岁的年轻人，向他坦率地解剖了自己。他很想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要求公开参加革命斗争。

“端先兄，请你务必转告翔宇兄（周恩来的别名），让我到前方去，我不要优待，只求做点实际工作！”

夏衍理解杨度的心情，更领会中央的意图，婉转地劝告说：“哲子（杨度别字）先生，你的情况和一般党员不同，以您和各方面的关系及社会上的影响，您留在这里为党工作，对革命更有利。”“可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居然还住在杜月笙的家里作寓公，党内同志和民众将怎样看我？时代在前进，人也要变，我希望人们忘掉我过去的那段经历。可是……”杨度真有点委屈。“正因为您过去在北洋时代有那段经历，所以杜月笙对您敬如上宾。您就可以在他们的圈子里了解到一般党员无法了解的东西，起到一般党员起不到的作用！”

“这是您的高见？”杨度有所触动地问。

“据我所知，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期望您的。”夏衍认真地答道。

“哦……！”杨度眼睛一亮，微笑着不再争论了：“如果是翔宇兄的意思，我自然服从。”

此后杨度遵从党的安排，始终以他的特别身分，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直到逝世。

建国以后，夏衍一直关心着杨度的家属，为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安排了适当工作，并随时把有关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说：“当年党在艰难中接纳了这样一位正直的老人为党员，也算是患难之交，你代我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他们有困难，也可以随时找我！”

“好的。不过……总理，杨度最后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事实，应该适当在报纸上介绍一下；下一代人，都不知道了。”

周恩来点点头：“对，这件事一定要做好。”可是不久“左”的思潮又盛行，此事总没有机会再提。直到 1975 年初冬，周恩来的癌症已经扩散，他知道自己即将不起，仔细回想有些事必须在生前交待和安排好，其中之一便是杨度问题。当时夏衍刚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行动还受着监视，周恩来不想再给他添麻烦，就让秘书告知主管文物工作的王冶秋，让他记录在案。直到江青一伙垮台，夏衍获得自由，才继王冶秋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写了《关于杨度二三事》一文，把这一段历史公诸于世。之后，夏衍又出面向有关方面建议，使杨度遗骸重新安葬在上海革命公墓。

夏衍永远不会忘却，当年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交给他的这件重要任务，今天要把未竟的后事继续完成，并以此作为对敌人的报答。

接受周恩来指示，夏衍创办了《救亡日报》，并出任总编辑。这是他散文、杂文创作的旺盛时期，并且团结大批进步文化人，积聚革命力量。

在 30 年代中期以前，党交给夏衍的任务，主要还是领导进步文化运动。他奉命参与建立了“左联”；又奉命进入电影界，成为中国电影界较早的专职编剧；还奉命和田汉等开展了新戏剧运动。从 1935 年开始，“夏衍”的笔名问世，周恩来经过长时期观察，认为夏衍不仅应该从事进步文艺工作，还应该从事文化统战的工作。尽管他们始终没有正式见过面，但是周恩来又开始考虑给夏衍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了。

这是 1937 年 6 月间。夏衍突然接到影星王莹转来的一封信，信是密封的，后面只写了个“严”字，看字迹，分明是在上海消失了 5 年的潘汉年写来的。信的内容是约夏在爵禄饭店见面。潘汉年原是上海中央局的文委书记，又是特科负责人，掌握文武两条线，他秘密离开上海，是有更重要的任务。这次他突然在上海出现，夏衍料到，一定又有新的重要的任务。见面后，夏衍很想知道潘这几年的情况，但是党的纪律不容他多问，他只大胆地问了一句：“听说伍豪（周恩来）也回到江南了？”

潘汉年没有正面回答夏衍。他问：“听说你们这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影响也很大嘛，队伍也扩大了。”

夏衍正想汇报，潘汉年却说，“不用说了，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后，也知道了你们的困难和苦衷。我们还是来谈谈现在的工作吧。现在已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要争取斗争的合法地位。‘八一宣言’都看到了吗？”

“已经传达了，‘左联’和‘剧联’的同志都讨论了。”

“这就是党中央的精神。要组织公开的统一战线，文化和新闻界都要适合当前一致抗日的形势，为了团结更多的朋友，成立统一的组织，以利工作。”

潘汉年和夏衍研究了成立上海电影编剧、导演协会（原名“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后为称呼方便把“人”字去掉）的事，不久，潘汉年、唐瑜又和夏衍商量筹办《早报》，夏衍筹集了 500 元法币作为部分筹办费。

过了半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上海人民抗日情绪高昂。7 月 10 日晚上，潘汉年与夏衍在光明咖啡馆见面，潘说：“有位同志要见你。”

“哪一个？”夏衍听语气，知道不是一般同志。

“不用问，你跟我走。”潘汉年领着夏衍来到蒲石路一幢房子前，敲敲门。来开门的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一见面，就伸出手来：“你是沈端先同志吧，我就是周恩来。”

夏衍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在特定的形势下，党的地下活动困难很多。你们文化界可能困难更不少。你虽然没有提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我们都已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共产党人既然择取了这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就要准备它是很长的，也会很曲折的，就不能计较这些得失。没有宽大的胸怀，就不是共产党人！

听到这里，夏衍很感动。他知道，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五六年的革命历程中，走过了更曲折，更艰难的路，因此，淡淡一笑说：“比起前方，我们毕竟安定得多，没什么！”

“现在，你将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接着说：“同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开，有许多事要和国民党合作，需要一些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分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内的人，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夏衍不由得愕然。他面有难色地说：“这些工作，我过去都不熟悉。”

“什么事情都是从不熟悉到熟悉的。从前你进入电影界、戏剧界，不也是逐渐熟悉起来的吗！你认识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有文人，也有做官的，工作更方便。”

在周恩来的耐心开导下，夏衍接受了任务。不久他奉命创办《救亡日报》，并任总编辑，郭沫若任社长。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名义上也是国共合作的

报纸，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11月12日上海沦陷时停刊；1938年1月1日又于广州复刊。这中间经历了许多周折，因为受到干扰，发行量不高。同年初夏，周恩来在武汉听夏衍的汇报，畅谈了近4个小时。恩来问道，“你们的报纸日销8000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他见夏衍一时答不上来，就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纸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纸。”他指示夏衍要吸取邹韬奋办《生活》杂志的经验，多刊登一些通俗易懂、精辟动人的文字，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要讲点国民党不肯讲的，《新华日报》又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夏衍辗转转到桂林办报。他一直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自己写社论，也及时写针砭时弊的小文章。这一阶段，是夏衍的散文和杂文创作的旺盛时期，同时也写了不少剧本。并且团结大批进步文化人，积聚了革命力量。

夏衍在重庆期间，作为周恩来在文化统战方面的助手，做了大量工作。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力量日益壮大，终于冲垮了顽固派的精神防线。

1941年初，因报道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夏衍带着《救亡日报》的部分人员到香港，转入《华商报》。

香港沦陷后，夏衍化名黄坤，和一批文化人秘密化妆回内地，在海上颠沛数日，又辗转到了桂林。当时桂林集中了文化界的精英，抗战气氛很浓。4月，周恩来让夏衍到重庆工作。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为了便于在大后方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他亲自兼任文化组组长。刚回到重庆的夏衍，担任了中共南方局委员兼文化组副组长（另一位副组长是徐冰）。同时，夏衍也参加了《新华日报》的部分领导工作，撰写社论和评论及重要新闻。1945年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和专访，几乎都是夏衍写的。这一阶段，夏衍的创作也十分旺盛，先后写出了《秋瑾》、《赛金花》、《上海屋檐下》、《一年间》、《赎罪》、《愁城记》、《复活》、《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芳草天涯》、《离离草》等，经常在重庆和西南各地上演。

《芳草天涯》是夏衍1943年创作的，1944年上演时，仍不够完善。为了避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口实，周恩来曾经和夏衍当面讨论过如何进一步加工的问题。这时有位同志写了篇批评文章，送到《新华日报》编辑部。恰巧周恩来因事外出，夏衍自己又不便处理，就发表出来。重庆的国民党右派因此幸灾乐祸。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看到报纸，很生气，曾让南方局秘书张颖告知夏衍，可以写不同意见的文章。夏衍认为：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应该照顾《新华日报》的影响，宁可个人蒙受委屈，不要削弱自己的力量。为此，周恩来在南方局的干部会议上表扬了夏衍。

当时，欧阳予倩打算编写《武松与潘金莲》，为潘金莲翻案。周恩来认为没有必要为虚构的传奇人物翻案。他和夏衍的看法一致，认为民间对是非向有标准，美丑正邪，不以男女来分，片面地为了妇女解放而混淆是非善恶的界限，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这本来是内部的议论，但是有的党内同志竟公开挑起辩论，欧阳老秉性坦荡，也打算写文章反驳。周恩来找夏衍商量怎么办。夏衍认为：欧阳是著名艺术家，又是党外爱国人士，我们不能在顽固派面前公开与民主人士论争。个别同志考虑不周，可以向欧阳老致歉，但不必打笔墨官司。这样终于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1945年初，蒋介石看到大后方许多爱国的作家艺术家，在周恩来的精神

感召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成绩卓著。他就对周恩来说：“你们办报、办剧团，很有经验。我要请你帮忙，就是我们三青团办的青年剧社没有专家领导，《扫荡报》将来要改为《和平日报》，也需要能干的记者，内容才能好看，请你推荐几个好不好？”周恩来就让夏衍找到马彦祥，要他去办青年剧社。马彦祥是位能干的作家和导演，组织能力很强，他追随中国共产党许多年，多次要求入党，因为社会关系特殊，周恩来曾经亲自对他说：“根据您的特点，留在党外工作，对党更有利。”但是他此刻听说要他去为三青团办剧团，立即发火：“我参加不了共产党，也决不能去为三青团办事！”夏衍告诉他这是周公的决策。马彦祥当即表示服从。同时，夏衍又动员和党感情很深的女作家凤子到《扫荡报》去当记者。这两位同志当时在国民党眼里是“中间偏左”，国民党用他们，为了标榜自己“开明”，而他们利用这一身分对党做了许多工作。

40年代，夏衍作为周恩来在文化统战方面的助手，在重庆做了大量团结工作，为大后方进步文化力量的壮大，最终冲垮国民党顽固派的精神防线做出了贡献。

夏衍奉命去香港、新加坡，周恩来为夏衍饯行。在香港工作期间，夏衍经常守候在电讯旁，随时准备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兵遣将，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军民。《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已成一纸空文，长江南北、大河上下，又笼罩着密密的战云。

当时中共代表团除长驻南京梅园外，在上海思南路107号亦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到上海小住。而夏衍，在此之前——1945年9月，即奉周恩来同志指示来到上海，筹备《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因此他们常能见面。周恩来每来上海，夏衍必到周公馆探望和汇报工作。1946年五、六月间，形势已十分险恶。周恩来考虑到夏衍的安全，告诉他以后不要亲自到这里来了，有事请联络员转递。夏衍笑道：“您放心，白色恐怖最厉害的年代，我被通缉多次，但还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上海我熟悉，抓不住我！”周恩来严肃地说：“你在党内多年负责文化新闻方面统战工作，连蒋介石都知道你，他们岂会放过你。我们不能太书生气，要准备形势突变。还要与文化界、新闻界朋友早点打招呼。不久，周恩来同志指示夏衍到新加坡去，任务是：向陈嘉庚先生慰问和致意，并向侨领介绍国内战事形势和我们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10月17日，夏衍一切收拾就绪，秘密来到周公馆辞行，乔冠华、龚澎夫妇也来了。他们奉命去香港，也是来辞行的。周恩来说：“今天我请你们吃螃蟹，还在四马路那家馆子。”他们的车子刚出公馆，司机便在反光镜里看见特务的汽车已尾随在后。周恩来不由两道浓眉紧锁，为了保证夏衍等同志安全离沪，今天他只有自己出面解危了。他关照司机：“照正常行驶，不紧不慢，到林森路口车子立即停下，要快。”

司机照办了。特务们的车子在后面追赶，没想到前面来个急刹车，几乎两车相碰。特务还在诧异中，周恩来已经从车里出来。他关上车门，对慌忙下车的特务说：“你们几位辛苦了！”特务们面面相觑说：“嗨嗨……不，不……周先生！”周恩来笑道：“原来你们还认识我？没有认错吧？”特务们弯着腰说：“是……是的，周先生！”“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盯我的车？是谁给你们的命令？”特务们顿时语塞，忙说：“误会……误会了！”“既然如此，请你们马上把车开走，否则我要报警了！”“呃……好

吧！”特务们只好陪着笑钻进汽车，调头开走了。这件事为周恩来给夏衍等人的钱行，增加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夏衍在新加坡完成任务之后，于1947年回到香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夏衍在香港的工作也日益紧张和繁忙，除了新闻工作外，又要帮助海外进步人士摆脱特务的监视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还要争取国民党营垒中倾向人民民主、愿意弃暗投明的上层人物幡然来归，并为他们返回大陆妥善地作好安排。他经常守候在电讯旁，随时准备和已在华北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胡愈之等许多著名人士先后自港澳回大陆，夏衍、许涤新等都克服了种种干扰和阻碍，出色地完成任务。爱国人士钱昌照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经济专家，他经管的行政院直属的物资救济总署，有许多财产都还在上海，只有他知道隐藏在哪里和如何启运。他通过夏衍及时向周恩来反映。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党中央及时作了安排。为了安全，周恩来启用了在香港的地下党另一条秘密通道，钱昌照终于如期归来。

夏衍奉命接管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嘱咐夏衍：对文学家、艺术家，一定要登门拜访，而不是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

1949年4月末，夏衍和潘汉年、许涤新接到命令：回北平，准备接收上海。他们随即动身，绕道天津到达北平，先见到了朱德。5月10日至16日之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在西郊香山先后接见了夏衍和潘汉年、许涤新等人。周恩来5月12日又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郭沫若、茅盾、胡愈之、萨空了、周扬、夏衍、郑振铎和沙可夫，商量7月份召开全国首届文代会的事，并让夏衍提出一个在国统区的著名人士参加文代会的名单。

夏衍临去上海前，周恩来对他说：“你是老上海了，对文化界情况是熟的。但是你此番去情况大不一样。过去你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和他们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是平等坦率的，现在你是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是政府官员，别人对你就不一样。你到了上海，在文艺方面要多依靠当地有影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戏剧界象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这样的人物，一定要亲自登门拜访，而不要把他们找到办公室里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夏衍等于5月16日南下。途中，陈毅宣布了中央的决定：陈毅为上海市长兼军管会主任，潘汉年为副市长兼市委秘书长。为了开展上海的文化工作，陈毅自兼文管会主任，夏衍为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又兼文化局长。

因铁路沿线遭破坏，行车甚慢，5月17日傍晚，夏衍一行才到达济南。前来迎接的是山东省省长康生。

康生显得十分活跃。因为潘汉年与他原先就话不投机，所以康生老缠着夏衍说话。“你们知道吗？夏衍同志原先叫沈端先，夏衍是他的笔名。”康生在招待一行人吃饭时，兴致勃勃地说：“当时我在闸北区委当书记，真是荣幸，党内好几位当代大文学家都在闸北工作。我知道夏衍同志是位人才，所以周恩来同志通过汉年同志来了解他，我就郑重地推荐！”潘汉年淡淡地一笑说：“康生同志的领导艺术，素来是有名的！”

由于周恩来的介绍和嘱咐，陈毅对夏衍十分尊重。他们刚在上海市郊的指挥部见面时，陈毅就坦率地说：“上海文化方面的事，你既有经验又有基础，尽可放手去干。所以让我挂个文管会主任的名义，因为在军管时期，我们带兵的压得住，无非是为你们撑腰。”

为了和文化界同志打成一片，并且相互增加友谊，陈毅很主动和夏衍等

接近。一次，他对夏衍说：“听恩来同志说，过去你们文化界同志，常到‘霞飞路’的维那桑斯（文艺复兴）咖啡厅去，那里的牛肉很好吃？”

“是的，那是白俄开的点心店，地方不大，外表不起眼，但颇幽静，我们不少同志常在那里碰头。”

“我过去在上海读书，现在已很久没有到那一带去了，你陪我今晚去吃夜点心吧！”

于是，他们几个人去吃了夜宵。夏衍还以当年地下党活动的方式，事先事后都作了检查和布置。陈毅自己也带了秘密警卫，度过了一个很有趣的夜晚。

但是第二天，市委保卫局长知道了，批评夏衍说：“上海刚解放，还有暗藏的匪特，你怎么可以带陈市长到那种地方去？今后不但不允许陪陈市长去，就是你，身为市委常委，也不能去了！”

夏衍心里想：我们秘密来去，就是特务发现了临时买砒霜也来不及。但是，他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还是认真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夏衍说：“你们一个是名士，一个是儒将，倒是一番佳话。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还是要注意安全。”

夏衍了解上海文艺界的特点，尤其刚解放不久，为了有利于文化人士活动，他尽量把一些活动搞得生动活泼。譬如在节约前提下举办舞会和茶话会。开始，有些从解放区来的政工干部看不惯，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作风，甚至公开抵制。夏衍认为，在新旧交替的短暂时期内，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要逐步引导，不能用狭隘的农民意识来对待这些问题。其实，夏衍本人对舞会等活动并不喜欢，他还闹过笑话。

有一次，庆祝中苏友协成立一周年，举行舞会。宋庆龄邀夏衍跳舞，夏衍为难地对孙夫人说：“很抱歉，我不会。”

“哦？您当年在上海工作，竟没学会？”宋庆龄问。

周恩来是了解夏衍的。他在旁插话说：“我40年代在重庆时就向他提出，要学会跳舞，否则，在热闹场中接头，敌人会怀疑的。”

“是的。”夏衍很为难地说：“我也曾经想学，但学不会。”

夏衍主持上海宣传和文化工作虽然为期不久，但在短短几年中，他依靠陈毅的大力支持，工作上比较大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得到较好的安排。当然，在建国初期工作上缺乏经验和存在一定的左的思想影响，也有失误的地方。但是，夏衍在上海期间，时刻想到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一定要把上海各方面的力量都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如果不好以政府名义，就以艺术团体名义，就以你个人的名义，以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使他们安安心心地留下来，高高兴兴地工作。特别要注意：只要他们的一技之长确能有益于人民，并且今天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作贡献，就应该热情欢迎。老帐不要再去纠缠，只要弄清楚了就好。对左、中、右三方的代表人物，在生活上的照顾一定要一视同仁，在工作安排上也要各得其所。”夏衍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夏衍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干挠，他开始惶惑了。他推荐的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拍摄的影片《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他自己写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话剧《考验》，也被当时市委的一位领导人以“宣扬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容易引起不满党的领导”的罪名而被下令停演；他在作家座谈会上强调学习以充实革命本领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讲话，也被不点

名地反复批判；他提倡的文化干部要和作家艺术家肝胆相照，不要摆官架子的平易作风，也被冠以“宣扬自由主义”的帽子。总之，在饶漱石主持工作时期，连陈毅也受到排挤，因此助长了一些趋奉者在文化领域推行的宗派活动，夏衍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夏衍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但两年后处境又艰难，他声泪俱下地向周恩来反映文艺界情况，希望保护老同志和老朋友的积极性。

夏衍从事文化工作，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是他第二故乡，他对上海感情深厚。但是，他终于离开上海，被调到文化部，担任分管电影和戏剧艺术方面的副部长（起初尚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这既是中央统一研究决定的，也是有关部门领导所期望的。周恩来早已考虑到夏衍在上海工作较难开展，但他一向对在自己身边工作较久的同志要求严格，没有轻易提出调动。

有一次，周恩来与毛泽东闲谈讲到要加强文艺方面的发展时，提到了夏衍。江青讨好地在旁插嘴说：“夏衍，老作家了。咱们的电影事业，就是他们开创出来的！”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就这样，经许多同志要求，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批准，夏衍便被调到文化部工作了。

当时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来自几个方面：有早期在白区工作的（有的后来到了重庆）；有从延安来的；有来自其他解放区和军队的。周恩来对夏衍说：来自各方面的同志各有不同的经历和经验，你长期从事团结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和各方面同志合作得很好。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教训是内耗太大，文化界一定要消除那些不正常的圈子和山头，首先要从我们自己的行动开始。”

夏衍理解周恩来的心情。其实，自1955年以后，北京文艺界的问题也比较麻烦了。在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情况下，已无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可言。一次运动伤害一批人，造成互相隔膜和冷漠的恶性循环，使事业不能健康发展。

1959年，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中宣部的陆定一等和文化部的夏衍等，研究如何在文艺界反对左的思想倾向，后来被“庐山会议”的冲击波改变了方向。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文艺十条”，不久又被彻底否定。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田汉和阳翰笙先后被罗织了“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夏衍则因在一篇“繁荣电影创作”的讲话中，强调了在广阔的生活中寻找多种题材，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起先康生等少数人在小会上点名批判，后来在社会上作不公开点名的批判。夏衍就成了文艺界“离经叛道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上海公开宣布：“夏衍是我们上海不受欢迎的人，今后请他不要插手上海的文艺工作！”

康生更逼着周扬要夏衍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公开检查。他抓住夏衍不放，其目的实际是要借此破坏周恩来在文化界的威信。因为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电影、戏剧创作会议上，曾号召作家要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康生对“电影二十三条”的攻击尤为激烈，这是因为它是根据周恩来参与制定的“文艺十条”的精神制定的。康生一箭双雕的伎俩，一开始就被周恩来识破。因此当周恩来听康生在政治局汇报文艺界的“敌情”时，当场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悻悻地说：“不敢，不敢。”事后，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谈了当时他的意见，这场

栽赃活动才被制止。

到了 1963 年，形势更加严峻。由上海的柯庆施出面，实际上是在江青、康生等的怂恿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具体炮制的两个严重诬陷文化部和文联的报告，矛头明指中宣部，实际上隐指周恩来。毛泽东缺乏调查研究，作了批示。这两个批示下达后，便在文艺界掀起一场“龙卷风”。夏衍心情十分沉重，他恳切地向周恩来反映说：“我们的工作肯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批评也是必要的。但许多同志多年来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是不能全盘否定的。有不少同志，虽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但作为一个战士，从 20 年代开始，几十年来，为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事业舍生忘死地工作。尤其是有些一贯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作了可贵的贡献。要是没有这些同志的努力，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如此蓬勃发展。他们一片冰心，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他们，辜负他们，否则，我们的信誉又在哪里？”

夏衍想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不禁声泪俱下地对周恩来说：“胡公（30 年代初周恩来蓄须，当时进步文化人呢称“胡公”）！我们过去许多‘左’的做法，伤害过多少自己的同志，也委屈过多少信赖我们的朋友！今天，正当用人之际，绝不能再恣意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了……如果要按‘批示’来对照，自然我们这些当部长的责无旁贷，要严办，就办我们，如果要搞‘人人过关’，岂不又要牵连一大批了！”

周恩来当然是赞同的，也很受感动。但他除了点头之外，有些话一时很难说。尤其夏衍被调出文化部，把工作关系安排到对外友协，被迫在家“闭门思过”和下乡“改造思想”，周恩来还能说些什么呢？当时北京出现的不正常的政治形势，其来源和发展趋势，他自然比夏衍清楚，但党性原则使他不能对夏衍多说，他只能用深沉的语调说：“夏公，我们是相互了解的。我们不是圣人，也难免有错。但是你 30 多年来为党辛勤地工作，也曾出生入死，受了不少委屈，今天也还在为党、为人民受委屈。我相信你能正确地面对现实。你要保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必勉强自己。同时，我们党在近 40 年来领导文艺和文化统战方面的活动，成绩和失误，你是清楚的。但还有不少同志不清楚。你有时间要写一点回忆的文字，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应该认真地写一写，否则，将来下一代都不知道了！”

周恩来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夏衍的问题，但夏衍心里明白这是党的纪律的约束。正是这种约束，使他们直到永别，周恩来，就象邓颖超所说：他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说。”其实，他不但提醒了夏衍，并且还还为夏衍今后的处境考虑了。

夏衍“靠边站”之后，居然奇迹般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重要外事活动。这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以免夏衍遭江青毒手。

形势还在不正常地发展，并且急转直下。1966 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夏衍被派去农村搞四清，接受教育。后因病回京小住。他足不出户，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

一天，突然对外友协的秘书用车来接夏衍，说是中央指定他参加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

夏衍觉得奇怪极了：自己“靠边站”了许久，一直在报刊上被不点名地点名批判，怎么会让他参加外事活动，并且是“重要的外事活动”呢？

他应召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此时已飞扬跋扈的江青见面连招呼也不打，就把脸转了过去，她自然在这个时候绝不愿见到夏衍。

但是工作人员奉命把夏衍介绍给外宾。原来是印度尼西亚电影艺术委员会主席苏里亚达马海军上将率领代表团来访，中宣部、文化部、文联的领导人全都“靠边站”了，文艺领域已基本成为“旗手”的领地，所以江青“责无旁贷”地出面。但是印尼电影界仅仅把她当作出来应酬的“第一夫人”，根本不和她谈艺术的事，并且还让她转达印尼电影界对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的敬意。因此，江青有意向周恩来施加压力：“他们对我这样不了解，我何苦带着病去应酬！”她的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在这“非常时期”，给她一顶文艺方面的桂冠，以便顺理成章地掌握权力。可是周恩来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又似乎出于关切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向江青提出：“既然他们熟悉夏衍，不如也把他找来，让他解答一些具体事情，你也可减轻一点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就这样，夏衍便奇迹般出现在江青面前，并且受到印尼电影艺术家们的热烈欢迎。这是周恩来在生前最后一次为夏衍争取来的任务。这显然是为了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非常时期，使江青一伙一时不便对夏衍下毒手。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登出那张接见时的照片，人们意外地看到夏衍和毛泽东、周恩来及江青一起和印尼电影代表团的合影。

当然，这对江青来说是受不了的。她忿忿地说：“真不象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康生则不阴不阳他说：“人家是公认的‘祖师爷’嘛！这说明，在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还远远没有深入。”

周恩来为夏衍能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重要外事活动中出面而欣慰，同时也考虑到会因此招来江青一伙更大的忌恨。他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抓紧治疗。如身体好，可以到下面去看看，但“南方不要去”。周恩来所说的南方，是指上海和杭州。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伙正在猖狂之际，这一带搞得最凶。很明显，周恩来的意思，就是暂时还以安全为第一。

夏衍理解周恩来的心情，他也知道，此刻的周总理已经不能总理一切，处境也日益艰难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夏衍被关押八年零七个月，周恩来多次营救而未能如愿。

夏衍是在1966年12月中旬被“四人帮”秘密逮捕的。先是拘押在“群众专政”的监管所，后来送到秦城监狱，先后并八年零七个月。

那年12月的一无傍晚，一伙着军装但没有标徽的年轻人，突然闯进夏衍的家。夏衍镇静地说：“请出示证件，你们是代表哪个执法机关？”这批不伦不类、非军非警的造反派武装人员猥猥地说：“少噜哝！走吧！”

夏衍心里在盘算：如果此行不会很快被害死，就要准备坐牢。但他身无分文，在盥洗室对女儿沈宁说：“给我一点钱。”被监视

着的沈宁无法出去筹钱，只能把口袋里仅有的5元多零钱给他说：

“等您有了确实地址，我会送去的。”

夏衍苦笑了一下，对儿子沈旦华说：“你和姐姐要照顾好妈妈。”他深知，此去容易归来难。然后，泰然地跨出房来，默默地向缠着他脚的心爱的花猫告别，并向屋子和庭园流连地望了一眼，来不及也不忍向妻子蔡叔馨告别。这位66岁的老人，40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国民党特务、日本宪兵的追捕，哪里想到，今天竟被自己的政权机关秘密逮捕了。

夏衍被捕多日后，周恩来才辗转从身边工作人员的报告中得知。他立即让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结果都推说不知道。当时负责公安的谢富治诡谲地说：“现在造反组织抓人、关人是常事，公安部门没有线索，也难查。”“中

央文革小组”的一帮人更轻描淡写地说：“黑线和黑帮人物，正是批斗的主要对象嘛！谁都可以抓走的。”还有一些当时貌似公正却心怀叵测的人说：“是金子还是蜡，烧一烧也能有个分晓，您别管了。”周恩来生气地说：“对这样的干部随便就抓，不作个交待怎么行！”

早在1966年夏天，当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击一些知名人士时，周恩来就拟定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名单呈送毛主席，秋天，经毛主席批准后下达。但很快又被“造反有理”的口号冲破了，以至国家主席遭武力批斗，田汉、老舍等惨死。这时残酷的批斗已无法制止，周恩来同志干脆以“监护待查”的名义，把一些重要人物保护起来。但对象夏衍这样的干部还来不及提出保护。何况突然“失踪”的人日益增多，一时都很难找到。

其实，夏衍是被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组织，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起先关在秘密拘留所，在不断的残酷刑讯中，夏衍右腿足踝以上被打断。夏衍的生命力很强，在受了许多内外伤，基本上不给治疗的情况下，居然自己逐渐恢复。但右腿因萎缩而短了一截，成了终身残废。尽管这样他终于还是活了下来。

酷刑审讯是硬要逼夏衍招认在上海时曾打击过一位“女影星”。夏衍心里很清楚，这是在逼他讲出江青——即蓝苹的名字。他矢口否认有什么受打击的女影星。他知道，为了避免“炮打”之嫌，这批爪牙们自己口中决不会说出“蓝苹”两个字。这样的捉迷藏，打手们也无计可施，只能在肉体上摧残夏衍。当夏衍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时，他们又让医生来给他治伤。来的是一位军医。他一见夏衍的惨状，失声说：“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如果真是罪大恶极，就可以枪毙，为什么要用酷刑！”这种不加掩饰的愤懑之声，在这样的场合是少有的。

夏衍吃力地睁开眼睛，昏花中看到这位军医神情严肃，而治疗中手脚又是那样轻捷。几次治疗后，夏衍认定这是一位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医生。一次他欲言又止地喊了声：“医生……！”医生以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想让我办点事吗？”他见夏衍言语支吾，就干脆说：“要信不过我，你就别说了。”夏衍答道：“我是怕连累你。”“没有什么连累的，办不成，就不办。”夏衍神情严肃地说：“我想给一个人带个信，让他知道我在这里。”“送给谁？”夏衍没有说出名字，但是医生会意了：“好，我知道了，你快写。”

夏衍吃力地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但是没有写收信人名字。医生收起信，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要耐心。”

这位医生是总参医院的，还曾一度当过康生的保健医生，但是他看不惯康生这伙人的卑鄙伎俩。出于义愤，他冒着危险，把信送到京西宾馆交给周总理联络员之后，一言不发地走了。不知是此行被人窥见，还是其它原因，他再也没有被派给夏衍治病，而夏衍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的下落。

其实，信很快转到周恩来手上，他当即要求谢富治放人。谢富治说这是江青和康生直接搞的，他这个公安部长“管不了”。

有一天，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际，正好江青走进来。周恩来就当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故作惊讶地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说到释放夏衍的事，江青又喟然感叹说：“总理呀，你的心太好了。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革这批文化界头面人物的命嘛！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然后又露出马脚，说：“据我了解，他的腿早接上了，绝无生命危险！”说完，

扬长而去。周恩来陷入沉思中。而毛泽东似乎也在沉思，直到周恩来起身告辞，毛泽东始终没有说话。

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匆忙给夏衍等一批人定了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押解到秦城监狱。从此，夏衍就作为正式“政治犯”被关押了。

周恩来很快打听到夏衍等人关在秦城，派人就近保护，以免被他们暗中谋害。到了正式的监狱，倒使夏衍从“活材料”变成“死老虎”，再没有人去刑讯逼供了。他在监狱里独自孤寂地坐着。先是为了反复交待历史，不得不对逝去的岁月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后来索性对过去进行全面地回顾，往事却格外清晰起来，以至在他80岁后出版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那本回忆录不仅纠正了一些人的失误和讹传，也让广大读者比较真实地看到了那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当然就他自己来说，并不认为是绝对精确的，或还有讹误，有待补正）。

夏衍被关押了八年零七个月，才被假释回家。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同志的问题，江青和康生一伙总是多方阻挠，迟迟不放。直到1975年冬天，周恩来癌症全面扩散，毛泽东要人转告，希望他在生前就国家大事提出一些意见时，周恩来又提出了：应该关心那些跟党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包括至今尚在关押没有作出结论的人，应该尽快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年老病残的应该允许他们先回家。这样，夏衍才被假释回家。但是规定他不能随便外出，更不许离开北京市区。他家所在的南竹竿巷里委会的造反组织仍接到通知，要对夏衍进行监视，不许他“乱说乱动”。

夏衍回到家里，病中的妻子和子女们为他收拾好那间狭窄但又洁净的小屋。心爱的花猫在他被捕后早被送走，现在竟然奇迹般地回到老主人身旁，但是不久又安然地躺在夏衍脚旁死了。

夏衍回家不久，李一氓和廖承志等来探望他。廖承志还带来周恩来对他的慰问。“肥仔（廖承志的绰号），你见到胡公吗？他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夏衍问。廖承志答道：“他的病不会很快好，但是精神还不错，他要我向你问候。他要你安心养身体，这是他再三嘱咐的。”

“谢谢他了！”夏衍胸头涌起一股热流。他深知，周恩来不仅病重住院，并且“批林批孔”开始不久，也开始在报上不点名地挨批判了。

周恩来听廖承志汇报了见到夏衍的情况，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好！只要人还在，就好……”

夏衍见周恩来的最后一面，竟是在北京医院那间小小的停灵室。

夏衍最后见到周恩来，是周恩来逝世后停灵北京医院，在接受各方面人士瞻仰遗容的最后一天中午。当时，工作人员已在收拾灵堂，准备下午4时将遗体送八宝山火化。这时候，邓颖超想到夏衍，应该让他这位老战友最后看一下遗容。但是她非常谨慎，把这个想法告知了王洪文，说：“不知道是否能允许？”王洪文很乖巧，因为此刻已不会有什么人来，不如卖个人情，就点头了。

夏衍当时断腿初愈，行走艰难。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进小小的灵堂。他几乎不能相信，这样一位名震中外，功德巍巍的历史伟人，竟然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停灵！此刻，他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悲忿，刚走近周恩来的遗体，就放声嚎陶起来。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他有多少话要说，但是，周恩来已经听不见了。四十年相交，三十年相知，难道就这么分手了吗？这九年来，自己在囚室中悟出了许多问题，竟不能当面讨论

了吗？这十年浩劫中的党心、军心和民心的得失，就没有机会和他细说了吗？……

周恩来诞生九十周年的前夕，夏衍以不尽的哀思，写了一篇怀念故人的文章。他希望通过回忆，让年轻一代传播周恩来的伟大精神——无私无畏，宠辱不惊，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沈祖安）

周恩来与章文晋一家四代

周恩来总理与我家人的交往始于我的父亲章以吴。民国初年，家父与周恩来同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父亲年长一岁。那时，话剧刚刚传入中国，人们管它叫“文明戏”，很时髦。学校里成立了剧团，父亲和周恩来都是积极分子，常常一道排演。那时演戏还不兴男女同台，听说在一出戏中，最初是由我父亲饰女主角，后来家中要他回去完婚，就由周恩来接替了他的角色。大抵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以后他们虽然二、三十年没有什么来往，但周恩来对我父亲一直留有较深的印象。

父亲大半生在金融界做事，与政治无涉，但思想颇开明。抗战期间，父亲辗转来到重庆，曾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恩来同志。据我父亲后来提起，谈话间说到各自家人的情况，他曾向恩来同志表示，希望把我调到办事处工作，当一名公开的共产党人。不过事实上，我从昆明调到重庆与此事并无直接联系。1944年下半年，南方局决定把我们一批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党员撤退到延安。途经重庆时，因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正需要外语干部，所以就把我留下了。抗战结束后，长期为周恩来作翻译的龚澎同志另有所任，由我接替她的工作。此后，从重庆至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我一直在周恩来身边任翻译兼秘书。

解放初期，父亲自愿放弃了在上海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务到宁夏平凉人民银行做一名普通职员。按当时的政策，这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可以享受二十七级也就是最低一级的干部待遇。1956年，因精减机构，父亲和我继母一起辞职返回北京。那时，他们结婚不久。我继母的前夫曾定夫大夫是周恩来的故友，在重庆时

曾为恩来同志的父亲周老先生看过病，所以我继母也认识恩来同志。大约在1958年初，一次偶然的机，周总理遇到他们二人，听说他们结为伉俪很是高兴。他打趣地说：“你们两人非常般配，能结合到一起是个大好事。不过，我可没有喝上你们的喜酒，你

们哪一位愿意请我吃顿饭啊？”听了周总理的话，我父母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们心想：“你是一国的总理，我们怎么好请你呢。”恩来同志见他们都不说话，便笑着说：“那么还是由我来做东吧。”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周总理邀请我们全家去西花厅吃饭。席间，总理问起我父母的生活情况，是否还有收入。我继母说：“现在我给一家储蓄所作代理，有一点补贴，每月二十五块钱，大体还应付得过来。”总理听罢连声说：“那不够，那不够。我还是让负责这些事的同志们想想办法吧。”不久以后，中央文史馆就吸收我父亲作了馆员。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生活得都很安定。时至今日，每逢提及此事，我继母仍感慨不已。

总理对我的大家庭非常了解。我的外祖父朱启铃先生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清末民初，他对北京市政机构的建立和最早的交通管理花费过不少心血，还筹划了北戴河海滨避暑地的开发。朱老先生的才干当时颇受袁世凯器重，南北议和时出任过北方总代表，后来又作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那时，青年周恩来曾发表文章抨击他。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朱老先生离开仕途，转而专心做学问，在古建筑、漆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祖父章一山与朱老先生是至交，两家很早就为子女订下亲事。所以父亲从小在朱家度过的时光远多于章家。我少年时赴德留学的经费亦是由朱老先生提供的。

解放前夕，朱老先生因为对共产党不甚了解，怕受往事牵累，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移居到上海。

进城后不久，周总理听说我们夫妇准备到上海探望父母，特地把我和张颖叫去，托付说：“朱启铃先生是个实业家、建筑学家。他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你们转告他，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到北京来。”总理还特别嘱咐：对老先生不能只讲大道理，不能勉强。要通过你们的言行取得老先生的信任，让他看到，共产党人通情达理，使他自愿、高兴地回到北京来。到上海以后，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多次去老人处请安问候，向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不久，朱老先生就返回北京，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以后，他对北京的市政建设和古建筑的保护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

60年代初，朱老先生是全国政协年事最高的一位。有一年，在政协举行的为老年人祝寿的招待会上，周总理亲自为朱启铃先生敬酒，祝他长寿。几天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又专程来到朱老家中，与他全家人见面，照像留念。这天，总理夫妇也和我父亲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后来，“文革”期间，“造反派”批判我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定要我拿出一张全家的照片。我确实没有别的照片，只好把这张交了上去。结果，他们说我是拿周总理作挡箭牌，把照片退了回来。回想起来，真是非常可笑。

有一次，总理前来探望朱老先生。谈话中，我外祖父忽然非常严肃地提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不讲究生死之道，但我是个老人，和你们不一样。身后我是要去北戴河的。这不违反你们的规矩吧？”周总理知道朱家有片墓地在北戴河，老人希望辞世之后能与夫人合葬。他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当然可以。这种事情我们历来尊重本人的意愿。”听了总理的话，朱老先生还是不放心，又提出：“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大事，空口无凭，请你立字为据。”此言一出，总理笑了。望着在座的儿孙辈，他宽慰老人说：“我的话你还信不过，那还有你的儿孙在旁为证嘛。”

对于周总理的种种关怀，老人内心十分感激。他曾对我说：“未料到脱离政坛近四十年，晚年竟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知遇之恩。”

1963年，朱启铃先生过世。周总理派了一名负责干部来协助办理丧事，并特地请铁路部门考虑如何运送棺木。后来，可能是因运输有困难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经与朱老先生儿女认真商议后，还是将棺木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了。

在我朱家的亲属中，六姨夫张学铭先生也是深受周总理关怀的一位。他是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天津刚解放时，他因曾在旧政府任公安局长而被军管会定为管制分子，被监督审查。那时，我正好在天津外事处工作。一天，六姨朱洛筠来找我，表示很为张学铭担心。我只能向她解释，共产党历来实事求是，主张治病救人，要她放心。

大概在1949年秋冬之际，周总理恰好与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同志一起到天津来。在市里举行的联欢会上，徐冰同志遇到我，就询问我在天津亲属们的情况。正当我们谈到张学铭的问题时，周总理也走了过来。我向他们汇报，张学铭受管制心里不服，强调他本人并没做过坏事。总理听后说：“要知过、要改才好。不过，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兄长是有功之人嘛。而且我听说，这位张二爷倒真是公子哥儿，当官也不管事吧。”说罢，他就把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同志找来，问明情况，立即决定解除对张学铭的管制，还要我向姨母朱洛筠转达他的问候。

不久，张学铭先生被安排进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经过一段学习之后，他又回到天津工作，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他此后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颇为积极，逢人便说还是共产党的办法好。六姨朱洛筠多次对我说，张二爷只是在解放后才过上了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的生活。张先生晚年也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文革”期间，总理还特别关照有关方面保护他们夫妇。

1973年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临行前夕，总理说：“早就答应见一见你们全家人，现在你们夫妇就要离开了，趁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送你们，也让他们一起来见一面吧。”其实，那几年，我经常与外交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到总理那里汇报情况、研究工作、陪见外宾。我们夫妇见到总理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当时，我们都能感到国内的政治气氛很不正常，也知道“四人帮”正企图插手外交部的工作，打着“反对投降主义”的旗号开始整周总理，想切断他与外交部的联系。知情人人都了解，我的任命并非完全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从繁忙的公务的间歇中抽空约见我们全家，这多少使我感到意外和不安。不过，直到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在前一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了癌症。他约见我们全家人时已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会面是在8月初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天气闷热。我们抵达西花厅时，邓大姐在门口迎接了我们。她说总理还在开会，要等一会儿才能回来。大姐看着我们的四个孩子，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的大儿子百家。

在我们的孩子中，总理和大姐对百家最熟悉。百家是1948年初从延安撤退后东渡黄河时出生的，身体很弱，刚满月又随我们从黄河边向西柏坡转移。行至三交县，驮着孩子和行李的毛驴从一座独木桥上掉到河里。驮子顺流而下冲出几百米，幸好被河心的一块大石头挡住，孩子才算捡了一条性命。等我们把小孩救上来，收拾停当，部队早已走远了，我们只好暂时在三交住下。这时，周恩来同志恰好随总部机关到达三交。听说我们的情况，就带着发给他的奶粉和一些营养品来看望孩子。他嘱咐我们等孩子好些再随后续部队前进。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三口平安抵达西柏坡。邓大姐听到了我们路上的艰难情景，就说：“过去小孩子生下来要穿百家衣，这孩子是一路吃百家饭长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1949年，我们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年底，周总理从那里路过，特意让人把张颖和百家接去。那时，百家已快两岁了，长得挺结实，还有些调皮。当着总理的面，妈妈让他唱个歌，他不肯，自报奋勇要表演翻跟头，说完便不顾妈妈的劝阻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翻个没完。那滑稽可爱的样子逗得总理开怀大笑。他感慨万分地说：“当年那么瘦弱的孩子居然闯过了道道难关，成长得这样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以后，周总理数次在报告中以“小百家”为例，比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比较弱小，但一定能战胜重重困难强大起来。

我们等候了大约二十分钟，总理带着满脸倦意回到家中。看到我们，他露出笑容，拍了拍百家的肩膀说：“有十年没见了，已经是个大人了，还当了解放军。”接着，他一一问了每个孩子的情况。我说，您这么忙还抽空见我们，影响您休息了。总理答道：和你们坐在一起聊聊天，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落座以后，我们先汇报了去加拿大的准备情况。总理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仔细地询问什么，只是叮嘱我们，现在国内国外情形都很复杂，到了新环境，既要有所作为，又要小心谨慎，多请示多汇报，不能凭老经验办事。

那时，百家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学员。这个文工团曾多次跟随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总理对这个文工团非常了解。他马上问起自己熟悉的那些演员、作曲家、指挥现在是不是还留在团里，近况如何。然后，又说起他最喜欢的歌曲、最喜欢的舞蹈，问现在还唱不唱了、还跳不跳了。兴致所到，总理还对作曲家们的风格做了一番评论，某人的曲子他很欣赏，某人的则不然。评论之后，他又补充说，这只是他作为一个听众的个人喜好，嘱咐百家千万不要把他的评论传出去。谈到这些事情，总理显得挺高兴；但随后，他又不无惆怅地说，现在文艺界的事情他是不好管了。

这次谈话天南海北，并无一定的主题。总理提起民国初年的往事，也谈到了“文化大革命”；谈老年人，也谈青年人。我记忆较深的是，总理从我祖父、一个清末翰林的保皇谈到了当时另一个著名的保皇人物杨度，并以其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一生思想是可以有很大变化的。他告诫我的几个孩子，作为青年人千万不要保守，青年人保守了中国就没有希望。总理还说：“文革”开始时有一个口号，叫“敢想、敢说、敢闯”。现在人们已经不怎么敢说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无法禁锢的，想还是要想的，只是不说罢了。他认为，对青年人还应该提倡敢想敢说，但不能乱闯；青年人做事情要尽可能征得老年人的同意。后来，总理又谈到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问百家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说，他主张青年人在谈恋爱时要多交一些朋友，多了解一些不同性格的人，但不要一下子就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他还说，对青年人的婚事，父母不要搞包办代替、不要干涉太多；但年轻人也要征求父母的意见、尊重父母的意见，老年人的阅历总是更丰富一些。最后，总理又问起我父亲和继母的近况，并说，这次没能请你父母一起来，等你们回来我还要请你们全家来吃饭。

1973年秋，我们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华访问。在北京会谈结束之后，总理和特鲁多一起去洛阳龙门石窟参观。我们亦随同前往。那次，总理对我们说，他以前没到过龙门，今后出来走一走的机会恐怕越来越少了。当时，我们真没想到，他的健康状况竟那样糟糕，而他以后的处境竟那样艰难。

1974年春节，“四人帮”终于打出“批林批孔”的旗号，公开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是年6月，他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住进医院。我们身在万里之外，听到传来的种种消息真是忧心如焚而又万般无奈，只盼望回国述职之际尚能再见上他一面。哪里想到1976年1月8日晚上，我们从飞机场回到家里，刚刚放下行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那让人难以置信的噩耗……

每当想起多年来追随总理、和他相处相交的往事，总觉得思绪万千而又无从落笔。大约要倾吐对一个自己最敬重、最熟悉而又最相亲的人的情感总是这等困难吧。这里拉拉杂杂记述的只是总理与我家四代人交往的琐事。这些事我当时并未特别留意，以往也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它们写出来；因为在总理光辉伟大的一生中，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小太小了。然而，细细想来，或许正是这类琐事更能反映出周恩来内心中蕴藏着的那种平易深邃而又炽烈的爱，正是这种爱使亿万普通的中国人能永远把他作为一个可亲可敬人而非一个神来怀念。

（章文晋）

同是民族的骄傲

周恩来与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年），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南昌起义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员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

——编者

1976年1月9日的早上，晴天一声霹雳，周恩来逝世的噩耗，通过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传到了正生病住在北京医院的郭沫若耳中。他惊呆了，悲痛欲绝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里，倾听着凄婉低回的哀乐，两行热泪顺着两腮不断地淌。送来的早饭，他摆摆手示意让拿了回去；端来的茶水，他指了指让放在桌上。过了很长时间，他用力地要从沙发里站立起来，但身体刚离开沙发，又一下坐了回去，他自己突然站立不起来了。我马上上前用力把他扶了起来，他很吃力地挪动到办公桌前坐下，用颤抖得很厉害的手，在日记本上写下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悲壮诗句，以寄托他无限的哀思。

郭沫若的病情顿时加重了，饭吃得很少，觉也睡得很少；泪时常地流，愁容总挂在脸上。他很快地变得更加苍老，更加消瘦，身体也更加虚弱。但他坚持参加了悼念周恩来的所有活动。

周恩来逝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尽量不在郭沫若面前提起周恩来。因为一提到总理，就会引起他的悲痛，甚至流泪。就在这段时间内，郭沫若和我谈了他第一次在广州见到周恩来的情况，以及他和周恩来之间的一些其他事情。

初次相识

郭沫若说：1926年4月，我刚到广东大学不久，一天周恩来和伍朝枢到广东大学演讲。我是作为一名普通听众，坐在台下听讲的。当周恩来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我一下就被他吸引住了。他那年轻，潇洒和英俊的仪表，以及他那浓浓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双眼，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天，伍朝枢先讲，周恩来后讲，他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讲了工农问题和学生问题。但他那从容不迫的风度，清晰简练的语言，以及通俗透彻的逻辑分析，都令我折服。演讲会结束后，周恩来就走了。这次我并没有同他单独地接触。

根据郭沫若所谈的情况，我在1926年4月13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查到了这条报道，标题是：

昨日广大举行总理纪念周中

1926年广东大学周报第48期上，也有类似的报道。

郭沫若对我说，自这次见到周恩来后，他和周恩来在各种公共场合有过多次接触、但都是一般性的接触和简单地交谈。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6月21日至24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的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和顾孟余都是以个人的资格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周恩来被推举为宣传训练及补充委员会主席，恽代英和郭沫若等为委员；周恩来同时被推举为总政治部编制委员会主席。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24日的会议上，报告了编制委员会审查结果。会议期间，郭沫若和周恩来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和审查各种问题及议案。他们二人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沟通进一步加深了。郭老在《纪念邓择生先生》一文中说：这次会议“有好些计划，大抵是出于恩来之手。因为他是中国政治部工作的开山，他的经验丰富而且头脑致密而迅速，在那时我实在接触着一个奇迹。”确实如此，通过这次会议，郭沫若深深地认识了周恩来的伟大超人之处。

参加北伐

这次会议后十天左右，即1926年7月上旬，郭沫若就决定亲自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军北伐。

郭沫若决定参加总政治部随军北伐后，李一氓和阳翰笙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时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军的工作正是由他负责，他很重视这件事，说郭沫若参加北伐在政治上影响将是很大的。并通过李一氓、阳翰笙邀请郭沫若到他的家中——南华银行谈过一次话。周恩来对郭沫若决定投笔从戎参加总政治部随军北伐，表示特别高兴，也特别重视。他说这在政治上会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须慎重考虑，要进一步商量。郭沫若当即表示，他自己没有政治工作经验，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也不需要担任什么职务，挂一个顾问之类的空名，协助别人工作就可以了。周恩来请孙炳文将此事正式转告邓演达，看邓演达和蒋介石的反应如何，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郭沫若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对这次谈话十分满意，也十分高兴。说还是周恩来把问题考虑得周到细密。

邓演达得知郭沫若决定参加总政治部的工作随军北伐后，特别高兴，亲自到家中拜会郭沫若，表示他的由衷的高兴和欢迎之意，并表示郭沫若无论担当什么工作，他都会把郭沫若当成“军师”一样敬重。他们还就革命的前途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为郭沫若参加总政治部的问题，总政治部专门开过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此事。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郭沫若参加总政治部随军北伐的重大意义，并讲了郭沫若有很强的工作和组织能力，希望大家尊重他、帮助他。

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一职，久悬不能解决，原因是找不到适当人选。当时蒋介石已公开排共防共，由共产党人来担任此职他不放心；而国民党靠近蒋介石的人又无这方面的人才。孙炳文和周恩来商量后，又证得了郭沫若的同意，决定推荐郭沫若担任此职。郭沫若当时已是国民党党员，大家认为这样安排蒋介石是可以接受的。孙炳文对郭沫若讲，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工作，宣传科长这个职务虽然很低，但掌握着政治部的宣传大权，因此这个职

务很重要，作用也很大。郭沫若表示只要有工作做而不受掣肘时，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

7月10日前，孙炳文为欢送即将随北伐军出征的郭沫若和李一氓等，在一个西餐馆中设宴力他们饯行，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聚会。郭沫若“戎马书生”的徽号，就是在这次吃饭时由孙炳文奉赠的。

1926年7月21日郭沫若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北伐，经长沙很快打到了武汉。武昌攻克后，他又到南昌蒋介石手下工作了4个多月。他耳闻目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遂于1927年3月底4月初在朱德家中，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第二篇文章至今没有找到）两篇讨蒋檄文，公开发表和广为印发，彻底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明确提出了蒋介石已是一切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大家要迅速起来反蒋的号召。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郭沫若于4月14日秘密化装潜入上海。当天晚上在静安寺路一个弄堂里的李一氓的家中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是1926年12月秘密到上海的，1927年3月他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组织上海工人同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很快转入地下。

郭沫若在《脱离蒋介石以后》（1927年）这篇文章中，就写到他到了李一氓家中为止，既没有谈到在那里见到周恩来，更没谈到见面的情况。在1976年春天，总理逝世几个月后，有一次我们又谈起周恩来，我就趁机问了郭老那次和总理见面的情况，他想了一会，很沉痛地说：在那种情况下见到了周恩来，我们都很激动，也都十分愤慨。他比八、九个月前在广州时消瘦了很多；两眼布满血丝，大概几天都没有睡觉了。但他仍精神抖擞地向我介绍两天来蒋介石一伙在上海疯狂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情况。我也很详细地向他汇报了蒋介石在赣州、九江、安庆指挥镇压屠杀革命群众的情况。尤其是我在安庆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三·二三惨案的情形，完全证实了这些惨案都是蒋介石亲自策划亲自指挥的。我还告诉周恩来，我已和蒋介石彻底决裂，并将上述主要情况写成了两篇文章，已公开发表和印发。周恩来赞许了我的这些做法。接着我们研究了下一步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应马上组织力量，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大家还具体地分析了国民革命军各军师的政治态度及实力，认为只要大家下定决心，做好工作，完全是可以把蒋介石打垮的。郭沫若劝周恩来尽快离开上海，因为当时的形势太恶劣，太危险。而周恩来说，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亲自处理和安排，短期内他实难离开上海，安全问题他会特别注意，请郭沫若放心。周恩来劝郭沫若马上离开上海，尽速回武汉去，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郭沫若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现在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二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开始就讲：“郭沫若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纯由蒋氏直接指挥。”就是指4月14日晚总理和郭沫若在李一氓同志家中会面时所谈情况。

南昌起义前后

郭沫若回到武汉后，国共两党中央已决定停止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并已开始行动。郭沫若虽不同意这些做法，但是也无能为力。不久，邓演达即随军到了河南，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郭沫若负责，工作异常繁忙。

5月20日左右周恩来秘密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武汉。郭沫若很快和周恩来见面了，劫后重逢，他们都特别高兴。

郭沫若和周恩来在武汉两个月左右这段时间内，接触比较频繁。郭沫若当时全面主持总政治部的工作，因此有些重要情况都要及时向周恩来汇报。有些重要问题要和周恩来商量对策或征求意见。周恩来也经常向郭沫若询问和了解一些情况。

由于北伐中郭沫若和张发奎交往较深，6月初郭沫若又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到河南去慰劳他。在河南新郑他们作过一次很深切的谈话，郭沫若认为进河南作战是错误的，应先讨蒋后讨张（作霖）。张发奎同意郭的意见，说他们是“志同道合”。因此，6月底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后，就邀请郭沫若做二方面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第二方面军所属的大部份是我党所掌握的部队，或倾向我党的部队，所以党中央和周恩来都很支持郭沫若出任此职。

郭沫若担任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后，武汉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逐步向南京的蒋介石靠拢，而加紧排共，一直发展到7月15日的公开分共。张发奎也日渐右倾，和郭沫若的意见经常相左。用郭沫若的话说：由“志同道合”而变为“貌合神离”了。郭沫若于7月20日左右随第二方面军指挥部移驻九江。在九江期间，他和贺龙、叶挺等都有所接触，周恩来经九江去南昌，他们没有见面。汪精卫、孙科和张发奎29日到了九江，遂上庐山召开“清共”会议。郭沫若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已预感到公开决裂已迫在眉睫。

南昌起义的消息郭沫若是八月三日上午和李一氓从庐山上下来后才知道的。他立即去找张发奎商量政治部的善后处理问题。张发奎主张解散，郭沫若表示同意。张发奎问郭沫若今后打算怎么办？郭沫若答他要到南昌去看看。张发奎劝郭沫若随他出走日本。被郭沫若婉言谢绝了。张发奎说你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你到南昌去，希望你为我转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干。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请张发奎把这些话笔录出来，他很勉强地在一张随便的纸上用铅笔写了，但不肯签名。不过，郭沫若认为，张发奎的笔迹大家都熟悉，这个亲笔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郭沫若遂即回政治部宣布了解散的决定。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和其他在九江的政工人员，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处理完毕了。通往南昌的火车已经继绝了。天黑后郭沫若和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四人坐铁路手摇车连夜向南昌进发。途中几经周折，在涂家埠郭沫若和李一氓被散兵围打受伤，险些丧命。终于在8月4日天黑后到达南昌贺龙军部。贺龙听说他们挨了打，定要叫军医来看，他们谢绝了。贺龙让人拿来两套衣服给他们换洗，还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周恩来。郭沫若在《南昌之一夜》一文中写到：

不一会，恩来得到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套军服，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他也是应该知道的。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并没有杀一个人。”“不杀人，有时也好像不大好。”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倒几乎被你们没有杀的人杀掉了。”大家哄笑了一会，真的快心称意的大笑。

周恩来是前委书记，又是参谋团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作很忙。他先走了。郭沫若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政治部主任。后两项职务在郭未到南昌前，都是由恽代英同志代理的。当天晚上郭沫若就到了政治部的岗位上。郭沫若是8月5日上午和谭平山、贺龙、恽代英、张国焘、李立三、林伯渠、吴五章等一起离开南昌的。南下途中郭沫若一直和周恩来在一起。起义军8月7日抵达临川。因天气酷热，又是开始长途行军，大家都非常疲乏，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思想也比较混乱，前委决定在此休息整顿。郭沫若大概是出于对南昌起义胜利的喜悦，尤其是有幸在起义军出发的前夜赶到了南昌，随起义军一起踏上了进军广东的征程，在临川写下了在这次起义中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首五绝：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

8月12日抵达宜黄。周恩来指示总政治部起草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并油印分发。提纲提出了没收拥有200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此事在内部意见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政策太宽，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寥寥无几。

8月26日进占瑞金，在此停留的时间较长，组织了会昌战役，把准备进攻起义军的钱大钧、黄绍竑的部队击溃。前委并在此开会决定，走汀州、上杭，沿东江到汕头。

在瑞金期间，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9月10日起义军经长汀进占上杭。在上杭休整期间，于九军军部召开了政工会议。

在上杭革命委员会讨论土地政纲时决定：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后又按照广东省委送来的政纲，改为没收5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

9月24日起义军进驻汕头。郭沫若被任命为海关监督和交涉使。后又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革命日报》的主笔。

由于起义军没有在会昌战斗中将钱大钧、黄绍竑部击溃后乘胜追击，而回师瑞金，绕道福建到达汕头，在这期间给敌人收拾残部、组织力量、调动军队的喘息机会。因此，我军进占汕头后，即和敌人在汕头附近苦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斗节节失利，终于不得不在9月30日深夜全部撤出汕头。郭老在“流沙”一文中详细讲叙了此事。

郭沫若和周恩来等一起离开流沙后，向西南方向的海陆丰前进。但只走了大约五公里左右，经过莲花山时，撤退的队伍被敌人突然袭击拦腰切断。虽经部队奋勇还击，但终因伤亡太大，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天黑后部队逐渐失去控制，很快就被敌人冲散。郭沫若和周恩来也失去了联系。在当地农

会的掩护下，经过很多周折，郭沫若被转移到名为神泉的一个小渔港，在那里等待顺风乘船去香港。郭沫若时时都在挂念着失散的战友们，尤其是周恩来。他在《神泉》一文中说：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只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

郭沫若大概 10 月 20 日左右由神泉乘一艘小渔船到了香港。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也由陆丰乘小渔船到了香港。但他们在香港没有联系和见面。

出走日本之前

郭沫若和周恩来都是 1927 年 11 月初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的。到上海后，他们很快就建立了联系，并且见了面。大家都是死里逃生，分外高兴。周恩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郭沫若的全家虽然都在上海，但他是被通缉的要犯，也是处在秘密地躲藏之中。他回上海后，首先就是着手加强创造社的工作；同时也使创造社能成为掩护一些同志，解决一些同志生活出路的机构。郭沫若征得李一氓和阳翰笙的同意，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将李、阳二人从党的军事系统，转到文化系统，并参加创造社的工作。当时创造社主要成员除郭沫若外都不是党员。另外通过郑伯奇、蒋光慈等去请求鲁迅先生的合作，共同办好创造社，鲁迅先生也欣然同意了。

郭沫若是不能在上海久呆的，甚至在中国也不能久呆。经过和周恩来商量，决定他带领全家到苏联去。并联系好乘坐苏联撤退驻上海领事馆的轮船到海参崴再转莫斯科。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待通知上船的时间，就可以离开上海去苏联。就在轮船即将离开上海的前几天，郭沫若突然患了重病——斑疹伤寒。苏联轮船开出时，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个机会就这样错过了。郭沫若后来说这“真是一个大遗憾，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世，甚至于一家一族。”“确确实实地影响了我，乃至一小簇人的半生。”

郭沫若是 1927 年 12 月 8 日晚上突然患病的，12 日秘密住进了一所日本人开业的石井医院。郭生病期间，周恩来对郭沫若特别关怀，他自己不便出面，便让李一氓、阳翰笙、李硕勋等经常去照看，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郭沫若终于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周恩来和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是他战胜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直到 1928 年 1 月 4 日他才脱离了危险，离开医院回家静养。以后很快出版的诗集《恢复》就是养病时的作品。《恢复》是血与泪的记录，它记录着作者身体的《恢复》；记录着作者精神和意志的《恢复》；记录着革命力量的《恢复》；党和大众对未来胜利信心的《恢复》。也是郭沫若经过战争的考验、血的洗礼，成长为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志。

郭沫若的身体在逐渐恢复，而今后的去向一直在困扰着他。苏联是去不成了，欧洲又去不起，祖国又不能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到日本去，这是郭沫若所不愿走的一条路。经过请示周恩来，最后还是决定暂时到日本去，如有可能再从日本转赴苏联。成仿吾和创造社的朋友们答应每月给他 100 元的生活费，生活问题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一个时期郭沫若的日记记录了他和周恩来来往的部分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出走日本和周恩来的密切关系，摘录几则如下：

二月九日 星期四

.....

豪兄*不来，一时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仿吾说，明早去会粹年，请他去告诉豪，因为他听啸平说，民治已经搬了家。

*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豪兄”即周恩来。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

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延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

这两天的日记，说明了郭沫若见不到周恩来就不能动身，所以一定要设法去告诉周他动身的日期，在见了面谈了话后才能走。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由李一氓陪同来到郭沫若家。周恩来和郭沫若谈了话并一起吃了中午饭。饭后，成仿吾来了，他和周恩来在广州就熟悉了。由成仿吾去约了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这批新近才从日本回来参加创造社工作的朋友到郭沫若家，周恩来和他们谈了话。郭沫若曾对我说，这五个人是否都参加了那次谈话，他记不清了。但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是肯定的。他们都是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当时都不是党员，成仿吾也不是。这次谈话对他们几位以后的工作及创造社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沫若还对我说，周恩来当时曾经向他表示，组织上要送他一部分钱，做为他家全家的路费和生活费。他对周恩来说，他知道组织上经济很困难，同志们经济上也很困难，这笔钱他不能接受。他的生活问题，创造社已商量好，每月给他100元钱，生活上已无问题。关于组织上经济的困难，在郭老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载。正月廿日的日记写道：“民治与叔薰（李硕勋）来，叔薰夫人（赵君陶）病，无医药费，嘱创造社在我的版税项下抽送了五十元。”正月卅日的日记：“中午时分民治来，拿来了几本‘布尔雪维克’，吃了中饭又走了。他说团体里面经济短绌。”这里所说的“团体里面”就是指党组织。因此，郭沫若对组织上和同志们经济都十分困难，是有深切了解的。但他对周恩来和组织上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是永生难忘的。

郭沫若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让李一氓通过郑伯奇转告郭沫若：他的住所已被卫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来捉人。郭沫若当即同成仿吾、王独清离开了家，当晚住在由内山完造代订的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第二天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内山完造一人。从头天晚上郭沫若离家开始，李硕勋夫妇和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指示，一直暗中保护郭沫若，直到他上了日本邮船离开了上海。

（王廷芳）

周恩来与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年），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抗战前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期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斗争。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24日因病逝世。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编者

邹韬奋在短暂的一生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崇敬周恩来，信赖周恩来，生命垂危之际仍呼唤着“周恩来！”周恩来也了解邹韬奋，敬重邹韬奋，高度评价“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

周恩来与邹韬奋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

1937年12月，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著名领袖邹韬奋来到武汉。当他得知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也在武汉时异常兴奋，他早就想见见这位崇敬已久的人了。

周恩来得悉邹韬奋的这一愿望后欣然同意，因为这也正是他的意愿。

周恩来对邹韬奋是了解的。

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在青年中有极大的影响。

邹韬奋从1926年10月开始主编《生活》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团结御侮。《生活》周刊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下，《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为宗旨，发表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评论和通讯文章。邹韬奋说：“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后，我想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究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国民党政府派要员对邹韬奋施加压力，要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邹韬奋严正声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国民党要员要邹韬奋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由于《生活》周刊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逐渐发展成为浸透爱国主义精神、战斗性很强的、风行全国的、拥有广大读者的周刊，它的销量猛增。1932年《生活》周刊每期发行15.5万份以上，打破了中国杂志的发行纪录。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在《生活》周刊被封禁之后相继创办的《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译，成为党的整个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多次受到恫吓威胁，两度被迫流亡。直到发生“七君子爱国有罪”事件，与沈钧儒等

被捕坐牢，他毫不动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和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

1936年5月，邹韬奋、沈钧儒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这年11月，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遭逮捕。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事发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937年7月3日，获悉国民党政府准备重新审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案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要潘汉年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由于“七君子”坚决斗争和各界人士的声援，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邹韬奋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早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他见邹韬奋来了，忙迎了过去，紧紧握着邹韬奋的手，高兴地说：“欢迎你，韬奋先生。”

“谢谢，谢谢。”握着周恩来热情的手，一股暖流涌入邹韬奋的心田。

落座后，周恩来又真诚地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聊一聊。”

邹韬奋兴奋地说：“我早就想和周先生好好聊聊了。”

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情况。邹韬奋一一作了回答，并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今后工作的设想和安排。周恩来向他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后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邹韬奋深深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说：“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

看到周恩来对知识分子这么高的评价，邹韬奋激动地说：“周先生，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我会努力去做的。”周恩来微笑地点点头，他相信邹韬奋所说的话。

临别时，周恩来再一次握住邹韬奋的手，诚恳地说：“你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请周先生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邹韬奋思忖了一下说。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即来到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邹韬奋及其他工作人员。他勉励大家多为抗日救国出力。周恩来的到来使邹韬奋及同人倍受鼓舞。邹韬奋对周恩来从心底产生的景仰之情与日俱增。他把周恩来视为良师益友，有什么问题总是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总是推心置腹地与之共同探讨。

周恩来经常耐心地听取邹韬奋对时局的看法。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

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同邹韬奋及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史良、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勱，青年党的左舜生等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同共谈判的情况，分析政治形势，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这些经常的开诚布公的交谈，使邹韬奋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郑重地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周恩来沉思了良久，说：“韬奋先生，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所起的作用要比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党需要你留在党外。”

邹韬奋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从认识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员开始的。他坚定地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战胜利，一定能够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他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在党外尽心竭力地为党工作。

周恩来经常抽出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反应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

周恩来对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也十分关心。抗战爆发前，生活书店总店在上海，分店只有广州和汉口两处。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遍布于全国十四个省的分店已达五十余处。总店也先后移往汉口和重庆。有不少共产党员在生活书店工作，周恩来经常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1938年10月，邹韬奋向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林伯渠提出，希望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设立生活书店分店，以便对解放区军民进行文化服务。周恩来得知邹韬奋的愿望后，很赞赏。1939年夏，鉴于4月以来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的西安分店等被封闭，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化事业处境的日益艰难，周恩来先后约邹韬奋到曾家岩50号，约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负责人到红岩商议难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存身的书店工作人员的撤退问题。

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生活书店、新知书店以及读书生活出版社陆续派人前往各解放区，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华北书店，在新四军所创建的华中解放区各地成立大众书店，推动了解放区的出版事业。

二

1938年武汉沦陷前，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和他主编的《全民抗战》编辑部迁往重庆。周恩来于1940年5月也来到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此后，周恩来和邹韬奋的来往更加密切了。

位于嘉陵江畔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里经常出现邹韬奋的身影。他常带着一些费解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探讨，周恩来则把党中央对白区文化工作的指示传达给他。她们也在一起谈家常，谈生活上的事。每次的交谈都是那样的和谐、随意。

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全体同仁包括重庆分店的职工及家属参加。邹韬奋经常邀请周恩来参加茶话会。只要不忙，周恩来也总是接受邀请。

在一次茶话会上，大家请周恩来讲。周恩来微笑着站起来爽快地说：好，既然大家让我讲，我就讲一讲。

他说：“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不满，指责我们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形容词。我对他们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孙中山先生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讲，‘余所著之三民主义及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对？”

停了一下，周恩来又接着说：“国民党又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之情。我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扔炸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

周恩来还谈到共产党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称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叫‘恩来’，就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讲到这儿，周恩来停住了：“好，今天就讲这些吧。”

听着周恩来深入浅出，亲切、生动而又富有说服力的讲话，大家的脸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周恩来的话音未落，掌声就响了起来。

周恩来笑着摆了摆手，对身旁的邹韬奋低声说：“韬奋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了。”

邹韬奋不无惋惜地站起来对大家说：“周先生很忙，要先走了。”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邹韬奋陪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韬奋先生，请回去吧。”周恩来握着邹韬奋的手与之告别。

“周先生有时间一定要再来呀。”邹韬奋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目送载着周恩来的汽车消失在远方。

1940年底，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周恩来多次到章伯钧、张申府寓所，与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章伯钧等谈目前时局。12月23日，周恩来又同邹韬奋、张君勱、梁漱溟、左舜生、陶行知、章伯钧、黄炎培、沈钧儒，在沈钧儒寓所会见美国著名作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

周恩来的讲话使邹韬奋等对未来严峻的形势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邹韬奋和数百位同人经过多年惨淡经营，艰苦发展起来的50余处生活书店的分店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殆尽。在那严峻的日子里，邹韬奋仍然坚持革命立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满含悲愤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为皖南事变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25个字，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题词在《新华日报》刊登后，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邹韬奋支持《新华日报》“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要把事实真相及是非表白于世，以求公判”。同时，邹韬奋又为《全民抗战》写了一篇社论，指出：这件事并不是单纯的“军令”、“政令”问题，不能否认在实质上是党派斗争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要求“从根本上加强民主政治，

巩固抗日党派的精诚团结与合作”。国难当头，发生这种事件，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但这篇社论全文被审查会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论位置留下一个空白——开了个大“天窗”。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邹韬奋的迫害愈益加剧，处境危险。

2月10日，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了邹韬奋夫妇。周恩来指出，为保存进步文化界的力量，决定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往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邹韬奋表示赞同。同时，邹韬奋也感到很兴奋，因为新的阵地在等待着他去开辟。

在重庆期间，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的频繁接触，使邹韬奋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不止一次地对夫人沈粹缜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三

1941年2月25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前夕，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员”的邹韬奋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

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邹韬奋庄严声明：“我们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来的！”在香港，邹韬奋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并继续得到周恩来的关注。

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包括邹韬奋在内的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处境极其危险。为抢救这批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共中央指示，要及时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人士保护和抢救出来。

1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帮助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的方向及具体办法，特别提出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等离港。鉴于国民党特务对邹韬奋、柳亚子等缉捕甚紧，周恩来于1942年2月电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强调对他们的接待要“指定专人负责”，“以免暴露”。3月17日，周恩来又电示南委书记方方、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韬奋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夏衍向周恩来汇报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香港的情况，周恩来急切地询问邹韬奋、柳亚子、茅盾等的安全和健康状况。当他得知国民党已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让邹韬奋就地隐蔽，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乡下。

这年7、8月间，国民党派人到广东探寻邹韬奋的踪迹，情况很危险，邹韬奋的朋友专程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邹韬奋的情况。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

邹韬奋得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一直挂念着他的安全时，心里很激动，他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安排。9月下旬邹韬奋便离开梅县，经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他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和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深受感动。在会见新华社记者时，邹韬奋说：“到根据地来是我平生最兴奋的事情。在这里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忠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级的利益，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根据地内人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热烈拥护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在他后来口授的遗嘱中回忆道：“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他还表示要到延安去。但不幸的是，这时他已患了不治之症——癌症。他的病情不断加剧，不得不化名返沪治疗。

临行时他对好友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理想的地方，真正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没有正确的政策和具体细致的工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真希望病快些好，好了我立刻就回来。”然而，邹韬奋的病情一直没有大的好转，病痛的折磨常常使他不能自己。但不论是在难忍的病痛中，还是在隐姓埋名的流亡生活中，“周恩来”的名字一直在他心中永驻。他对友人说：“我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恩来指示下进行的。”幸福自豪之感溢于言表。临终前他口述的遗嘱中又一次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书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离，甘之如饴。”我死后，“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四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由于当时上海还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邹韬奋的遗体以“季晋卿”的名字入殓，棺柩停放于上海殡仪馆。他逝世的消息，只得暂时秘而不发。

9月2日，在延安的周恩来获悉邹韬奋逝世的噩耗后，万分悲痛，即刻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延安开追悼会，先组筹备会；《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中央致唁电。

周恩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于是，9月28日由周恩来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发出。唁电表示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般般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发表《中国文化界先进战士邹韬奋逝世》消息的同时，发表了《悼邹韬奋先生》的社论。

10月1日，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发起，各党派各阶层在重庆报社举行了邹韬奋先生追悼会。周恩来、邓颖超送了挽联：“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亡团体力争民主痛培独裁那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逝倍令后死伤神”。

10月11日，周恩来又在延安召集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湜、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程今吾、张仲实等组织“邹韬奋同志追悼会筹委会”，拟订纪念和追悼邹韬奋先生的办法。

会上，周恩来一开始便说：“我国有两个青年领袖，一个是恽代英，他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邹韬奋，他现在也逝世了。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损失。”

他还说：“多年来，韬奋同志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奔走呼号、舌敝唇焦，动员人们起来救亡图存，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拥戴和热爱。他是承继浑代英同志的真正的青年领袖。”

周恩来再次谈到邹韬奋游历考察欧美所写的《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它是视察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美国的结果，对美国的分析认识很深刻，是难得的一部著作。”

周恩来和与会者讨论议定了《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主要内容有：提议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向边区政府提议，设立韬奋出版奖金，专用以奖励对办杂志、报纸及出版发行事业有特别成绩之人；提议在先生骨灰运到延安安葬后，建立纪念碑；电渝商量在全国发起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运动，包括征集纪念文、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登报征集先生未发表之信件和著作；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提议电唁韬奋先生家属，并在大会上介绍先生生平；在延安出版先生选集、在先生百日祭时举行追悼会，届时展览先生著作，追悼会时由解放日报出专刊等。

会后，周恩来又反复阅读《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亲笔填上了“提议以韬奋为出版事业模范”一句。这十二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浸透了周恩来对亡友邹韬奋的多少怀念之情啊！周恩来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让他们在重庆搜集邹韬奋的著作《萍踪寄语》以及邹韬奋主办过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并让他们请宋庆龄、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等撰写追悼短文。

11月22日，延安各界二千多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邹韬奋先生大会。同日，《解放日报》出了共四个版的“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

对邹韬奋的死，周恩来一直感到很惋惜，每每想起都感到无限的痛苦。同时，他对亡友的亲属亦极惦念。1945年9月，他写信给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即表达了这样的心境。信中写道：

粹缜先生：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在他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骊，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周恩来启

卅四年九月十二日

1949年，周恩来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

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邹韬奋曾经坦率地谈过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说自己过去主张实业救国，提倡职业教育，后来还主张放弃武装，与当局和平协商，都只是空想，甚至是与虎谋皮。他在周恩来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找到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坚强的社会力量和领导力量，从而也就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时代孕育了周恩来和邹韬奋之间的革命友情。那友情是真挚的，不朽的。

（李静）

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

周恩来与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年），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是国民党政府参加国共谈判的代表之一，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拟定和平协定。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留住北平。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

——编者

我大哥张治中与周恩来先生是在黄埔军校相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张治中同时担任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军委会航空局局长、航空学校校长等好几个职务。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后，张治中又兼任校务委员。后来，周恩来先生也应邀来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二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他深为周恩来先生的谈吐、风度所吸引。起初张治中对工人、农民革命运动所知不多，对纷坛复杂的政治斗争亦不感兴趣，只醉心于军事教育，认为此方为救国之道。自从与周恩来相识后，他好象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周恩来给他讲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讲国内毛泽东先生倡导的工人、农民运动。周恩来每次给学生讲课时，他都去旁听。这样，使他开阔了政治视野，增长了见识，思想倾向左翼。他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何香凝、邓演达往来密切，与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恽代英、高语罕相交亦深。但他的言论、态度却为国民党右派分子大为不满，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和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在黄埔军校被右派分子诬为“黄埔四凶”。中山舰事件时，广州方面的逮捕令都已下，只因蒋介石恐逮捕事件引起学生抵抗，只好作罢。蒋介石虽想拉拢张治中，但对他又不放心，派人对他进行了为期半年之久的调查。蒋介石亲自对总队长王懋功说：“张文白（文白系张治中的字）言行可疑，只怕是被共产党分子拉过去了。”王懋功极力为张治中辩解：“这怎么会呢，他没替共产党宣传，也没替共产党办事，只不过与他们在工作上接触多了点。”这时，张治中已彻底从观望、徘徊中解脱出来，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密友周恩来。周恩来很高兴，表示需请示组织后再作答复。过了些天，周恩来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入党，但我们两党曾有约，不吸收对方高级干部入党，等时机适宜时再说吧，但我们一定暗中支持你的工作。”

二

1926年，北伐开始后，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主管编制和人事。对于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人事安排，他极力推荐周恩来。他对蒋介石说：“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最好由周恩来担任。”蒋说：“我已有人了，准备让邓演达充任。”他又对蒋说，“邓演达有军事才干，还是让他担任军事领导人好。周恩来比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要合适。一方面他的政治工作才干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他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干得很出色。”蒋介石停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吧，你去给周恩来先生做做工作，让他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怎样？”张治中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被周恩来拒绝了。这样，周恩来没有参加北伐大军，到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接

应北伐军去了。

1927年，北伐大军攻克了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夕，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陈赓突然来访。张治中当时已闻到了国共关系破裂的火药味，对陈赓的到来很惊讶。他将陈赓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问道：“你现在怎么敢到武汉来？有多危险！”陈赓满不在乎地说：“有老师在这里，我怕什么呢。”张治中又问他：“周先生现在什么地方？”陈赓回答：“在上海。”张治中知道蒋介石已将其嫡系部队刘峙所部及第一军开到了上海和沪宁线，便对陈赓说：“你快到上海通知周恩来先生，要他特别注意点。”于是便给足了路费，派人将陈赓送出了武汉。

三

从这以后，张治中与周恩来先生便失去了联系。1938年，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任部长。张治中由大本营管理部长调任湖南省主席。于是，他与周恩来先生中断的关系又恢复了。

1938年11月12日夜里到13日早晨，长沙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惊和痛恨。为此杀了有渎职行为的三个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保安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当时任湖南省主席，深感责任重大，请求革职处分。周恩来特地来看望张治中，一方面指出其应负的责任，同时又温言相劝。张治中起草了一份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首先给周恩来先生过目。周恩来为他字斟句酌地亲笔修改。在各方落井下石，张治中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下，周恩来却给予他及时的关照和慰藉，这充分体现了患难之中见真情。

1939年，张治中由湖南调重庆，任侍从室一处主任，主管军事，负责大本营与各战区的军事联络。后来，周恩来先生也从武汉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1942年，国共两党再度和谈，蒋介石派张治中为国民党代表与共产党商谈。他住重庆曾加岩桂园。周恩来常到桂园来找他商谈，前后达八次之多。1943年，蒋介石产生了要与毛泽东面谈的念头，他对张治中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了很高兴，连说：“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蒋介石随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张治中。张治中又把这封信交给八路军代表，请其转交毛泽东。当时虽没有回音，但为后来的重庆谈判埋下了伏笔。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派其秘书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事宜。居里临走时要约会周恩来。但国民党一些人却极力阻拦。一天，在重庆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明日居里、周恩来将要会见，找个借口将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会不成面。”张治中听了则说：“居里、周恩来会见，委员长必已闻悉，现委员长并未交付会议讨论。且这种办法亦不高明，还会引起居里误会。”这样，周恩来、居里得以顺利会面。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会谈。毛泽东以民族大局为重，慨然电复应约。张治中奉蒋之命偕美国大使赫尔利坐专机赴延安接毛泽东。

毛泽东抵渝后，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处宽敞、室内设备齐全的房子。但毛泽东不想去。周恩来找到张治中说：“文白兄，你把毛主席接来了，让他

住哪啊！”张治中说：“委员长不是安排了一处房子吗？”周恩来双臂往胸前一抱，幽默地说：“那么阔气的房子，我们主席住不习惯呀！”这时，张治中已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原来蒋介石安排的房子是一处便于特务监视的房子。张治中慨然地对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住我家的房子吧。”周恩来被张治中的一片真情所打动，就答应了。于是，我大哥便从桂园搬出来住到了附近的一处房子里，让毛泽东住进去。后来，周恩来也住了进去。桂园的房子虽不好，但安全有保障，这正是毛泽东看中的原因。为了保障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张治中调来了一个宪兵排，人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排长叫洪世正，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是我们一个村的人，还是我们家的亲戚。给毛泽东、周恩来配的副官和参谋也是我们家的亲戚。当毛泽东、周恩来住到张治中家之后，周围的商贩骤然多了起来，有卖瓜子的，有掌鞋的，还有卖小百货的。这些人都是经过化装来监视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务。毛泽东、周恩来每次外出，总有人跟着盯梢。看到这种情况，张治中也常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担心。大多时候，他总是自己到桂园来找毛泽东、周恩来商谈。他们有时谈到深夜，就做夜宵吃，一般都是点心，但周恩来爱吃元宵，张治中就让厨子另外做一些元宵。谈判末期，特务活动猖獗，并准备给毛泽东制造麻烦，有的民主人士出于关切之情，劝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毛泽东也确实想早点回去处理延安的问题。周恩来得知后便与张治中商量：“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行不行？”张治中问：“准备哪一天走？”周恩来答：“越早越好！”停了一会儿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啊！”张治中非常干脆地回答说：“我既然把毛泽东先生接来了，当然要送他回去！”张治中去找蒋介石说：“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快40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情等他回去料理，他想早点回去。”蒋介石听了很不高兴：“为啥偏这时候走呀，和平协定还没签订哩。”原来过两天就是10月10日，正好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张治中又对蒋介石说：“毛泽东先生是我接来的，我想还是我送他回去的好！”蒋介石更加不高兴了：“现在新疆来了几个电报，催促你去，不然，谈判就有破裂的可能。”“去新疆，我到延安后正好顺路。”蒋不置可否。经张治中挽留，毛泽东同意过了“双十节”再走，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桂园签订了《双十协定》。第二天一早，张治中即陪毛泽东回延安了。事后，周恩来对他说：“你答应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觉都睡不着。”

10月12日，张治中返回重庆，13日即匆匆赴新疆与三区人民革命代表谈判去了。临走时，周恩来偕邓颖超专门到桂园张治中处，当面嘱托，请他到新疆后，设法营救释放我党在那里被盛世才逮捕的一批干部。张治中经过多方努力，被盛世才关押的131名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全部得以释放。张治中还派人负责送回延安。

五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第二次宣布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在内外压力下，李宗仁同意重开国共和谈，并任命张治中为国民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好像见到了和平的曙光，欣然从命。这时，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极力反对和谈，并含沙射影地攻击张治中。特务头子毛森甚至叫嚷：“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都要清算，我要准备用手枪对付他。”为了回击顽固派，张治中毅然径飞溪口，面见蒋介石，把自己的和谈腹案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

石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张治中回到南京后立即发表演说，并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你蒋介石同意和谈。这样，顽固派的气焰才有所收敛，4月1日，张治中一行乘坐“空中行宫”号专机飞赴北平，住在六国饭店。周恩来得知张治中到溪口后很生气，见到他就问：“你是李宗仁指派的首席代表，蒋介石早已下野，你为什么还要到溪口去见他呢！”张治中向周恩来解释说：“现在名义上是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实权仍在蒋介石手里，他可以遥控一个军乃至一个师的行动，光我与你们谈，谈得再好有什么用呢。”周恩来觉得张治中说的在理，气才消。从这可以看出，张治中与周恩来直言不讳，无话不谈，二人关系不深是办不到的。

经过20天的艰苦谈判，双方代表团签了协定，但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致使谈判破裂。李宗仁、何应钦急电张治中要他们径飞上海，并预定好飞机23日去接代表团。23日，从上海起飞的专机飞临北平上空，请求降落。这时，周恩来果断地指示机场指挥台回答：“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降落，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这实际上是周恩来为挽留张治中所使用的缓兵之计。这天周恩来到张治中住处看望他，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发展，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告诫他：“代表团不论回到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分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接着，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张治中看到周恩来这么诚心善意的挽留很感动，但同时也很苦恼——自己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过了两天，周恩来兴冲冲来到张治中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客人吧！”张治中好久都没反应过来，“什么客人？我认识吗？”“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周恩来和张治中坐汽车直奔西郊机场。等了片刻，一架银燕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从机上下来的几个中年妇女和几个孩子。张治中一看，又惊又喜，原来是我嫂子洪希厚，我老伴郑淑华，大哥家的两个孩子，我家的三个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个保姆，共八人。几个孩子一下飞机就扑到他的怀里哭起来了。张治中揉揉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周恩来把我们一家安排在北平饭店一楼住下，他和毛泽东常来看望，问长问短，还有邓颖超大姐。一天，周恩来和毛泽东请我们一家人吃饭，他们说：“在重庆，你们对我们招待得那么好，现在我们条件很有限，只能让你们受点委屈了。”张治中和嫂子听到这亲切的话语，如暖流涌进心房，一时言语也哽噎了。

张治中把国共两党之争，一直当作兄弟之争，他称国民党的失败，是做大哥的没把家当好，让给弟弟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反正便宜不外流。周恩来极不赞成张治中的看法。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对清那拉氏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锟、吴佩孚的声讨也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就是这样，他们俩虽然是亲密的朋友，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留任何情面的。他们多次代表各自一方参与谈判，在谈判桌上，常常唇枪舌箭，如同仇敌，势不两立，但从谈判桌下来却又谈笑风生，亲密无间。正是这种坦荡的胸怀，纯真的情感，使他们保持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六

建国以后，张治中当选为人民政府委员，以后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周恩来积极动员张治中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多开展一些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张治中协助彭德怀促成了新疆 10 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和平改编。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避暑，周恩来亲自派人到北戴河向他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1966 年 6 月的一天，他的女儿素我给他来电话说：“红卫兵来我家抄家了。”张治中便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返回了北京。刚到家，红卫兵就来了，当时没抄家，只是到家里看了一下。周恩来知道后对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说：“张治中将军是我们党难得的朋友，你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后来黄永胜从卫戍区调了一个排驻在张治中家周围。红卫兵来过几次，都被警卫战士给挡回去了。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指使下，对张治中依然不放过。为了劝阻红卫兵的行动，周恩来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三次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了毛主席的安全。”后来张治中病重，周恩来又指示周荣鑫将他送到三 一医院保护起来，并常常在百忙中抽空去看望他。这时，张治中看到国家这个样子，非常忧虑，几次向周恩来倾吐肺腑之言。周恩来总是安慰他说：“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遗憾的是：他们俩都没有等到这种日子的结束就离开了人世。

1969 年，张治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对张治中的病逝，周恩来悲痛不已。亲临八宝山主持了张治中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治中去世不久，其夫人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得知后，多次派人来看望她及全家。张治中去世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更没有积蓄。对此，周恩来知道得很清楚，他特地嘱咐办公室同志送来了一笔钱。总理想得多么周到啊！

多好的总理，多好的人啊！

（张文心）

周恩来与张冲

张冲（1904—1941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参加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一直参与国共谈判，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团结御侮。

——编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国共交往的历史上，有两位当事者的事迹值得一记。一位便是家喻户晓的周恩来；另一位却是鲜为人知的张冲。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张冲，国民党的得力干才。这两位分属于不同营垒而又有过恩怨的人物，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却能捐弃前隙，走到一起，在国共间架起和谈的“桥梁”。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二次合作，留下了动人的往事……

少年立志 匡济天下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又字怀南），别号御虚，浙江省乐清县茗屿乡馆头村人，少而聪慧，5岁能诵《诗经·关雎》，念小学时喜读王安石、苏轼、叶适的文章和陆饶的奏议，文思益广，作文常引证故事，洋洋大篇，自抒怀抱。他自言“平生最信仰范仲淹”，常常高声诵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句。他还时常以诗言志，直抒情怀。登雁荡山，他赋诗曰：“万方多难此登高，一览群山意气豪。四海生灵尚涂炭，澄清天下敢辞劳？”谒岳王坟，他吟诵道：“岳王坟上草离离，松柏南枝亦一奇。草木有情知向背，佞臣底事不思危。”可见其抱负之一斑。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东海之滨。这年下半年，张冲考入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60多名会员都是学业优秀、思想进步的同学，大家推举张冲为理事长。“醒华学会”经常聚会研究新文化，讨论新思想，上街演讲时事，唤醒同胞“复兴中华”。张冲还率领同学到温州各轮船码头检查、抵制日货，积极参与爱国活动，是温州学生界的活跃人物。

1922年夏，张冲考入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在东北期间，张冲曾秘密进行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担任过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1927年3月，军警在张冲住处搜出油印机和宣传品，他遂以“赤嫌”罪名被捕下狱，幸赖母校哈尔滨政法大学校长雷殷庇护，才免一死。“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少帅张学良继掌东北军政，经多方营救，张冲才得出狱。

1929年，张冲返回南京，由同乡同学萧铮、郑亦同等引荐，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先后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党部特派员、天津市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党部书记长等职。张冲才华出众，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陈氏兄弟器重。30年代初，他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炮制“启事” 积极反共

张冲官运亨通，“得志便猖狂”，他秉承蒋陈旨意，不遗余力地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活动，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骨干分子。

1932年2月中旬，在一个神秘人物的主谋下，上海《申报》、《时报》、

《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国内其他主要报纸相继刊出了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杂志上使用的笔名，后作为他在白区工作时令敌人胆寒的化名），《启事》称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具名却只有“伍豪”一人。而其时，周恩来早于1931年底秘密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已近二月。“启事”极尽诬蔑攻击中共和苏联政府之能事，进而诬陷“伍豪”其人，欲借此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瓦解中共组织，其手段毒辣、卑劣。这位神秘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张冲。

张冲为何出此下策呢？原来，1931年4月下旬，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保卫机关）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汉口被捕叛变。主持此次行动的正是张冲派出的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解送南京后，供出了上海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行踪机密，其中包括周恩来经常去的地方。张冲当即率领人马由南京赴沪进行搜捕。当此紧要关头，幸亏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时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截获了绝密情报，枪先一步通知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接报后，立即与陈云商定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临危不乱，神速、果断、周密地处置了一切，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张冲虽有顾顺章的指引却处处扑空，所获无几。事后他叹惜道：“如果没有钱壮飞，定能一网打尽，周恩来也难幸免。”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两三天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

此次“顾顺章事件”交锋，张冲败北。但他并不甘心，便处心积虑，炮制了臭名昭著的“启事”事件。然而他又一次低估了周恩来和中共组织。就在伪造启事抛出后不久，我党在陈云等组织下。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在上海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并利用与《申报》的关系，以当时所能采用的办法，用曲折的笔法在同月的《申报》上登出辟谣启事。接着，又在《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巴和是《申报》的法籍法律顾问，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另一代名），进一步澄清了事实真相。与此同时，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宣告：“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至此，我党采用多种方法巧妙地澄清了“启事”真相，又使张冲一伙无法抓到把柄，只得偃旗息鼓，吞下这颗自己酿成的苦果。

至于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张冲当年炮制的假启事来诬陷周恩来，致使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澄清这个早有定论的事实，直至1975年9月20日，他临上手术台前还用颤抖的手在有关澄清“启事”真相的文件上签字，以存档备查。这是连九泉之下的张冲也始料不及，自叹弗如的。

穿针引线 奔走坛站

几番较量，几度春秋，转眼间到了1936年春天。这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

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不是没有缘由的。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建议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了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张冲在调查科任上，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情报资料，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可见其爱国之心尚未泯灭。

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潘汉年与张冲及陈立夫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随后，潘汉年于8月8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2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也许是历史的默契和必然，就在双方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站，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了。

五次会谈 折冲尊俎

1937年2月初，潘汉年带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这次引荐为两党举行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

1937年2月11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其间，国民党方面主谈者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

这年4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同

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此事结果至今不详）而西安会谈虽然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中共认为有必要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国共双方商定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于是，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在潘汉年陪同下从沪抵抗，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美龄将中共意见先交给蒋介石。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西湖烟霞山那“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会谈开始，双方略事寒暄，周恩来就单刀直入，提出中共的建议，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蒋介石也显得很爽快，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他个人合作，并称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具体问题都是小节，容易解决。很显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取消中共的独立性，把中共合并于国民党。周恩来机敏过人，早已洞悉蒋的用心。他据理反驳，力陈我党的主张。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会谈中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助手张冲看来似乎理亏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回陕北起草这个纲领。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正式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西湖会谈”，张冲做了许多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他与中共的谅解与友谊。周恩来为表诚意，特地与张冲在下榻的别墅前单独合影，留下了此次西湖会谈唯一的纪念物。

此后，国共代表又二上庐山，终至南京。双方自1937年2月到1937年9月，共举行了5次正式谈判，历时7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凡天赋；而后者也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对此，时任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后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解放后回归祖国，曾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的贺耀组对张冲的评价说：“他洞然于民族的危机，抗战的需要应取得之途径。在辅助总裁从事内部团结工作，在南京、陕北间曾多次作善意的努力。”后来，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这样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在这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5月下旬，由张冲出面与中共牵线搭桥而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随团

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毛泽东也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一天夜里，张冲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潘眠石后，因身体不适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到电台一看，大惊失色，狠狠地训斥：“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报关系着抗日救国的大事？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事！并且，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字斟句酌修改好的要电，如果不给我即刻发出去，我要找你们算帐！”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如此声色俱厉，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叫不应也把电文发了出去。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至此，张冲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带着笑意离开电台。

风雨同舟 力维大局

张冲最初是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后来成为陈立夫办理对苏外交及与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脱离“调查统计”工作，直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5年多（1936—1941年）时间里，虽然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新华日报》代论《悼张淮南先生》中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常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当然，他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不都是一团和气、一帆风顺的，但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冲性情随和，为人豁达，聪慧敏锐，能言善辩，他“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时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周恩来语）。加之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思想较为开朗，故而容易接受新事物，听得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他“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极表赞赏。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确实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张冲精通俄文，熟知苏联的风土民情，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是苏联人，故从1932年起就参与了对苏外交。1936年春，张冲与孙科、冯玉祥、陈立夫、邵力子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张冲担任理事。该会在汉口推请张冲创办俄文专修学校。张冲不顾教学俄文有被“赤化”的嫌疑，慨然应允，为“联苏”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1月，他又作为赴苏“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接触的斯大林单独约见张冲达5小时之久，可见其重视之程度，这次出访，争取到了大量的军援，如后来保卫大武汉时的唯一的一支国际空军部队，就是由苏联空军组成的。张冲回国后即被蒋介石遴选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成为国民党内主张联苏的中坚分子。他与冯玉祥、贺耀祖、邵力子、张治中等“亲苏派”时相往来，与驻苏大使邵力子（接替杨杰）以及被称为“国共夫妻”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倪斐君夫妇的关系更非一般（张冲逝世后，丧仪及生平事略均分别由贺耀祖主持和撰写）。张冲内引外联，广揽人才，积极开拓，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争取外援做出了贡献。因而周恩来谓其“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为此，苏联总顾问回国述职返回重庆时，还带来了斯大林送给张冲的一件高级西装大衣，以示问候。张冲则以顾问处名义向斯大林回赠了一件珍贵的水獭皮大衣。

与此同时，张冲仍尽心尽力地从事国共的联络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充任联络和安排，并居中周旋，从大局处努力。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周恩来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是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是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令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来对张冲的影响和帮助是很多的，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

观点及时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1941年1月，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他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而当《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辞“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后，他则深表同情。国民党顽固派害怕进步舆论，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去《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政治压迫愈演愈烈。1月18日，《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受阻，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桓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这场景，就是今天我们从文艺作品上所看到的当年那桩“报事”斗争的“模特”背景。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远处看，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浸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态，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周恩来语）；由眼前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张冲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就在此时，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的。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间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做些让步。但中共历来不拿原则做交易，更何况一月“皖变”、二月“报事”、三月“参政会风波”、四、五月“中条山战役”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发动制造的。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又与周恩来谈了三个小时，他苦苦哀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参政会，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

来等，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的缓和。

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他仍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为弥合国共两党裂痕而奔走呼号，但他已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他每天一回家，便大声叫喊着夫人的名字，仿佛是怕家中出什么事。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至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说完，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至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不幸于1941年6月染上恶性疟疾。他起初没有介意，仍力疾从公，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还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临末一面，他自知不起，嘱周恩来与自己的后继者（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保持联系，免使国共关系冷淡。当时，日军飞机日夜不停地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加之气候炎热，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既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两党主要领导人纷纷致电家属唁慰。中共中央还同意周恩来建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3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拟送挽联。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会场内外挽幛高悬，哀乐低迴，冠盖云集，备极哀荣。蒋介石亲临祭奠，并撰写哀辞：“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在众多的挽联中，中共领导人的几幅特别引人注目。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器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为：“国土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叶剑英、李克农送的挽联曰：“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

与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过世尤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有感于此，他写了“安危准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时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里来了。”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2000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代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抗日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代表中共和人民表达了对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追悼会后，张冲的灵柩暂厝于重庆歌

乐山，本来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后迁回原籍雁荡山安葬，后因战乱而未果。

解放后，周恩来仍未忘记张冲这位“安危与共，风雨同舟”的朋友。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遇到张冲的同乡、著名医学专家洪式闾教授，还特意提起张冲，说张冲是他的好朋友。周恩来对张冲所遗子女也格外关照，长子张炎遵照周恩来的嘱咐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女儿张雪梅则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周恩来与张冲这两位特殊领域展开特殊斗争并结为特殊朋友关系的爱国者，为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民族存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历史已有定论，人民不会忘记。而他们的交往历史也已昭示人们：祖国统一大业终将要实现！

（仲向平）

周恩来与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权,组建国民军任总司令。1926年加入国民党。北伐战争开始后,在五原誓师,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1936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先后被任命为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1月被撤去指挥作战的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张和平、民主。1946年9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积极支持国内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8月离美回国途中遇难。

——编者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过从甚密,在交往中逐渐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在冯玉祥的眼中,周恩来是一位“识大体、明大义,同时又很能忍耐”的人。他认为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局势下,“为国相忍就是救国家”。因此,周恩来一直是他极为敬重的朋友。

1937年8月,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周恩来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就两党关系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冯玉祥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接待。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特意抽出时间拜访了冯玉祥,两人热烈商谈了合作抗日的问题,彼此有了初步了解。

年底,随着战局的推进,周恩来与冯玉祥先后到了武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已经有了公开活动的机会,他经常拜访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将领,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冯玉祥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住所也成为周恩来经常出入的地方。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和王明到福音堂看望冯玉祥。那天,他们两人都穿着八路军军服,这使身为军人的冯玉祥感觉特别亲切,忙请他们到会客室坐下。

当时,日寇主力已向徐州逼近,他们准备打通津浦路,夺取武汉。这引起国民党内消极悲观情绪滋生,军队中思想也极其混乱。因此,谈起抗战局势,冯玉祥甚为忧虑,向周恩来请教办法。

周恩来详细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后,坦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今天,日寇对我国实行全面的进攻,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他看了看冯玉祥接着说:“不过,这需要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努力。冯先生,您说对吗?”冯玉祥赞同地点点头。

周恩来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但是,目前最高当局却缺乏民众的意识,把抗战只看成是政府的事,处处害怕和限制人民参战,阻止军队与民众的结合,这种做法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却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冯玉祥问:“周先生,您看抗战的前途如何呢?”

周恩来回答:“由于当前抗战还存在弱点,在今后抗战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挫败,因此要看到这场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

随后,他又向冯玉祥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次谈话给冯玉祥很大的启发。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能使冯玉祥深为佩服,自愧不如,因此,第二天,他就在会客室里写了八个大字“吃

饭太多，读书太少”，表达了对周恩来的钦佩之情。

临行前，周恩来又与冯玉祥商量的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事，想请正在冯玉祥门下做事的老舍出面主持，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冯玉祥的热情支持。

此后，周恩来与冯玉祥的来往更为密切了。冯玉祥一有机会就请周恩来到家中做客，实际上是请他来谈谈时局。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冯玉祥总是派自己的车去接他。

冯玉祥是主张团结抗战的，因此，周恩来的每一次谈话都对他很有启发，增加了许多新的认识。这样，他在视察阵地，督练新兵，上台讲演时就有了许多丰富、新颖的内容。

冯玉祥的态度也很受周恩来的重视。平时他工作忙，分不开身时，常常请邓颖超或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去看望冯玉祥，加强对他和他的部下的统战工作。邓颖超、凯丰、李涛等同志都曾在冯玉祥为部下开办的学习班上讲过课。

有一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到福音堂看望冯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正巧冯玉祥在会客。邓颖超在会客室等候时提笔写下了八个字：“精诚团结，贯彻始终”。这八个字不仅反映了周恩来与

冯玉祥之间真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周恩来对冯玉祥的殷切期望。

正如周恩来所期望的，以后，冯玉祥一直为团结合作，坚持抗战而奔走。无论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还是在抗战结束之初内战重起的紧急关头，冯玉祥都给了中国共产党真诚的帮助。1946年校场口事件后，冯玉祥的革命行动和言论惹怒

了蒋介石，他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给予的“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远离亲人和祖国，去了美国，然而他的心却一直留在国内，当新中国即将成立召唤他回国时，他毅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引诱，投向祖国的怀抱。不幸的是他在回国途中因轮船起火而身亡。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他终于“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为一个民主的军人”，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对冯玉祥的最终归宿，周恩来早有预示，1941年11月14日冯玉祥60寿辰时，周恩来给他送去了亲笔写的祝词，这是一份相知甚深的人才能写出的祝词：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嘻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

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须。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也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祇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你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机，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祝词对冯玉祥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表达了周恩来对他的真诚祝愿，鼓舞了冯玉祥对此后生活道路的正确选择。

冯玉祥是在同周恩来的交往中认识了共产党，并同旧的过去划清界线的，因此，他的转变是同周恩来分不开的。正如一位长期伴随在冯玉祥身边的秘书所说：“冯玉祥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后半生在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中，得到帮助和鼓舞，使他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在执行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取得的巨大成功。”

（廖心文）

周恩来与李杜

李杜（1880—1956年）原为东北军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抗战。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1947年被吉林省解放区人民缺席选举为吉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长，并被邀请前往东北解放区。后因故未能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编者

李杜原是吉林省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24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毅然举兵抗日，组建吉林自卫军，与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一度声誉全国。1933年7月，李杜兵败进关来到上海，立即投身到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进步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就任该委员会的武装部长，继续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大业，期间并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秘密的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奔波于西安、南京和延安之间，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争取各方面人士，热心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其中，李杜便是周恩来重点接触和争取的对象之一。

1937年3月，周恩来利用赴杭州谈判途径上海之隙，冒着国民党特务监视跟梢的风险，约见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并亲自到上海马斯南路8号李杜私宅拜访。周恩来、李杜见面后，周恩来高度赞扬了李杜投身抗日，为国为民的功绩，特别肯定了他进关以后倾向进步、团结抗战的表现，并希望李杜能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新的贡献。李杜在交谈中也表示出对周恩来的“异常尊重和爱戴”，同时一再认识自己的工作距离民族和国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最后表示说：“周副主席怎么指示，我就怎么做。”

6月，在周恩来的积极倡导和多方联系下，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东北各方人士组成的东北民众救亡总会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李杜遵从周恩来的指示，热心参加这项工作，会后还邀请东北同仁便宴。同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李杜特派秘书刘丕光、董麟阁和办公室主任于炳然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该团体；董麟阁、于炳然还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以后，李杜同周恩来的交往愈密。在交往中，李杜愈发增进了对周恩来的敬慕，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中华民族出了周将军这样的人才，实乃国家、民族之幸！”

是时，由我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风起云涌，很快发展成拥有11个军3万余人马的抗日武装队伍。为了争取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我党决定举荐有抗日名望和爱国之心的党外将领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推举李杜就任斯职。当于毅夫把抗联总司令的关防及周恩来的态度转达给李杜时，李杜激动万分，欣然就职，决心不负周恩来的重望。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李杜一再请缨重赴沙场，并请求晋见蒋介石面叙一切。周恩来很是赞同李杜的想法，特意指示李延禄作为东北抗联代表随同李杜前往晋见，还一再叮嘱李延禄凡事听从李杜的意旨，配合李杜行动。这次晋见，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东北抗联是合法的抗

日武装团体，并答应拨出一笔经费在后方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1937年11月，李杜飞赴欧洲求援军火，并准备借路返回东北投身抗日。周恩来当即指示李延禄随同前往，还意味深长地说：“跟李杜走，这就是党的工作，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但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各方面的原因，李杜此行未能遂愿，不得已回国。时南京已经沦陷，李杜辗转武汉、桂林，后入重庆。在桂林滞留期间，李杜一再挽留李延禄跟随他一起工作，当李延禄讲明去延安是受周恩来的指示时，李杜立刻收回意见，明确表示说：“那得听周副主席的。”说明了李杜对周恩来的无比信赖。

李杜进入重庆后，立即在南山区建立起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时周恩来也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住在重庆，二人来往愈加密切。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李杜分别在重庆、香港、天津等地架设起电台，还建立起一条重庆到东北的秘密地下交通线，不断把抗日联军坚持抗战的消息传播到全国人民中间，又不断把党和人民的温暖送到抗联指战员的心中。由于李杜频繁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接触，思想和行动更是明显地倾向进步势力，因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忌恨和仇视。1942年6月，戴笠指使一伙特务砸了抗联总司令部，没收了无线电台，还断绝了抗联总部的经费。李杜也在特务的监视跟梢下失去了活动的自由。然而，李杜并没有沉沦下去，继续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新华日报》的负责人往来，被我党尊称为“南山五老之一”。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叶挺等遇难，滞留重庆的李杜闻讯立即给周恩来拍去信电，表示“无任痛悼”的心情，落款以“弟李杜拜息”收笔，也可看出李杜同周恩来交往之密切。1946年，内战升级，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临行前，周恩来特派专人邀请李杜去延安，遗憾的是由于李杜年迈体弱而没有成行。但是，他的心却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想往追求民主进步的人们的心跳在一起。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民主人士组织的和平民主进步运动，针锋相对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因此被缺席选举为吉林省首届人民参议会议长。

1949年11月28日，重庆解放，李杜欣喜若狂，当即给周恩

“南山五老”为当时居住重庆南山的东北军政界五位爱国人士，他们同中共关系甚好。来拍去电报，欢呼重庆的解放，祝贺中国人民的新生。全国解放后，李杜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重庆市政协常委。1956年8月，李杜逝世，周恩来闻讯后，亲自送了花圈，以示悼念。

（王希亮）

肝胆相照亲密无间

周恩来与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编者

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被一品红和棕榈树等装点得花团簇拥着，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正在这里主持团拜会，招待在京70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人和参事中的老人。同时，为沈钧儒等各位老人集体祝寿。

宴会上，周恩来主席满面春风地致祝酒词，他说：“今天，我们很高兴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他们的夫人聚集在这里，欢度1963年的元旦。”“四年前政协委员曾邀请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举行了一个茶会，当时我刚好六十一岁，也列入了老人的队伍。四年以后的今天，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在一起时，我又变成了后生。”听到周恩来主席这番亲切而风趣的讲话，大厅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主席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时代，才能享受这样的幸福，希望老人越活越年轻，争取成为百岁老人，看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功……”。

周恩来主席的目光又转向坐在第一席首宾位的沈钧儒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沈老听到周恩来同志的祝辞，十分激动地起立举杯祝酒。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地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提议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长寿，祝大家健康长春。周恩来同志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对沈钧儒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他一生经历的最好总结。回来后，沈钧儒激动地对家人说：“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今天！”

沈钧儒出生于封建家庭。但是，他一生中，追求真理，要求进步，从大革命时期起，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革命工作。在他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不断地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靠近党，相信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接受党的领导。这其中尤以周恩来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远。沈钧儒与周恩来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彼此肝胆相照，结成了极为亲密的革命友谊。

早在大革命时期，沈钧儒就参加了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代理主席宣中华，就是共产党员。从这时起，沈钧儒就同共产党有所接触。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和担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时，从思想上已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营救被迫害的中共党员与进步青年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沈钧儒与邹韬奋等人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

“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十二项主张。1936年5月，沈钧儒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正式组成，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普遍展开，因而更遭到反动政府的摧残与迫害。同年十一月沈钧儒与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被捕入狱。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向蒋介石提出的六个条件中，就提到了“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这对沈钧儒影响很大。当时沈钧儒与周恩来同志相距千里，尚未见面，但革命的共同理想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

1937年夏，“七君子”从苏州监狱被释放不久，沈钧儒就来到南京，这时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叶剑英正在第十八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八月中旬一天，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一个茶话会，沈钧儒应邀出席。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周恩来。他们二人又约定次日九点钟在办事处会面。周恩来说，万一他不在，可以与叶剑英同志谈，叶剑英是完全可以代表他的。第二天，沈钧儒见到了叶剑英，谈了救国会的工作以及“七君子”出狱后的情况。叶剑英一方面对救国会致以慰问勉励，一方面说他立即将救国会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武汉沦陷以后，沈钧儒同周恩来都到了重庆。周恩来除与国民党政府做面对面斗争外，还不时关怀统一战线和各民主党派工作，团结聚集在渝的各党派爱国民主力量。此时活动颇多，接触相当频繁。

当时，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的住所——“特园”便是各民主党派经常集会和活动的场所。那里经常是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民主人士沈钧儒、史良、李公朴、陶行知、张申府、黄炎培、柳亚子、梁漱溟、章伯钧，还有爱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李济深等和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同志也经常光顾“特园”。周恩来在这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各种巧妙的方法和形式同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如利用为沈钧儒、郭老作生日时集会，吸引和团结了各党派抗日爱国民主力量，揭露和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从而坚持了团结抗战的主张。因而大家把“特园”誉为“民主之家”并由郭沫若题写了匾额。

1943年12月21日重庆文化界、妇女界、法学界及各党派人士，假座百龄餐厅举行茶会，庆祝沈钧儒七十寿辰。在欢声笑语中，陶行知宣布开会，他说：“今天许多朋友到这里来庆祝沈先生的七十寿辰，这不是平常的祝寿。因为沈先生毕生的奋斗、主张，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沈先生的主张是什么？有三项：一、抗战；二、团结；三、民主。当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就坚决主张抗战；为使抗战胜利，就坚决主张团结；为使团结巩固，又坚决主张实行民主。这三项便是沈先生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主张。”接着，于右任、邵力子和郭沫若都讲了话。董必武那天也讲了话，他说：“记得我们跋涉在沙漠中（指长征途中）的时候，就听到沈先生以及当时救国会邹韬奋诸位先生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我们赞成这个主张。抗战以后，本人和沈先生经常往来……”他还说：“沈先生所主张的抗战、团结、民主，尚待我们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我们要学习沈先生的精神。”在当时反动的烟雾笼罩下的重庆，这次盛会名为祝寿，实际上是公开号召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大会。

1944年11月，因事暂时离开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时隔一年五个月之后，

又飞到重庆，参加了郭沫若欢宴柳亚子的集会。沈钧儒于集会后，喜而作诗云：

经年不放酒杯宽，
雾压山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
感时惊向域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
触角长惭豨豸冠。
痛笑狂欢俱未足，
河山杂遝试凭栏。

诗中的“有客喜从天上至”，指的就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到重庆。很明白，沈钧儒是通过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来表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彻底揭露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等于1945年8月28日亲赴山城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期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见面。毛泽东同志在9月2日晚应邀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事实上这是一次欢迎毛泽东同志的盛会。沈钧儒、郭沫若、张澜、冯玉祥等人都出席了这次酒会。

为了便于谈判和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3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三十号、三十五号、十七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同时以上海的马思南路一七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与周恩来同志密切联系，谈论工作，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

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奉党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的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还将放在马思南路中共代表团客厅里一把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色瓷如意赠给沈老。那时候，周恩来曾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看形势，三、五年之后回来，可能性很大；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周恩来赠送这柄瓷如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沈老的莫大信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沈老与周恩来晤面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时，沈钧儒对党的忠诚和爱戴是与日俱增，老而弥笃的。他曾经几次说：“我很想再活二十年，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恩来先生说我留在党外能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了。”说话的时候，沈钧儒的表情非常严肃，象是有点遗憾，又象引以自豪。一心向往党的事业，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一切服从革命需要，这就是沈钧儒在和党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1963年元旦宴会后，九十岁高龄的沈钧儒突患急性支气管炎住进北京医院，不幸于6月11日逝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同志在悼词中说：沈钧儒先生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以后的长时期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一生。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这是中国共产党对爱国老人沈钧儒先生一生的高度评价。

（郭培德）

周恩来与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年），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美国。1916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1944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编者

1938年9月30日，陶行知在遍访欧美二十八个国家后返抵香港。次日与邓颖超、任光同船回到武汉。稍作安顿后，10月5日即去拜会周恩来。

周恩来向陶行知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陕北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抗战，坚持生产自救，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陶行知听后兴奋不已，在这一天的“备忘录”上写下了“与周先生谈病”六个字。

陶行知得知，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从敌占区流亡到重庆，心里十分焦急，决心去重庆抢救这些孩子。1939年7月20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一些进步人士支持下，育才学校正式成立。办学宗旨很明确——为抗日战争培养小战士；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校内采用新的教学体制，在初中阶段就分组学习，共分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组。经周恩来、吴玉章等安排，李鹏也进了育才学校学习，分在社会科学组。

1940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等来到北碚草街子古圣寺参观育才学校。陶行知正好外出，马副校长带领学生们热情接待了周恩来夫妇。周恩来来到陶行知居住的茅屋“逸少斋”，学生们用大瓦壶倒了一碗白开水给他喝，他端着那个大粗碗笑了，说：“你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在延安差不多哩。”吃午饭时，我们摆出六菜一汤，周恩来说太浪费了，要求和师生们一起吃，经再三推让，减去两个菜，他才勉强吃了。

第二天，周恩来向全校师生讲话。他说：“小朋友，你们真幸福啊。我在你们这样大时，背后还有一根大辫子。我们费了多少劲才找到了革命的真理。你们现在好了，不用绕这个大圈子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啊！”他又说：“有的小朋友问我，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这个，我们这些人不一定能看到了，可是你们一定能够看到！一定！要说时间，我看大约还需要四十年！”

四十年，我们都觉得太长了。但是周恩来那坚定的信念深深感动了我们，大家都决心用自己的努力让胜利早一天到来。

散会以后，不少同学拿着笔记本和笔，请周恩来签名。周恩来在绘画组伍必端和戏剧组赵国英等同学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一代胜似一代

周恩来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派人给陶行知送来四百元钱，说是捐给育才学校添置运动器具。

这一年冬天，学校党组织准备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报告工作。在总结会

上，有位老师思想过左，发言伤害了不少老师。陶行知十分气愤，表示：“如果闹分裂，我首先离开！”这事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明确指示：“要改选支部。支部在那里首先要搞好团结，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学校办好。如果共产党员在那里闹不团结，那首先找支部书记！”他当即决定把原来的支部书记调开，另由戴伯韬去接管、整顿这个支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育才学校也面临危机。周恩来放心不下，在一天傍晚悄悄来到“逸少斋”，把所有共产党员老师都召集到一起，整整谈了一夜。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险恶形势，嘱咐大家沉着应变，并说万一情况危急，学校可以租大木船往川北方向撤退，保存党的实力。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陶行知经常和夫人吴树琴一起去曾家岩“周公馆”面见周恩来。归途，陶行知兴奋地说：

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陶行知，生活上也是关怀备至。陶行知身上穿的一件用延安毛线织成的毛衣，就是周恩来特地送来的。一次我去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正遇上陶行知先生。他穿着一身新的呢制服，站在冬日的阳光下，开心地笑着。原来，这是毛主席送给他的，是用延安织的呢子做成的。但这身制服他只穿了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穿过，因为它太引人注意了，当时在重庆只有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才穿它。

1946年1月10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为叶挺将军出狱，在红岩举行欢迎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师生应邀出席并表演节目。会后周恩来对同学们说：“这次国共和谈后，可望召开政协会议。以后联合政府成立时，教育部长就是你们的校长陶行知了……你们的校长做了大官，你们当中说不定也有人做小官。”

大家嘿嘿笑起来。周恩来又说：“希望你们将来做了小官，也不要忘记做小先生，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

最后这句话，周恩来说得有几分激动，它马上被掌声所淹没。这是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教导啊！

几天后，重庆社会大学成立，校长陶行知，副校长李公朴。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应邀讲话。他说：“常常有人问我，解放区该怎么办教育。我说，你们看了陶行知先生怎样办教育，就明白了。”对于历尽艰辛、不断奋进的陶行知来说，这是多么可贵的鼓励与支持！

这一年4月11日，陶行知离开奋斗了七年的重庆，乘飞机去南京。不久，周恩来也来到南京，陶行知夫妇专程去梅园看望。周恩来畅谈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发展前途的看法，然后问起育才学校的情况。陶行知告诉周恩来，育才学校正准备迁往上海。临别，周恩来特地叮嘱陶行知注意身后的“尾巴”，陶行知这才注意到，在梅园周围果然有那么一些伪装成修鞋匠的不三不四的人。

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暗杀。陶行知悲愤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加紧工作，并给育才师生留下遗嘱，再三告诫，一定要做到“威武不能屈”！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突发脑溢血，病情危急，陆治立即打电话向位于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报告。待周恩来、邓颖超赶到时，陶行知已

停止了呼吸。周恩来俯身拉起陶先生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放心地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和后继者们坚持下去的。我们要以争取全面、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会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周恩来并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

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假如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在电文最后，周恩来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当天，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都给陶行知先生的家属发来了唁电。延安举行集会追悼陶行知，毛泽东为追悼会题词：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先生辞世后，周恩来与陶行知的交往并没有中止——他仍在关心着育才学校。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全国已到革命胜利前夜。因重庆尚未解放，育才学校经济上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时，校长孙铭勋找到我说，香港有人给育才捐了一笔钱，叫我陪他一起进城去取。

在下半城一个电料行内，我远远看到孙校长在和那位经理“咬耳朵”，随后孙拿出一个白布袋，经理便往里面装银元。

归途，孙校长压不住内心的激动，悄悄对我说：“有八百块哩！”我当然不便问是谁捐的。直到解放后孙铭勋才告诉我，那笔钱，是周恩来托人从香港汇来的。它包含的不仅是周恩来对育才学校的支持，同时也是对陶行知未竟事业的支持。

（郭以实）

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年），我国藏族宗教领袖和西藏地方政治领袖之一。1943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后为十世班禅。建国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编者

1979年7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被增选为政协副主席；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被补选为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班禅大师的复出，了却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也考虑到了让班禅出来工作的问题。1974年3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又一次找来阿沛·阿旺晋美，商议让班禅出来工作的事。但是，由于不久“四人帮”搞意在批判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让班禅出来工作的意愿未能实现。

“我从幼年起一直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班禅毅然率堪布会议厅（班禅属下的办事机构，简称“堪厅”）成员留在大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反对“西藏独立”。1949年10月，堪厅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名义致毛泽东、朱德的电文中，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表示：“希望先生和全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从这时起，班禅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取得了直接联系，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座上客。1987年，班禅曾在日喀则谈及建国初期他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时说：“那时，我是个‘小鬼’，深得毛主席的宠爱……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开始时，中央特别邀请班禅到北京，共同协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计。1951年4月27日，率领堪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北京。其时，这位少年活佛刚满13周岁。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设宴款待，为他接风洗尘。这是班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双方年龄、经历和信仰悬殊较大。年过半百的周恩来以他特有的谦逊和真诚接待了班禅。班禅虽然年少，但由于从小受到经师的指点，显得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双方进行了十分融洽的长时间交谈。这头一回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班禅意识到：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伟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又是自己可以信赖的导师和长辈。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这次会面，奠定了周恩来与第十世班禅之间长久而深厚的友谊的基础。1954年9月，班禅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务委员；同年，又在第二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班禅时年16岁，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协，班禅与周恩来之间又加上了一层“同事关系”，他得到毛泽东名誉主席和周恩来主席更多的、更直接的关怀。次年3月9日，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西藏，并

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达赖和班禅之间关系的悬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关于历史悬案问题的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批复》。同月，达赖、班禅等人离京返藏，周恩来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

1956年11月至1957年初达赖和班禅应印度政府之邀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时，正值周恩来在印度访问。他多次与达赖和班禅谈话，并代表毛泽东对达赖说：“西藏的工作要靠你和班禅作主，班禅帮助你，你们互相商量，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周恩来充分信任和尊重班禅，班禅也向周恩来表示：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按照中央的安排办事，绝不会受外界影响。在周恩来的指导、帮助下，班禅毅然摆脱了叛国分子的纠缠。回国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对班禅在印度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

根据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从1955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地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一开始，由于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部分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有的地方民主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又未能为群众充分理解，有的地方还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武装叛乱。195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召集在京的少数民族、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开会，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当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但是，中央的精神在有些地方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一些地区的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1959年3月，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3月20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制止、平息叛乱。叛乱迅速平息后，3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6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期间，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3月21日，班禅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4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表示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文件，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59年10月，在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庆典后，班禅与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左”的、过头的做法，再加上看问题角度和认

识上的某种偏差，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一些怀疑，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的情绪。班禅返回北京后，周恩来于1960年1月25日接见了，听取了他的意见，认为：班禅“出发点是好的”，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在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互相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

1960年10月至12月，班禅在参观访问四川、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作过13次长谈，“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札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出，但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的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纪要》后，分别的班禅进行了交谈。1961年1月24日，周恩来与班禅的谈话中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领导上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是背叛祖国、压迫群众，“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周恩来还说：毛主席和我都是“主张慢一点的”。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这次谈话，解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1961年底他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

在写作书面报告时，班禅汉语掌握得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1962年5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完成。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所耳闻，也很关心。当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行将去东北视察。为了尽早地了解班禅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在去东北之前，周恩来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于1962年5月18日下午详谈，并通知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班禅很长一段时期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加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5月18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署的日期为“1962年5月18日”）。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班禅把报告的写作，译校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运用他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析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西藏和平解放11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认为在具体工作上，尤其是平叛以来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与事实符不符等，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

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等班禅报告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读后，再谈一次。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后，终于在6月初定稿、付印。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七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内容共分8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七）关于宗教；（八）关于民族工作。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旁及其他藏族地区，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8个部分。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教都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在西藏工作的一些地方干部，民主作风不够，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上述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有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1）对自治权力的认识；（2）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藏族问题的认识；（3）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4）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5）对叛乱原因的认识；（6）对地方错误问题的认识；（7）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

5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

“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开有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

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7月19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和教育工作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到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流血，但流了不少汗”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7月24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提出来了，就必须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两方面的情况，有对的，有不对的。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8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提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要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五）关于宗教问题。周恩来说：我很欣赏你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他把班禅提出的宗教五项原则与自己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取名为“潘查希拉”（印地语指五项原则），还风趣他说，“政治上的‘潘查希拉’我有一份，宗教上的‘潘查希拉’是你创造的，版权所有归你。”并强调指出：“消灭宗教，就是消灭人民了，就成了消灭自己了，帝国主义才这样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消灭宗教’的问题。”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

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班禅听完周恩来的谈话以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是不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解。8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后来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8月13日至9月2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四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落实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1962年秋季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更是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一时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

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三顶帽子。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

“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班禅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以后，周恩来给予了悉心关照。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判班禅后不久，周恩来担心班禅在西藏发生意外事情，特指示有关部门，让班禅离开拉萨到北京居住。1964年11月，班禅全家搬来北京。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住在已故的沈钧儒副委员长的寓所里，这实际上仍然是按副委员长的待遇安排的。班禅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周恩来的极力劝阻，“红卫兵”也未能擅自冲击班禅。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周恩来保护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艰难。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一批“红卫兵”不顾周恩来的指示，强行冲进班禅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之后，又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去制止批斗班禅。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后，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卫戍区领导曾告诉他，“周总理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您，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您弄走。”班禅深深感动，但他只能感受到周总理的关怀、温暖，却难以见到自己尊敬的周总理。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好了一些，周恩来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寓所。直到1968年夏天，班禅又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不久班禅再次被“隔离监护”。这次他完全被与外界隔离开来。直到1977年10月才获释。而这时他所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班禅出狱后，每逢周恩来总理的祭日，他总要早早地起床做好祈祷的准备。然后在上午10点钟左右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恭恭敬敬地为周总理献上精致的花圈（或花篮）和洁白的哈达，寄托自己深深的哀思与怀念，为周总理祈祷。1988年4月4日，班禅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新闻

发言人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顾自己的历史时，向全世界坦露了他对周恩来的深情：“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1989年1月7日，班禅到自己亲手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检查、布置工作。有人问及他第二天的安排。班禅深情地说，“明天是周总理逝世纪念日，念完晨经，我还要祈祷祈祷，早上不能安排别的活动。”1月9日清晨，班禅离京赴藏。1月28日，由于操劳过度，第十世班禅大师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杨明伟）

涓涓细流润心田

周恩来与老舍

老舍（1899—1966年），现代小说家、戏剧家。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胜利后，赴美国讲学并进行创作。建国后应召回国。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等。

——编者

我已经快90岁了。我一生经历了成千上万件事情。结识了成千上万位人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使我一生难忘的，教我一想起来便激动不已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我握过他的手，和他谈过话，挨过他的训，得过他的鼓励，吃过他做的菜，受过他的保护。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回想起来，也许就是这么一点难忘的回忆，使人能安静地坐在窗前，望着自己一生的旅途，对自己悄悄地说：我不是个有福的人，但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我见到过世上最完美的人。

现在，我愿意将我的回忆说出来，留在世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觉着，上苍塑造这么一个完人真是不容易，千载难逢吧。

大约是在60年代初，夏日，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并没有什么名气。坐在席上才搞清，这是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她们俩成功地给邓大姐做过一次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 and 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饭后周总理象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像片后面注有“1961年7月1日摄于向阳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大姐并肩而立，微笑着，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的。

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出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花厅外面，当院，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了情趣的晚宴。

通过这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办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他会按

常规的仪礼去款待人家，必要的时候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他关注人家，如果人家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诞生了。而这，往往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舍予的一句常说的话是：“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往往，这题便引出一部大型话剧来。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化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党着，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连报自己的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铎、王统照同庚。”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

在一次座谈会上，舍予提出来要去新疆石河子地区体验生活。话音未落，总理就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舍予瞪了总理一眼，笑道：“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舍予写的戏，总理几乎全都看过，不光看，还帮着出主意，帮着修改，有的甚至由头到尾直接参与创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为作者撑腰，使几出最重要的话剧得以出台。没有他的慧眼卓识，有的戏，包括《龙须沟》和《茶馆》在内，恐怕都是另有一番命运。《龙须沟》写成之后，“人艺”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上演《保尔·柯察津》，一时演外国戏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龙须沟怕脱离现实。总理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演《龙须沟》也是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不出他所料，《龙》剧上演后大受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总理还推荐给毛主席看。《龙须沟》成为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出大型话剧。

到话剧《茶馆》彩排的时候，不同意见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总理再一次站出来说话，认为《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看看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看了《茶馆》排演之后，总理在和导演、演员座谈时也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像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他认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谈完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理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

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这便是周恩来！

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了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贴贴。

记得有一次，北京饭店里举行盛大的舞会，好像是欢迎志愿军英雄，舍予带我去参加。舍予和我都不会跳交际舞，他找朋友去聊天，我就一个人坐在一边看跳舞。总理的舞姿非常潇洒，许多年轻的女演员都争着找他跳，谁能跟他跳上一回，小伙伴们都能把她围起来，庆贺一番，羡慕得很。哪晓得，总理径直向我走来，说：

“我请你跳舞。”

我窘在那里，半天才木木地憋出一句：“对不起，总理，我不

总理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我后悔极了，舍予呀舍予，干吗咱俩不学跳舞呀！

那天黄继光的老妈妈也来了，大家围着她问寒问暖，谁知道，越安慰越糟，勾起了老妈妈思子之情，当场落下泪来。周总理赶快跑过来解围，他把大家扒拉开，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亲她的脸，轻轻地为她用手擦去脸上的泪，对大家大声地说：“不说啦，不说啦，跳舞！跳舞！”然后，双手拉着老妈妈的手，慢慢地在舞池里“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去，老妈妈脸上已经有了笑的样子。我自己却看模糊了双眼。

对舍予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1938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另一次是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台的大好形势，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提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是他特意保留的唯一的一封书信。可惜，“文革”时抄家，此信不知所终。两次最重要的召唤，均出自周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舍予的引路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也许，正因如此，当舍予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一再对我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这是1966年8月24日凌晨，他头脑里唯一坚信不移的一件事。或许，一切一切都破灭了，只剩下了这个。

他是怀着这个信念在当天的深夜走入太平湖的……舍予撒手而去，苦了另一位活着的、他的引路人，他的好朋友。后来一系列事实证明，舍予的突死使周总理大为震惊。8月24日上午，舍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造反派”向我要人，还到顶棚的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我把舍予藏了起来。我马上预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一个念头就是向总理求救。我想，有一次舍予生病，吐了点血，我自己买了点药，让他歇了几天，而没有报告。事后，总理来家看望舍予，见了我，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不要自作主张，要送医院，要直接向我报告！”

想起这个叮嘱，我悄悄地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总理转递报告，请他帮助把舍予找到。

25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实际上，当天上午已经找到他，在湖水中。

一切都完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总理。

一个偶然的时机使我知道了：总理在舍予死后，为舍予，为我，还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我的惊讶，我的感动，我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

大致半年多之后，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发现王昆仑先生由我面前经过，他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我：“总理的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所答。

于是，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总理得机会碰见了王昆仑，问他知道老舍死了吗？王说知道。又问，知道是怎么死的吗？王答知道一些。总理说：“那好，我们以后单独谈。”接着总理便求王昆仑代表他去胡絮青处看看，一是代表总理向她表示慰问，二是看看她的近况，回来向他报告。王昆仑当即表示有难处，建议总理还是叫周荣鑫去吧。总理没有勉强王昆仑。过了几天，夜晚，总理约王昆仑到总理住地长谈。

总理听了王昆仑的叙说，还追问了许多细节。这一夜，他们谈得很久，直到深夜。

听了王昆仑谈的这一切，我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我的孤独似乎是注定命该如此的。

当天夜里，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还想着我，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舍予去世5天之后，周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他自己拟就了要保护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同样是在五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舍予的血和死，还有同期死去许多善良的人们的悲剧，换来了那份保护名单和那篇社论，代价可谓大矣。然而首先想到这个代价的，当时仅总理一人。舍予是第一个沉死太平湖的人，继他之后，据说，在那可怕的8月末，达到了上百人。假设没有那五天之后的电文和社论，说不定沉湖的人会多于水中的鱼。

在以后的日子里，像蝉脱壳，每隔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禁锢便被剥去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舍予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对我说，这笔款子可以由我和子女自由支配了。我明显地感到：是总理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

总理病逝两年半之后，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为舍予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大姐到得特别早，她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假如恩来还活着，他今天会第一个来！”

邓大姐说：总理生前经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她还说：她今天也是故意提前来的，为的是也代表恩来出席老舍的追悼会。是替他来行礼的。

她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孩子说，“你们的妈妈很了不起，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你们要好好照料她，并且要向她学习！”舍予去世之后，我没有痛痛快快地哭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听了邓大姐夸奖我的话，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劈嗒吧嗒地往下掉。一点……一点也不坚强。

在总理去世之前，在北海湖畔，总理已经郑重地祭奠过舍予那也是一个8月24日，总理重病，在北海里养病，医护人员陪同他在湖边散步。他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突然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方紧张地思索，不得要领，回答说不知道。“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后，总理又问：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对方回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细……”

“我知道！”总理口气很坚定地说。“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也许，这些话在他心中憋得太久太久，已经到了不吐不成的地步。

也许，他是见景生情，看见了湖水，想和他死去的老友做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也许，他想起了武汉，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第一次文代会，想起了《龙须沟》，想起了《茶馆》，想起了费力不讨好的《春华秋实》，而这一切，都白费了，多么令人沮丧。

也许，他想起了他对胡絮青的批评，那时是唯恐照顾不周，命运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像八级风一样，把他心爱的一切和精心扶植的一切一扫而光，刮得无影无踪，极其残酷，而且极其难堪。也许他为舍予感到惋惜，他知道舍予还能写，还有《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还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还有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

也许，也许……

这一切也许都凝聚在北海的湖面上。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面对这么多遗憾，他的悲哀是不言而喻了。

他便死在这遗憾里了。

不过，这遗憾，这悲哀，使我更加看清了一个绝对完美的人。我想说，这湖畔的独白式的解说纯粹是周恩来式的。它不仅为巨人的风格描绘了最后的一笔，而且也为周恩来——老舍的友谊写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胡絮青）

周恩来与袁雪芬

袁雪芬（1922~）越剧表演艺术家。1936年在上海灌制了我国越剧第一张唱片《方玉娘哭塔》。1946年参与创建雪声剧团。演出过《祥林嫂》、《山河恋》、《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艺术片。建国后，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越剧院院长。

——编者

1978年，第三世界某国一位党的领导人到上海访问，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艺术家的经验。当时的上海越剧院院长，中共党员袁雪芬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介绍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位旧艺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如何在党的帮助、关怀和支持下，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听完袁雪芬的介绍，那位外国友人感动了，他热情地说：“我想了解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答案。我形象地理解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恩来的领导方法。”

“我早就认识你……”

1946年，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曾四次来上海。

9月16日，他又来到上海，听许广平和地下党的同志讲到，袁雪芬和她的“雪声剧团”在蒋管区改编演出了鲁迅的《祥林嫂》，并因此受到迫害。周恩来对此很关切，决定亲自去看看雪声剧团的演出。民主人士史良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去剧场。但第二天晚上，他还是在齐燕铭同志陪同下去了。

那天，周恩来同志乘黑色的“纳喜牌”小轿车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下车，然后徒步走过狭窄的碎石子路的小弄堂，绕过日本人留下的碉堡和铁丝网，来到青岛路的明星大戏院。戏已开演，他们只好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这场戏是袁雪芬主演的历史剧《凄凉辽宫月》，它是描写辽国懿德皇后命运，富有反封建精神的悲剧。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接触越剧。这个地方剧种艺术上的进步，“雪声剧团”严谨认真的演出作风，观众是这么多，情绪又那么热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周恩来看戏的事，袁雪芬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第二天的《联合晚报》上看到一条“中共代表团看越剧”的简短消息。三年之后，她作为出席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去北京，在中南海紫光阁受接见时，周恩来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我早就认识你……”袁雪芬这时才知道，当年看越剧的中共代表就是敬爱的周恩来。

那次看完戏后，周恩来专门把于伶（地下党上海工委文化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约到住所，亲切地谈起雪声剧团，他说：

“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剧团。剧团中很多都是穷苦出身，她们中间很多人有了觉悟，认识到被侮辱、被剥削的地位，追求进步，靠拢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戏剧工作者。”

周恩来指示说：

“你们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人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这件事，如果我们党不去关心，就会被敌人利用。”

在这之前，袁雪芬已经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象田汉、于伶，胡

风、洪深、史东山、张骏祥、欧阳山尊、李健吾、许广平、田钟洛（即作家袁鹰）、姜椿芳、梅朵……这些人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地下党更重视做袁雪芬和其他越剧演员的工作，陆续派了党的外围组织的吴琛、钱英郁等到越剧界，后来又派同志直接到雪声剧团担任导演并主持剧务部工作。

“做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为了使演员的思想跟上时代，7月22日到9月6日，华东军管会文艺处举办第一届地方戏曲研究班，袁雪芬和越剧界的主要演员都参加了。这次学习，为袁雪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年9月，袁雪芬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全国戏曲界仅有四名特邀代表：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27岁的袁雪芬是其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

在北京，袁雪芬曾多次到周恩来家作客。有一次，周恩来设便宴欢迎郭兰英、李波从国外得奖回来，袁雪芬也应邀参加了。饭后，毛泽东带着小女儿来了，于是乐队奏起音乐，陈毅过来邀请袁雪芬跳舞。但她尽管在上海生活多年，却从未参加过舞会，更不会跳舞。

“我来教你好吗？”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

袁雪芬又高兴，又紧张。跳舞时她两眼看着天花板，脚不知往哪儿摆。

“你们越剧是怎么改的？演过些什么戏？你演过《西厢》中的张生？”毛泽东边教她跳边问。

“噢，您怎么知道得这么细？”

“主席看过你们的《雪声纪念刊》，”一边的周恩来微笑着解释。

眼前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么平易近人啊！袁雪芬激动地想。

不久，袁雪芬就要离开北京了，她想起参加研究班学习的日日夜夜，想到北京开会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的关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尤其是周恩来，他在自己面前，丝毫不以领导者自居，既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又像一个知心的朋友。有一次，周恩来对袁雪芬说：

“年轻人，我们交个朋友吧！以后常给我写写信，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写。”

“我的字写得不好，能不能请人代我写。”

“我不是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你自己写的才有真情实感。我知道，你们过去是苦孩子，不要担心字写不好。”

周恩来这种平等、真诚的谈话和接触，教育着袁雪芬。这种教育，既是言教，又是身教，它像涓涓细流渗透进袁雪芬的心田，化成了她的血液。从周恩来身上，她看到共产党的光辉榜样，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要求。离开北京前，袁雪芬鼓足勇气对周恩来、邓颖超同志说：

“我要参加共产党！”

“很好！”周恩来支持她的要求，但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你有这要求，可以回去向当地组织提出。”

周恩来的话，言简意赅，实际上等于给袁雪芬上了第一次党课。

回到上海，她立即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但考虑到袁雪芬还不够成熟，对党的基础知识还不够了解，组织上给了她一份共青团的表。1950年2月，上海越剧界建立起青年团组织，袁雪芬和另外34位同志第一批加入了中国新民

主义青年团。

“我们的‘两台’在那里很受称赞”

1950年10月30日，袁雪芬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到波兰的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个出国大团，规模很大，有郭沫若、康克清、李德全、廖承志，马寅初、章伯钧、蔡廷锴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对袁雪芬来说，这是党给她的又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她获得了丰富的政治营养，打开了政治生活的视野。

在华沙的会议期间，袁雪芬听了各国代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发言，又在波兰进行了参观。“和大”结束后，她又作为列席代表到维也纳参加世界青联理事会，内容也是反对侵略、保卫和平。

在这两次世界性的会议中，袁雪芬亲眼看到了世界人民支持正义，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也亲身体会到解放了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她所在的中国代表团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各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和尊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做一个中国人是自豪的。她心中明白，能有今天，能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不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成果吗？

世界青联理事会开完，组织上又安排袁雪芬参加中国青年访苏团。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她们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看到了苏联人民在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的成果。尤其令袁雪芬激动的是苏联艺术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忠实于自己的事业，遵循斯大林的“演员不能在舞台上欺骗观众”的指示，每出戏的演出，都重视对人民有教育意义。许多著名的演员既是演员也是导演，既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导师又是马列学院的学生，他们热情主动地追求真理，认真严肃地钻研艺术。

出国三个月，袁雪芬像一块海绵，无时无刻不在吸收着新的知识、新的教益。国外的见闻，代表团内同其他同志的接触，使她变得成熟了。

回国后，袁雪芬投入了新的艺术创造，并先后担任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越剧实验学校校长，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团长、上海越剧院院长。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和越剧界姐妹们发起联合义演，捐献了一架“越剧号”战斗机。

1952年10月，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袁雪芬赶排了一出《白蛇传》作为展览剧目。她演的白素贞，强调了人物勇敢、坚强、疾恶如仇的叛逆性格和善良、温柔、忠于爱情的女性特点。全剧以浓郁的抒情色彩取胜，虽没有参加评奖，但被选定为毛泽东招待国宾——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的剧目。

在会演中，为了表彰袁雪芬对越剧改革的贡献，她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常香玉、王瑶卿七位戏曲表演大师被授予“荣誉奖”。

1952年年底，袁雪芬和范瑞娟还花了11个月，克服了种种困难，拍摄成功了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是毛泽东直接批准、陈毅市长直接支持的。在国内上映时，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卖座也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曾把《梁祝》带了去。结果，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外国记者盛赞它情节美、人物美、表演美、音乐美、画面美，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片使他们了解到新中国对民间艺术的重视，了解对中国戏曲的高度水平。从日内瓦回来后，周恩来见到袁雪芬，高兴地握着她的手说：

“雪芬啊，向你恭喜啊！你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的‘两台’（指影片《梁祝》和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

“她是不会辱没我们党的！”

不懈的努力，执著的追求，终于使美好的愿望得以实现。1954年4月12日，袁雪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著名演员中，她是第一个被批准入党的。这一年，袁雪芬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对袁雪芬的入党问题一直很关心，在长期的接触中，他了解这位年轻演员的为人、品格、思想和追求目标。在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还掌握得很严的情况下，周总理说：

“袁雪芬同志解放前后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发展她是不会辱没我们党的！”

袁雪芬本人更把入党看成一件严肃的事情。她曾说，我这个人，一方面非常不幸，在旧社会受过很多打击、迫害、痛苦，另一方面又非常幸运：解放前，曾接触到一大批处于地下的党员，尽管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他们给了我启发、教育、引导和支持，成为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解放后，党给我创造了许多条件，使我吸收到丰富的政治营养，参加政协，出国开会，都是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

在袁雪芬入党时，一位领导同志对她说：

“对你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已很郑重地讨论过。你是个名演员，如果表现好，会对党有好的影响；表现不好，也会给党带来更大的不好影响。”

袁雪芬把这句话记在日记本上，并铭刻在心中。她决心不辜负党的教育和期望。

入党后，袁雪芬越发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地记着：“我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才是个演员！”在周恩来的关怀、影响下，她以后的前进道路上，虽然仍有曲折坎坷，尤其是“十年动乱”，但她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信念执著地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艺术家之心永远没变！

正如1978年袁雪芬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时，所写的一首诗：

先辈流尽革命血，滴滴倾注后辈心。
纵使白头头更白，为党永作讴歌人。

（杨光）

周恩来与舒绣文

舒绣文（1915—1969年），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1932年开始话剧、电影演员生涯。抗战爆发后在重庆参加中华剧艺社，名列“话剧四大名旦”之中。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参加昆仑影业公司。建国后曾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57年调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演员，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剧协、中国影协常务理事。饰演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王丽珍、话剧《骆驼祥子》中虎妞等角色，颇受赞誉。

——编者

1962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上演梅阡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舒绣文饰女主角虎妞。舞台上剧情发展到样子拉车得病，无法生活下去，不得已把车子押给了放印子钱的孙三，虎妞生孩子得了产后热绝症，孙三强迫祥子把车卖给他，两人发生冲突。虎妞带病出来帮助祥子，被孙三连打带推，倒在地上。祥子惊骇地扑向倒地的妻子。紫红的大幕徐徐拉上了，象一面厚重的墙。剧场内的空气仿佛在这瞬间凝冻了，寂静得使人心发颤，猛然间又沸腾起来，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伴之兴奋的议论。

“舒绣文，真是参不透呀！可人！可人哪！演什么就是什么！真是绝唱！”
“演活了，虎妞让她演活了！只有她创造的人物，才有如此的魅力！”
“真让人说不清，是她在创造虎妞，还是虎妞的魂魄附在了她的身上！”
“她演得好，这个人物的两面刻画得清清楚楚，暖，她就是这么个人！”
“……”

这是几位学者和艺术家之间的对话。

可是，舒绣文倒下后，就没有爬起来，观众春雷般的掌声滚过长空，未能唤醒她；救护车撕人心肺的凄厉叫声惊碎了冬夜的宁静，也未能惊醒她，她象玩累了，疲惫已极睡死过去的孩子。

她被送进了阜外心脏专科医院的急救部。细细的银针扎进了她深深的穴位，她没有痛感，药液输进了她的静脉，她没有知觉；强心针打下去，她的眼皮颤了下。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声极其微弱的呻吟，发自她的胸廓之中，纤若游丝。她的嘴唇颤了颤，开始有了种模糊的感觉，她以为自己是被压在山下，正经受着可怕的挤压，憋闷得吐不出气来。她想活动下四肢，也动弹不得；想抬抬眼皮，眼皮沉重得像山石。好久好久之后，她才感到压在身上的山在缓缓向上移动，她听到了骤雨般的鼓声。

“唉——！”

她终于深深地吐了口气，眨了眨眼皮。

“醒了！醒了！”围在她身边的医生护士们惊喜地叫了起来。

当她刚刚送进急救室，医院领导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求全力救活她。院领导亲自参加抢救，一直守在她身边。此刻，他们紧张的心弦也随之松弛了一些。她活过来了。

第二天上午，她从急诊部移到住院部的单间病房。医院请来了全国最著名的几位心脏专家给她会诊，制订了治疗方案，要她配合治疗，说这是周总理的嘱咐。她患风湿性心脏病十几年，这是第一次住院治疗，总理这么关怀她，她决心“既来之，则安之”。

这是第五天下午，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医院院长和她的主治大夫

陪着一位中年女子走进了她的病房，拎着一只大提包的护士跟在他们身后。院长每天来探视她，他们已熟了，他给她介绍着那位陌生的女士说：“这是张元同志，她受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托，来看望你。”

绣文想坐起来，张元不让，“躺着躺着，快别起来！”

她只好又躺下去，握住张元伸给她的手说：“谢谢，请坐！”

张元没有落座，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她：“这是邓大姐写给你的亲笔信。”

绣文立刻抽出信笺，轻声地读起来：

“亲爱的舒绣文同志。

我是多么想念你啊，我和周恩来同志几次起心要去看你，可是因为忙，都未能如愿。

今特托张元同志来看你，愿你早日痊愈。紧握你的手。

邓颖超 12月12日”

绣文在生活中是个倔强的人，很少落泪。可这封信让她鼻酸了，眼睛热了潮了。

她和周恩来夫妇的初识是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她刚刚主演了《保卫我们的土地》。这是第一部正面宣传抗战的电影，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展的扩大宣传周的电影日那天，武汉5家电影院全部上映《保卫我们的土地》和纪录片《抗战特辑》，还组织流动放映队，把抗战电影送到附近乡村去放映。那天，她受田汉之嘱到电影院门口去会见观众。

她往那家电影院门口一站，那里就涌来潮水般的人群。林立的手，扬起向她致敬，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属于我们！”无数只手举着雨伞、帽子、手帕、书本、手册……要她签名留言。有的拿不出物件，就伸出衣袖，请她写在衣袖上。她应接不暇，又忐忑不安，自己只不过演了个坚决抗战的农妇，就受到如此厚爱和尊崇，比起那些为国捐躯和为国失去手脚的将士。她算个什么？她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她的眼前又飘动着那位无名战士的遗书，她越发不安了。她应尽力满足观众的要求，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舒小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她。

她停住挥舞的笔，抬起头。

田汉就站在她前面的人围后。他的身边站着位气宇轩昂、气度不凡，浓眉大眼的中年先生。这面孔陌生又熟悉，好象在哪见过。突然，她忆起一个新闻纪录片《庐山谈判》。她感到一阵惊喜，连忙拨开人群，向那位先生走过去，伸出双手说：“您是周恩来先生吧？”

“是的，是的，一点不错！”周恩来热情地握紧她的手，“舒绣文同志，你的农妇演得很真实，感情真挚，我们都很喜欢，我特地来向你表示祝贺！希望你拍出更多更好的抗战电影！”她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只紧紧握着他的手，感情象缄默的火山突然爆发一般，她突然大声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周恩来加入进来，田汉加入进来，围观的群众加入进来，影院门前响起了雄壮的大合唱。

他们分手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抓住他的手不放说：“周先生，你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认识一位叫舒子胄的先生吗？”“记得记得，他

教过我国文和历史，他的课教得很好！我很喜欢听他的课。”

“他是我父亲！”

“是令尊！太好了！他好吗？来武汉了？”

“没有，他们还在上海。”她的心头倏然浮上一片暗淡的云翳，“他病了，要我把妹妹送回去照顾他们，我答应给‘中旅’到香港演两个戏，他们负责买票送我妹妹回上海。”

他点点头说：“有空到八路军办事处来玩！”

“好！”她扬起手，“我一定去看望你！”

去香港的前一天，她携着妹妹去向他们告别，周恩来夫妇热情接待了她们。周恩来还鼓励她说：“到香港去宣传抗日，也是有意义的嘛！”临走时，把她们送到大门外，“去吧！我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赶走鬼子！”

邓大姐抚着她妹妹的头发说：“路上要小心，上海已成为孤岛，好好照看你父母吧！”她向她们挥挥手，“绣文同志，快去快回！”

在重庆的时候，她经常公开地探望他们。但有几次使她至今记忆犹新。从塞北外景地回来后，厂里到处风传着她带头要留在延安的事，引起特务厂长的仇恨，她的行动也在暗中被盯梢，那天，她刚出门，就发现有人跟在后面，这使她很气愤。

突然她转过身，迎上盯梢的人，指着他的鼻子斥责着：“你像条狗样跟着我，不就是想知道我去哪里吗，我去告诉你的主子，我是上八路军办事处，去看望周恩来先生和邓颖超女士。我去那里是我的自由，你们管不着！”

那个特务是厂里的一个熟人，被她申斥得面红耳赤，像挨打的狗，悻悻地夹着尾巴退回去了。

她一见到周先生和邓大姐，就将她如何赶走跟踪特务的事竹筒倒豆子般哗啦啦倒了出来，“对这种人，就只能这样！”

周先生仰脖哈哈大笑，说：“舒绣文同志，难怪你的朋友们叫你一丈青，果然女中豪杰！”他请她坐下，“可是，为了抗战大业，有时可不能只图一时痛快，还得策略一点哟！”

邓大姐拉住她的手，关切地说：“也要防备狗急跳墙，特务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这才想起来找他们的目的，“周先生，”她神情突然严肃起来，“这次拍《塞上风云》去塞北拍外景，我有幸来回途中经过延安，在短短的半个月中，我看到了与重庆迥然不同的一个中国。我是很想留在那里的，但你担心为此引起分裂，对团结抗战不利。我不愿作对抗战不利的事，只得依依惜别回来了。但延安给我的激励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她把邓大姐的手攥得更紧了，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周先生，我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您看行吗？”

“绣文同志，”他高兴地回答着她，“你要求加入我们党，我很高兴。我早就从田汉同志和阳翰笙同志口中了解了你，你追求进步，很早就加入了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文艺组织，从事进步戏剧活动。我们党欢迎你这样的同志。”他说到这儿，起身给她倒来一杯开水，“可是，你是很有影响的大明星，你暂时留在党外比在党内更能发挥作用！”

“这……？”

“你听我说，绣文同志，你的社会关系广泛，接触面广，这样更便于你为我党联系团结更多的倾向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有利于我党团结抗战方针的

实现。”

“这也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也是我们的希望。”邓大姐握住她另一只手，接着开导她，“我们理解你的心情。看一个同志，不在于他入党的早晚，而是他对党对国家的贡献。”

“啊，是这样！”她又快活起来，“我懂了！”

“我不能再在这儿干下去，您送我去延安吧。”她向周恩来汇报了拒演《蓝蝴蝶》的情况后，提出去延安的要求。

周恩来劝导她：“你是观众喜欢的演员，在观众中有很大影响，留在这里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她低头不语，好半天才怅怅地说：“就是留在山城，我也不能继续在‘中制’待下去了，那里已不像个文艺单位，警备森严，倒像座监狱，我宁可去死，也不愿演《蓝蝴蝶》那样的戏！”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她，他似在思索。

她期待地望着他。

他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说：“你们演出的《棠棣之花》，我至今记忆犹新，在那种白色恐怖气氛下，你们毫不畏惧！”

啊，《棠棣之花》！她的思绪立时飞回皖南事变后那段恐怖岁月。进步话剧被挤压得几近窒息，是他，周恩来领导重庆文艺界一马当先，在文化战线上向顽固派冲杀过去，冲破了这种窒息。他授意阳翰笙先生，组织私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以戏剧的形式继续唤醒人民的觉醒，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阳翰笙委托具有卓越组织才华又有很高艺术修养的应云卫筹建了中华剧艺社，不满“中制”的演员纷纷参加进去，被称作山城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都在里面。她在那里演过许多戏，《天国春秋》、《虎符》、《雾重庆》、《两面人》、《大雷雨》……话剧《棠棣之花》是这场斗争中燃起的第一支火把。那是1941年11月间，以纪念郭沫若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和他五十寿辰为名而演出的。导演石凌鹤选中她扮演女主角聂莹，张瑞芳扮演酒家女春姑。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演出。

聂莹是个叛逆的女性，她的戏并不都处在明显的戏剧冲突中，很难塑造。舒绣文调动平时的一切积累，全力以赴。

周恩来十分关心这出戏的演出，多次爬坡上坎到“抗建堂”（今红旗剧场）看排练、看戏。他还组织评论，在《新华日报》上出版演出特刊，并亲自为刊头题字。

《棠棣之花》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周恩来夫妇看过演出的第二天，就请她去吃午饭，大大地称赞她演的聂莹，“你演出了她对弟弟聂政的姐弟深情，又演出了她那种抗敌锄奸的浩然正气，你把这两层感情处理得恰到好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幕，聂莹抚着弟尸痛哭的场景。你演得悲痛而自持，演出了聂莹刚烈的个性。”

“你们快别夸我了！我觉得遗憾还很多呢！”听到赞扬，她这豁达的人脸也红了。

邓大姐接上说：“不是夸你，说的是实话，你的确演什么像什么！”

她吃得很慢，而且只吃了一小碗，就放下碗筷。这引起邓大姐的关注：“你怎么吃得这样少？”

“我没胃口。”

邓大姐关切地问：“是感冒了吗？”

她摆了下头：“没有，这是鼻炎引起的！”她微微一笑，“我很小就患了鼻炎，常常发作，发作起来头痛欲裂，非常痛苦。医生要我手术治疗，我害怕手术会影响声带，要那样，我可完了，演不成戏了。”

“绣文，你真坚强！”邓大姐动情地把手放到她的手上拍抚了一下，“还得要治呀！”

“绣文同志，我给你介绍位老中医。”周恩来停住筷子，“这位老先生对一些疑难病症很有办法。”

“好呀！”她高兴地望着他，“谁呀？”

周恩来放下碗筷，从中山装口袋里取出钢笔，又从袋里掏出记事册，给老医生写了张条子，递给她，“他知道你是大名鼎鼎的舒绣文，会给你认真医治的。”

人世间的许多事，有时很难解释清楚。她的鼻炎看过很多医生，也吃过很多药，收效甚微，而这位老医生只开给她几分钱的草药，却立竿见影了。

在她的影集里，有张八寸大的照片，放在醒目的位置。画面上，周总理双手紧握着她的右手，邓大姐双手紧握着她的左手。

这张照片拍于1957年国庆前夕。周恩来夫妇到首都剧场观看《骆驼祥子》。演出结束，他们在掌声中走上舞台，会见演员，他们俩紧紧握着她的手，摄影师抢下这个镜头。周恩来是那么高兴，把她的手握得那样紧，说的话是那样激励人心：“舒绣文同志，你们的戏演得很好嘛！剧本改得好，演员演得好。我看你们可以多将一些小说改成话剧，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嘛！”

同志们听了一齐鼓起掌来。

周恩来夫妇接着来到后台，与每个工作人员会面，祝贺演出成功。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大家有说有笑，像一家人一样。

几天以后，邓大姐打电话来：“绣文同志，有张照片拍得很好，我派人给你送来，作个纪念吧！”

“大姐，什么照片？”她兴奋地问。

“就是我和恩来同你握手的照片啊。”

“谢谢，我等着。”

照片果然拍得很好，周恩来一派儒将风度，英俊潇洒；邓大姐满脸欢笑，真诚笃厚。舒绣文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他们可谓老朋友了，在陪都重庆，她的戏，周恩来夫妇总是必看的。共同的国家民族命运，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建国后，她的心脏病日渐严重，已不适宜繁重的电影工作，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有关方面说：“舒绣文同志是个难得的戏剧人才，不能拍电影，还能演戏嘛！”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她回归了话剧舞台。她调北京人艺后，深知周恩来日理万机，不敢贸然去看望他们，可他们哪怕再忙，她每上一个戏，他们还是必看的。他们还几次上舒绣文家探望她。

1959年春节，那是特大自然灾害的饥荒年月，人艺没有演出任务。她和儿子兆元的年夜饭也很简单，白面包饺子。饭后，兆元缠着她讲故事。

他们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她给他讲孩提时的故事。突然，门上响起轻轻的叩击声，伴之传进欧阳山尊的呼喊：“绣文！快开门，来贵客了！”

兆元抢在她前头拉开了门。

她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迟疑着，不敢叫出来，唯恐认错了人。

“舒绣文同志，你好！”

“总理！”她这才喊出了声，没错，是周恩来的声音，“快请进！”她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紧紧握住周恩来伸给她的手，把周恩来和山尊迎进客厅。突然，她像从梦中醒来一般，总理来与民同乐，应该尽快告诉同志们。她返身跑到门外，朝着楼上楼下大声呼喊：“杨薇——！江雪——！……你们快来呀，总理来和我们一道过年来啦！”

顷间，楼上楼下沸腾起来。“砰砰”的关开门声，“嗵嗵”的脚步声，呼朋唤友声，家属和孩子们激动的奔跑声和欢笑声交织起一片欢腾，呼啦啦一齐拥进她的客厅。

周恩来站起来，跟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摸摸这个孩子的脸，拍拍那个小子的肩，孩子们欢蹦着偎依在总理的怀里。绣文忙着搬凳让坐，沏茶，大家围着一只小圆桌，边喝茶边聊天。周恩来问她：“你的心脏好些了吗？”

她回答说：“好多了。”

周恩来又说：“心脏病不同于头痛脑热的伤风感冒，不能掉以轻心罗！”

“我在吃中药，我已深刻体会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会重视的，请您放心。”

“这就好。”总理点点头，又问：“北京的生活习惯了吗？”他仰头看看客厅。

她笑起来说：“您忘了吧，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呀！”“哈哈……”周恩来朗声地笑了起来，“噢！对对，我记起来了，在重庆时你说过。”他呷了口茶，站起来，“绣文同志，参观参观你的家好吗？”

大家一齐跟着也站起来。

“欢迎呀！”她连忙让到边上，“请吧！”

“先看看你的厨房。”

山尊连忙走在头里，“请往这走。”

她紧跟在他们后面。

周恩来在她的厨房中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又拉开碗橱，见里面只有几只饺子，没有剩余的菜，厨房里冷冰冰，就问她：“绣文同志，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没有，我生活得很好。”

“欧阳山尊同志，你可得多多关心绣文啊！她心脏有病，不能让她劳累过度。”

山尊说：“她工作起来就和玩命一样，不听劝呢！”

“总理，剧院的同志们对我都非常好，很照顾我，象一家人样。而且，我还享受特需供应，比大家都过得好。”

周恩来点点头。

他们又回到客厅，复又坐下喝茶，谈新的一年的打算，谈戏，谈剧目，也谈吃不饱肚子。

周恩来鼓励大家说：“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战胜饥荒。我们要演好戏，立志做人民爱戴的艺术家！”

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无所不说，直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周恩来。

这是个多么值得记忆多么快乐的除夕之夜啊！

还是这一年，《伊索》演出不久，舒绣文的心脏病复发了。一个周末的

晚上，周恩来得悉她病了，到宿舍来看她。

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她的病榻前，她惊喜交加，想坐起来。周恩来见她太激动，一手按住她说：“你别动！”一手拉把椅子坐在她床前。为让她过于兴奋的情绪平静下来，他没有先问她的病况，而是和她的朋友们拉起了家常，他问他们：“你们谁会做菜？会做什么菜？”

杨薇说：“我会煮大白菜，红烧肉。”

吕恩说：“我会炒肉片，炒肉丝，还会做涮羊肉。”

“我会做淮扬名菜红烧狮子头。”周恩来看看着他们说，“你们想学不想学？”

“我不相信，您那么忙，还会有时间做菜！”吕恩故意这么说，“您说说看，怎么个做法？”

“哈哈……”周恩来朗声地笑了起来，“不相信？我教给你们吧！瘦肉7两，肥肉3两，剁成肉泥，再加鸡蛋一只，姜末、葱花、精盐、食糖适量，外加味精少许，淀粉一匙，搅拌均匀。锅里放猪油，烧至微温，再将调好的肉泥作成鸡蛋样大小的圆球，下油锅炸至淡黄，再放少许酱油、汤料，文火燉酥，起锅时放点菠菜。你们回家试试。”“哈哈……”大家都快活地笑了起来。

室内空气渐渐变得轻松愉快了。舒绣文激动的心情随着笑声平和下来。这时，周恩来才开始探问她的病情：“绣文同志，可好了一点？”

“我这是老毛病，时好时坏，严重时，气短得不能平卧，一连几天坐着过夜。这次发病也挺厉害，好几天只能伏在桌上休息，经治疗，好多了，现在已能躺下了。”

周恩来又问她看了哪些医生，吃了哪些药，如何治疗的。她回答过周恩来的询问后，又说：“我已摸到一点治疗规律，我练气功，也扎针灸，吃中药，也吃西药，多种方法结合治疗，效果比较好。”

总理微微点了下头，说：“你的性子急，对待慢性病可急不得的呀！”

她连连点头说：“我已被病魔磨得挺有耐性的了，一连服了两百多剂中药。开始一见到那稠糊糊的黑水，心里就反恶，现在，我不怕了，还准备坚持吃下去。”

总理满意地点了下头，移开话题，问她的同事们：“你们是什么时候参加话剧工作的？”

杨薇说：“我是三十年代中期。”

吕恩说：“我是抗日战争时期。”

刘华说：“我是解放初期。”

总理转向舒绣文说：“你比她们都早，你们这里是三代了，还有新一代吗？”

“1958年剧院招了一批学员，现在都在舞台上演出了。”吕恩回答着。

“这样好啊！”周恩来很高兴，“绣文和你们这些老的一代要培养他们，要关心青年演员的成长，这样戏剧事业就会随着经济的繁荣大踏步发展。”

“我第一次演《天国春秋》中的洪宣娇，就是接替舒大姐的。那时我刚刚到中华剧艺社学演戏，是在舒大姐的鼓励 and 帮助下完成的。”吕恩感激地看了舒绣文一眼，又对周恩来说，“总理，舒大姐不仅到戏剧学院去给学生上台词课，而且病了不能去时，就把学生们叫到家里来教，不久前还收了几个学生在个别教呢！”

“大姐对青年演员非常关心。”杨薇接着说，“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无论谈角色，还是读台词，都热心地给予指导和帮助。”

“你们给我评功摆好呀！”舒绣文喘着粗气笑了起来。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微笑着一再嘱咐她：“绣文同志，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可别着急呀，要安心养病，保存好力量，才能迎接新的更大跃进呢！”周恩来又对吕恩等人说：“你们要多多关心绣文同志的健康啊！不要让她太累了。要帮助她安排好生活，照顾好她。”

吕恩马上对绣文说：“大姐，你听到了吧？这是总理说的呀！到时候要听话点！”

“对！这是总理招呼的！”杨薇等也接上重复着。

周恩来临行前又叮咛她的同事们：“绣文是你们的前辈，也是国家的财富，要注意她的劳逸结合。明天再给她送些药品和必需的营养品来。”

第二天下午，张元带着邓大姐写给舒绣文的信以及一些药品和营养品来到了病房。

舒绣文捧着邓大姐的短筒，眼前又浮现出大姐亲切的笑容，和大姐快乐的会见，仿佛就在昨天，她的手心还留有她手心的余温，耳畔还响着她那些慰心的话语，激动的泪水憎然而下，她放声哭了起来。

“舒大姐，你不能激动！”主治大夫慌忙走到她身边，抓起她的手切脉，“你的脉搏又快了！”

绣文控制不住感情，泪水果涌，她和着泪连声说：“没事的，没事的，就会平静下来的。”

张元唯恐影响绣文的休息，只坐了一小会儿，就拎起那只提包，把带来的药品和营养品一样样拿出来，放到桌子上。她把两盒包了又包的药拿到绣文面前，让她看，并介绍说：“这是外国友人送给总理的盘尼西林，总理说，现在困难时期，药品紧张，说你更需要，邓大姐让我带来了。”

舒绣文的泪水又涌了下来。

张元又拿出一袋鸡蛋，一包黄豆和两袋奶粉。

舒绣文已泣不成声了，抽泣着说：“请代我谢谢总理和邓大姐！”

在这特殊的年月里，它们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是一个大国总理对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一缕关心！她感到心里暖暖的，热热的，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战胜疾病，重新回到舞台。

舒绣文在阜外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护下，和病魔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较量，取得了一些疗效，但她那因风湿侵害已久又劳累过度的心脏早已发生了器质性的损坏，不是医药，也不是她那坚韧的意志，顽强的耐力所能彻底战胜的。她为之痛苦万分，她不甘被疾病击败，不甘就这么长期躺在病床上，只向人民索取而不奉献。在她一再要求下，医院同意她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为中央电台播讲了长篇小说《苦菜花》、《迎春花》。工作给了她力量，她拼力和病魔抗争！她盼望有一天还能重新回到舞台，她的生命只有在舞台上才能显示出光辉。1965年，周恩来为了帮助她实现重上舞台的愿望，指示人艺领导和医院，送她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心脏手术。手术成功了，她怀着新生的激情回到北京。她一到家，就给邓大姐打电话：“我手术成功了，回来了！”

“啊，真让人高兴，绣文同志！”邓大姐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变了调，“祝贺你！”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和邓大姐一道来看舒绣文。舒绣文握住他们的双手热泪奔涌：“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总理！谢谢大姐！”

“绣文同志，”周恩来从身后变戏法似地拿出一个玲珑可爱的洋娃娃，在她面前晃了晃，“这是大姐和我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

她将洋娃娃捧在掌心里，连声说：“喜欢，喜欢，这礼物非常可爱，太珍贵了！泪水又控制不住地往下奔流，竟忘了请他们入座。

邓大姐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挽住她的手说：“谈谈手术情况吧！”

她这才把他们请到小沙发上坐下，沏上两杯茶汇报了手术情况，说完她就站起来，像个天真的孩子在兄嫂面前一般，转了个圈说：“我完全好了，我急切地盼望着重上舞台！”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说：“你刚刚进行过胸科大手术，还需要疗养一个较长时间，不要急着工作。”

邓大姐帮着说：“以后工作时间有的是，切不可大意失荆州啊！”

可是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了。舒绣文被当作文艺黑帮揪了出来，她一直珍藏着周恩来夫妇送给她的照片和亲笔信。

（石楠）

周恩来与王家乙

王家乙（1919—），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协会组织的救亡演剧队，1940年底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演员。建国后主演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导演过《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小字辈》等。《五朵金花》获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最佳导演银鹰奖，曾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常务理事等职。

——编者

1976年1月8日，万民敬仰的周恩来与世长辞了。神州大地，万庶衔哀，泪雨洒遍大江南北。这时，一条不成文的禁令传到了全国成千上万个机关厂矿：不准搞悼念活动。经历了电影《创业》上演风波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演员们，深知这条禁令来自何处。他们按捺不住胸中的悲痛和愤怒，在长影大剧场设置灵堂，举行公开的悼念活动。白发苍苍的著名电影导演王家乙和十几名老同志率先走进灵堂，默默地守护在周恩来的灵台旁。灵堂内哀乐低回，热泪象止不住的泉水从王家乙的眼眶里涌出来，他掏出手帕擦擦泪水模糊的两眼，仔细地端详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周恩来还是那样笑微微地，满面春风。王家乙看着看着，仿佛周恩来就在眼前。蓦地，王家乙的眼前又闪现出三十几年前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那还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1938年春，年仅十九岁的王家乙跟随救亡演剧队从沦陷区上海来到了武汉。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沦陷区人民苦难的青年学生们，坚决要求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战争。一天，上海救亡演剧队与平津流亡宣传团的学生们，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

“各位青年同志……”

随着这声音宏亮有力的话语，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接着说：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热血青年，延安需要你们，但国统区和沦陷区更需要你们。我们要成立一些抗日救亡团体，希望你们在其中担负起发动全国民众参加抗日的光荣任务！”

王家乙从周恩来身上第一次领略了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风度和凛凛气魄。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念。不久，王家乙到了抗敌演剧队。这样，同周恩来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每次见面，周恩来总是热情地拉着他的手，亲切地叫他：“家乙。”

时至皖南事变的前夕，王家乙与许多文化界人士一道，来到了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国民党当局见左翼知识分子云集学校，十分恼火，许多人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正在大家忧虑不安的时候，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赶到学校。他风趣地说：

“你们都是‘榜’上有名的人，要赶紧撤退。”

“撤退？”王家乙迷惑不解地看着周恩来。

“党准备安排你们‘回家’。”

周恩来象是看出了王家乙的心思，笑微微地对他说。啊，是去延安吗！王家乙高兴得跳了起来。不几天，国民党特务发现王家乙等人的动向。周恩来闻讯，立即指示有关人员，火速将王家乙这批人转移到了重庆市内，一个

月后，王家乙终于转道西安去了革命圣地延安。

三十几年了，这一切对王家乙来说却恍如昨日，在心头，在眼前，魂牵梦绕，终生难忘……

灵堂内，呜咽声响成了一片。这时，一家大的新闻单位派来了摄影记者，镁光灯频频闪烁，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王家乙更清楚这一切将意味着什么。然而，王家乙与电影《创业》的编剧、导演、演员一道，把这一切置之度外。

啊，几十年来，在知识分子倍受凌辱的岁月，周恩来温暖了多少颗寂寞孤独的心啊。王家乙的思绪又回到了六十年代……

60年代初期周恩来碰到了王家乙。两人见面，周恩来劈头就说：“我和邓书记（邓小平）看了《达吉和她的父亲》，觉得很别扭，让人很感动，但又使人哭不出来。”说着，周恩来又指着王家乙说：

“你这个人啊……”

“是我没有拍好，无产阶级感情不深厚。”

周恩来听了王家乙的回答敛住了笑容，神情异常严肃地说：

“算了吧，当时全国都批巴人的人性论，你敢表现感情吗？”

周恩来一语道破王家乙埋在心底的苦衷，使我不禁愕然。1957年反右运动时，著名文艺家巴人因写《文艺学论稿》一书，被指控宣扬抽象人性论而惨遭凌辱，数年后惨死乡间。当时王家乙因在法国拍电影，而有幸没被戴右派之冠。谁知好景不长，1958年党内整风时，王家乙就被作为漏网右派留党察看两年。在这两年里，他忍辱负重，努力拍出了《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两部影片，在中外都引起了较好的反响。然而，由于背着思想重负，王家乙在对人物进行艺术处理时不免缩手缩脚，怕犯禁忌。他怎么也想不到身居高位、远在千里之外的周恩来，会这样洞察入微地了解一个电影导演的心境和苦衷，那掷地有声的话语，使王家乙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望着周恩来那充满慈爱的脸膛，大滴的热泪夺眶而出，吧嗒吧嗒地滴在胸前。

不久，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并多次提到王家乙导演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周恩来直言无讳指出了王家乙所受到的思想束缚和压力，声声热语寄寓了一个政治家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意。周恩来的讲话象一股和煦的春风吹进了沉闷的文艺界，王家乙漏网右派的问题很快就平反了。

如今，那令人悲痛和心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然而，年近七旬、须发渐稀的王家乙谈起往日的一切，依然是大悲大恸。今天，周恩来所期待已久的艺术繁荣民主、国民经济振兴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局面已在逐步成为现实，但周恩来却只能含笑于九泉之下。青天恨满，碧海泪深，王家乙又怎能不悲不恸呢？

（武为三）

周恩来与胡杏芬

胡杏芬（1914—1940年），青年学生。笔名净三。1937年，在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疗养时，结识从陕北经西安到北平治疗肺结核病的邓颖超，并以此为题材写了《李知凡太太》一文。

——编者

胡杏芬，一个普通的青年女子，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周恩来与邓颖超，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对“模范夫妻”的名字则早已家喻户晓。

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胡杏芬结识了邓颖超，进而认识了周恩来。于是，半个世纪的历史便演绎出本文所要叙述的一段动人故事……

1937年抗战前夕，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到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疗养，与病友和院中工友结下友情。同室的病友胡杏芬有感于李知凡太太的人格情操，写下了一篇记人散文，这就是《李知凡太太》。在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中，胡杏芬生动地追述了邓颖超给予她的深厚的友情和帮助，把“李太太”的品德与作风描绘得栩栩如生，可亲可敬。

胡杏芬生于1914年，祖籍浙江余姚。她聪明好学，学业出众，1932年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其时，她与同学梁敏时同去北平高考，结果梁敏时考入北大政法系，胡杏芬被录取在清华大学。但不久，梁敏时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最后壮烈牺牲。而胡杏芬又不幸染上了肺病，被迫住进西山平民疗养院。好友遇害使她悲伤，婚姻的不幸让她烦恼，久病不愈令她消沉，她陷于孤独，失却了生活的乐趣。正在此时，恰好邓颖超经党组织决定，由陕西来到北平疗养，和胡杏芬同住在一间病房里，她们度过了难忘的三个月病友生活。“太太虽然并没有以医生自负，但的确减轻了我的心理病态的程度。”邓颖超那震撼人们心灵的精神力量，燃起了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胡杏芬新的生命之火，待到她们依依借别时，已是莫逆之交的朋友了。

抗战爆发后，胡杏芬跟随她的大哥一家迁居重庆，邓颖超也在美国记者斯诺的掩护下离开北平，两位病友断了音讯。1937年的一个冬夜，胡杏芬在重庆姐姐家收到寄自外地的署名“邓颖超”的一封信，拆开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李知凡太太”是个化名。之后，又经已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邓颖超主动联系，两位病友才重新相逢，胡杏芬也才知道邓颖超就是周恩来夫人，当初她是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身患多种疾病而秘密前去北平治病疗养的。

经邓颖超介绍，胡杏芬认识了周恩来。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象个天真的孩子，老盯着周恩来的眼睛看。周恩来微笑地问她：“你怎么老盯着我看啊？”胡杏芬坦率地说：“我听别人讲，您的眼睛特别厉害，我看了半天，倒不觉得，还是挺温和的。”周恩来笑了，说：“对敌人来说，我的眼睛是厉害的，因为要看穿他们的一切阴谋；对于朋友来说，我的眼睛应该是温和的，要尽可能看到他们的困难、要求和理想，努力帮助他们。”这段时期，胡杏芬几乎每周有二三个晚上去曾家岩看望周恩来夫妇，她将自己的散文和诗歌送给他们看，（其中就包括完稿于1939年的《李知凡太太》）向他们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和胸中郁闷，请求指导。周恩来读了她的作品，特别是《李知凡太太》，非常赞赏她作品的清丽文笔和质朴、平实、细致的风格，认为她大有可能成为一个女作家，鼓励她好好努力，在文学上能有所成就；并一

再安慰她养好病，搞好身体，尽管当时周恩来工作十分紧张，但每次见到胡杏芬，总是抽时间同她倾心交谈。他对胡杏芬所代表的这一代青年的思想脉搏是深知熟识的，他耐心地给她讲抗战形势，讲民族前途和青年责任，引导她从个人感情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投身革命。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交往，胡杏芬在周恩来夫妇的启发教育下，心情愉快，思想进步，逐渐摆脱了胸中多年积郁的阴影。正如她在《李知凡太太》一文中欣喜地写到的那样，她看到了真正“领导群众，拥护抗战，为民族解放，为祖国谋福利的大中华的好子孙”。胡杏芬开始从一个同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愿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战士。看到胡杏芬的进步，周恩来夫妇非常高兴，便把她介绍到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有意培养使用她。

令人惋惜的是，正当胡杏芬在革命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她的才华刚刚得以施展的时候，病魔又一次向她袭来。1939年底，胡杏芬病重，她怕把病传染给姐姐的小孩，便搬出姐姐家。独自住到重庆乡下。周恩来和邓颖超为此专程去看望过她，给了她莫大的鼓舞和信心。然终因久病沉疴，胡杏芬不幸在1940年秋溘然长逝了，年仅26岁。如果不是因为肺病过早地夺走了她的生命，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历经磨难而又有才华的女作者，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定会有更多的建树。胡杏芬病逝不久，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去沙坪坝看望同志时，周恩来提议说：“好久不见胡杏芬了，去看看她。”到了胡杏芬住处，才知她已逝去，周恩来与邓颖超心情立刻沉重起来。他们来到山坡上胡杏芬的墓前，面对一抔新土，默默地伫立着，久久不忍离去。此后，周恩来多次在胡杏芬的同学处提起胡杏芬，询问关于她的一些情况。1943年，为了纪念胡杏芬，周恩来对胡杏芬的同学说：“要给她立一个碑。”并和邓颖超商定在墓碑上刻两行字：“胡杏芬女士之墓李知凡李扬逸共立。”周恩来还亲笔题字，请人镌刻在石碑上。后因局势变化很快，周恩来工作太忙，几次安排时间都未能成行，墓碑终未立成。1977年初，胡杏芬的同学、重庆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罗清曾去红岩等处查找这块墓碑，但至今下落不明，留下了一大遗憾。

解放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依然记着胡杏芬这位普普通通的朋友，多方打听寻找她的亲友后代。1956年秋，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舞会上，周恩来发现与她跳舞的女青年很像当年的胡杏芬，便问她：“你是哪里人？”女青年答：“浙江余姚人。”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洪调群。”周恩来又问：“你们余姚有个胡杏芬，你知道吗？”答：“她是我三姨。”周恩来一听，高兴极了，舞也不跳了，问起胡杏芬生前身后的情况来。他说：“她是我们的朋友，我很熟悉她。”并嘱咐说：“以后有空，我还要找你，你也可以来找我。”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胡杏芬的亲属。在周恩来身患癌症的日子里，邓颖超曾专程陪他到北京西山去过一趟，特地去寻找邓颖超和胡杏芬最初结识的平民疗养院故址。

周恩来去世后，几经曲折，邓颖超又与洪调群等胡杏芬亲属接上了联系，延续着这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故事。1983年，《瞭望》杂志通过多方努力，四处寻查，于当年第7期重新发表了《李知凡太太》一文，此文最初发表于1941年“孤岛”上海的《妇女知识丛书》，它的再度“出土”，以及胡杏芬仅存于世的另一篇散文《小许许》隔了近半个世纪而破土问世，均得力于邓颖超当年的热情推荐（《李知凡太太》）和精心收藏（《小许许》）。胡杏芬生前显露出来的文学才华当年就得到周恩来的评估和嘉许，而足可证明此一评

估的，便是她的《李知凡太太》。就连文中主人公邓颖超生前也肯定了这篇作品。1987年8月17日下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对为她出书一事而来的人说：“写历史上的事，要抓住准确性。《李知凡太太》写得活生生的，是50年前的我，可以看出我那时生活的侧面。”如今，《李知凡太太》和《小许许》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电视剧《李知凡太太》也已公映，胡杏芬、周恩来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人间自有真情在，由《李知凡太太》一文问世复世的不平凡经历，特别是周恩来、邓颖超与作者胡杏芬之间真挚的交往，深厚的情谊，我们不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吗。

（仲向平）

忘年交 师生情

周恩来与严修

“严范孙先生名修，生于1860年4月2日。癸未进士。1886年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至1897年任贵州学政，甲午战败，先生认为欲强中国必须改革教育。1897年奏请开设经济特科。因不见容于朝廷当权派，1898年辞官返津，专心兴办新学。1898年，聘张伯苓为家塾教师，授新学。1902年访日考察教育。1904年偕张伯苓再度访日。回国后改家馆为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聘张伯苓为监督，继续任校长。另创造中小学多所，并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开办保姆讲习所，附设严氏蒙养园。1905至1909年，在学部侍郎任内，在全国推进新式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完整体系。1918年赴美考察教育半年，次年与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增办南开女中，1928年增办南开小学，先生均竭尽全力。1929年3月15日，先生病逝，享年69岁。”

慧眼识英才

1913年秋季，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入学不久，即显示其优良品德和才能。他不仅深得同学们的信赖，也得到南开创办人及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称他为“宰相之材”。当时，南开中学近千人，周恩来成为最受赏识的人，不能不认为严修独具慧眼。

1915年，南开全校举行国文比赛。当时，每班可以选出五名学生参加，周恩来和他的同窗好友张鸿浩等五人作为班上的代表参加了比赛。这次比赛由严修亲自阅卷并选拔。全校统一出了两道赛题，周恩来选做了第一题“诚能动物论”。比赛结果，周恩来取得全校第一名，他们班也得了班际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子。这四个字是严修亲笔写的，它包含了严修对周恩来及其班级的推崇和奖励之心。

周恩来也很敬重严修。1914年9月29日，周恩来亲至严宅，请严修为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题写刊头。严修欣然命笔。

忘年之交

严修长周恩来38岁，周恩来尊严修为长辈，严修则视周恩来如同代知交。

1917年4月6日，严修邀族弟严子均和梁巨川等同代人观看志德社演出改编的新剧《一元钱》，也邀请了周恩来同去。1919年9月21日，严修在私寓宴请教育界香宿黄郛、范源濂、张伯苓、邓澄波等人，周恩来同时被邀。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严修和周恩来的友谊，此时已非同一般，而是忘年之交了。

参加新剧运动（即话剧运动）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周恩来很早就活跃于南开话剧舞台。1914年11月17日，南开新剧团正式成立，周恩来被举为布景部副部长，后连选连任。他多次随团演出，曾在《仇大娘》中饰慧娘，在《一元钱》中饰孙慧娟，在《老千金全德》中饰童男，在《千金全德》中饰高桂英，在《醒》中饰冯君之妹。

严修也是醉心旧剧改革和热心新剧者之一。南开于1909年最早推出由张伯苓编剧的《用非所学》，就是首先在严宅东院演出的，严修的长子智崇、次子智怡和孙男孙女各一，参加了这次演出。此后，严修在审查新编剧目，

为新剧定名，修改、审查和修编剧本等方面，都做过很多工作。在排练《华娥传》、《醒》诸剧时，严修对其思想内容、情节、语言表达、表演技巧以及布景道具等都进行过细致而具体的“评判”，和周恩来等进行了有意义的切磋。有一次，严修还自愿担任剧场招待员，足见其乐此不疲达到何等程度。

议婚未果

1917年6月5日（即周恩来即将于南开学校毕业时），严修长子智崇从北京写给严修一封家信，信中说：“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信中“六妹”是严修最幼女儿智安，当时在北京贝满女中读书。

6月9日，智崇再次上禀：“今日为星期六，四妹拟令六妹出来一次，以便当面询之也。”信中的“四妹”指严修第三女智舒，当时住在北京。

严智安当时仅16岁，正在努力学习，不愿谈婚姻事。于是，此事遂寝。后智安终身未嫁，解放前夕患脑溢血去世。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周恩来知道了。周对此也持异议。有一次他与张鸿浩谈到此事时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定会受严家支配。”

经此一事，严修对周恩来不仅未存芥蒂，反而更加敬重了。

东瀛重逢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良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9月，周恩来由天津登轮东渡，到日本投考官费留学。

1918年4月，严修赴美考察教育，11日途经日本东京。12日，周恩来闻讯，即去看望严修，并陪同他到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以后周恩来几乎天天去看严修，亲做菜肴让其品尝。事后，严修曾笑着对南开留日同学说：“翔字（周恩来字翔字——编者注）的醋溜白菜真不错。”20日，严修离日，周恩来又到码头送行，祝其一路平安。

严修在美、加两国考察教育达半年之久。12月回国路过东京时，再次见到周恩来等南开留日同学，共同聚餐并合影留念。

负笈重洋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不久，爆发五四运动。周4月返津后，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并领导了天津市这场大规模爱国斗争。反动当局对之进行残酷镇压，并于次年1月29日，将周恩来等运动领导人拘捕入狱。经过半年之久的顽强斗争，直至是年7月17日，周等方获释出狱。但此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迫于反动当局的压力，已将周恩来等被捕学生开除了南大学籍。周恩来陷入失学失业的困难境地。

严修出于惜才，拟为周恩来创造进一步进修的机会，捐资七千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举荐周恩来、李福景二人出国留学。此举得到张伯苓赞同，并经南开董事会认可通过。

留学地点，最初考虑去美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元价高，所以决定改去欧洲。

是年10月，周恩来、李福景到严府辞行，拿到了旅费千元和第一年用款，并约定今后每半年汇去学费一次。严修还将一封写给北洋政府驻英公使顾维钧的亲笔信交给二人，信中托其照顾周恩来、李福景。以后，汇给周恩来的资助，按期由严修交李福景的父亲李琴湘寄李福景转周恩来。周、李二人乘轮先抵法国，然后转英。1921年1月5日，到达伦敦，周恩来即致函严修，

内称：“恩来、福景入学事，已决定往北部。各大学一切入学手续已办完，惟俟学校回信便将遣往。”“英国生活程度之高，英镑价格之长，竟超过留美费用以上。”据记载，当时英国生活费用在欧洲是最高的。在伦敦，每年约需二百镑。而法国的生活费则低得多，不及伦敦之半。2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函严修，信中说，他已得到爱丁堡大学的复信，允其免去入学考试，只试英文，考期在9月，开学力10月。此半年中，或往爱丁堡大学听讲，或往法国学法文。行止究如何，现尚未敢确定。

最后，周恩来还是选择了后者。2月上旬回到了法国。

“人各有志”

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不久，由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向严修进言，周恩来出国后思想已经变了，还参加了共产党，劝严修不要再资助他。严修则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嘱咐帐房继续给周汇款。周恩来对此很感激，此后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到以上事。埃德加·斯诺于解放后修改再版的《西行漫记》一书中也有记载：

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工厂研究劳工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以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周又对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严引用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于1950年电请张伯苓自渝来京。张回津前，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设便宴为张送行。同席有张伯苓长子张希陆和周总理昔日同窗好友李福景、潘世伦等人，邓大姐也在座。当时情况，张希陆后来回忆：“因为抗战期间总理在重庆时，曾多次问校长有无严老先生的像片，因此，那天我们把印好的像片带去。就餐时，我把像片交给总理。总理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言外之意，是感激老先生对他人格的认识。吃饭间，端上一碗清汤来。总理又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后来，周总理对严修一生作了评价：严老先生“一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足为后世学习的楷模。”

（严仁赓）

周恩来与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年），教育家。1904年与严修等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改名南开学校）。1919年又与严修等创办南开大学，任校长。193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国民参政会副会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张教育救国。著有《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张伯苓教育言论集》等。

——编者

张伯苓先生与周恩来总理的交往近40年，于私，师生情谊；于公，团结统战。他们的相交相知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在南开校友中广为流传。

（一）

周恩来总理1913年暑期考入南开中学，入己三班（后改丁二班）。那时他的伯母住在天津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2号，生活拮据，所以周恩来上学时经济很不宽裕。他住在学校里，只有星期日才回到伯母那里。周恩来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又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刚刚过了一个学期，他这方面的才能就显露出来。1914年3月，他与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创办“敬业乐群会”，并当选为智育部部长。暑假又当选为暑假乐群会会计。他主编会刊《敬业》，又参加新剧演出，扮演女角，在南开学校十周年纪念演出中饰烧香妇，“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南开新剧团成立时，周恩来担任了布景部副部长。对于这样一个学生，不能不在张伯苓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张伯苓以善于了解学生而著称。1916年南开学校学生满千人之前，他都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家庭情况。在当时那种世态炎凉的社会里，张伯苓并不因周恩来的清贫而对其漠然视之，相反很赏识、关怀周恩来。他免去了周恩来的学费、书费、宿费，让周恩来业余帮助学校做些抄写、刻字的杂事。一个私立的学校，准免学生的学杂费，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周恩来能得到这种待遇，可见张伯苓对他的看重。

周恩来常常到张校长家去。校长也每每留他吃饭，吃的是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后来周恩来开玩笑还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鱼吃。”在张伯苓家，周恩来同校长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从社会问题到国家大事，周恩来思想敏锐，谈吐不苟，毫无时下青年学生的俗习。张伯苓一再说起：“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张伯苓很愿意把事情交给周恩来做。1915年7月，学校成立暑假乐群会，校长张伯苓是名誉总干事，周恩来任总干事，负责全校暑期活动。1916年暑期张伯苓率南开新剧团到津郊高庄编排新剧，只挑选四名学生，其中就有周恩来。新剧团在高庄借寄李氏小学，每天搔首构思，累了，张伯苓给大家讲趣语，再不就是“旅行数里之外，或泛舟河渠之中，或观学校，或观稻田，又或促膝谈心”。有时，周恩来还与校长一起观剧。如1917年4月6日，周恩来就曾与严范孙、张伯苓、林墨青、梁漱溟等观看志德社演出《一元钱》剧。5月底，当张伯苓作为中国体育总领队（内有南开七名选手）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回国后，周恩来作为主席组织了全校大会欢迎张伯苓和南开运动员，并致欢迎词。6月26日周恩来中学毕业，南开学校举行第十届毕业典礼。张伯苓和徐世昌、陈独秀等来宾坐在主席台上。周恩来代表毕业同学讲话，徐世昌颁发毕业证书，同时周恩来还获得“国文最佳奖”金质奖章。张伯苓看到自己得意的学生获得如此好的成绩，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四年的中学学习结束了。周恩来开始为自己的进一步求学奔忙。张伯苓也决心进一步深造。8月8日，他由津启程到上海，乘天祥九日船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9月，周恩来也抱着“这密群科济世穷”的决心东渡日本留学。周恩来到日本后，与南开留日同学一起住在东京牛込区鹤卷町141番，名曰新中学舍。他们不用仆役，“炊事及杂事，皆学生自为之”。1918年12月14日，严范孙、张伯苓由美国回国途经日本时，他们还曾去新中学舍看望周恩来等南开同学，并与他们聚餐、合影。

深厚的师生情谊，优良的南开校风，使周恩来一直对南开念念不忘。周恩来参加革命以后，多次谈到张伯苓校长，谈到南开对他的培养。1957年他陪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天津，在全市高等学校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便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二)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来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周恩来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校长虽然一如既往热爱和敬重，但新的觉悟也使他有了新的认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如曹汝霖、梁士诒、周自齐辈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1919年5月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作法，说“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政治手腕办教育。”他还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他对张伯苓说：“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还有一个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的教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的术语，要我说不出来。把一个青年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呢？”张伯苓通过对美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深感到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学号62号）。张伯苓提出，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在谋社会进步。教育要尚实勿虚，联系实际，注重科学教育，“按科学方法教之作事”。他亲自拟定改革草案和宣言书。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但是，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深入发展的革命斗争，周恩来没有来得及协助校长开展具体工作。1920年1月29日，为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以及要求人民言论结社等权利，周恩来带领南开等校三千余名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这年春节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周恩来和南开其他被捕同学。周恩来领导被捕代表在狱中展开斗争。7月17日反动当局被迫释放周恩来等人。

6月8日他在给李愚如的诗中写道：“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诗的附言中也说：“别了！三个月后，或者能见着，希望了。”周恩来出狱后，校董严范孙决定以南开设置的“范孙奖学金”派遣学生出国深造。对于派谁出国，严老先生和张伯苓校长作了商量，他们都同意周恩来和李福景两人，随后张伯苓还通知其他校董和有关人士（通知内附有出国留学条件），都一致认为周、李符合条件。周恩来第一年的用款是

以支票交给本人带去的（他曾丢失支票，后来挂失，又领到），以后三年每学期领一次。旅欧勤工俭学，开辟了周恩来的革命道路。严范孙的经济支持，张伯苓的热情关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三）

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对中国侵略。这时，南开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张伯苓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北方青年学生中的威望愈来愈大，他的思想也在明显变化。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苓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而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致函张伯苓。信中说：“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实现，成为这封信以后几个月的事情。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此历史转折关头，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奔赴西安，向张、杨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爱国官兵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并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周恩来为挽救民族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开大学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师生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以南大学生名义发表通电，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张伯苓关心蒋的安危。蒋介石的被释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伯苓说这是“逢凶化吉”，“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为此，学校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他为南开培养出象周恩来这样的学生而自豪。据说他还把周恩来的相片放到桌上，他立在桌旁，照了一张像。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加紧，张伯苓抗日的态度更加坚定。1937年7月29日、30日，日寇罪恶的矛头指南开大学，狂轰滥炸，将美丽的南开园夷为平地。初步统计损失高达三百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损失的十分之一。正在南京的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8月中旬，他又在南京召集南大学生会负责人王玉堂、王绥昌、冷冰等开会。他说，现在是抗日爱国时期，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为国效力，到八路军那里也行，我可以通过周恩来校友给你们介绍。王玉堂、冷冰、张恩田、袁永一、沈士杰等同学当即表示愿意去延安参加八路军。通过张伯苓与周恩来联系，他们在学生会负责人王绥昌陪同下来到南京傅厚岗46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同志接待了他们。

1938年，张伯苓与周恩来还有一次有趣的见面。那年5月，张伯苓去武汉为重庆南渝中学募款。他先后找了张群、孔祥熙。5月13日武汉校友108人聚会欢迎张校长，并请来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住在汉口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了宣传抗日，扩大统一战线，周恩来足迹遍及武汉三镇，对广大群众和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青年界发表演讲。这次南开校友的聚会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校友们分析了抗战形势，指明了

努力方向，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在校时所受校长的哺育和南开精神的熏陶。他说：“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二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聚会时，还放映了张伯苓带去的有关母校的幻灯片，当映出周恩来的相片时，张伯苓用手指着周恩来的头对大家风趣地说：“这个脑袋要值十万块钱呢！”在座的校友都知道，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曾经以十万元悬赏过周恩来的头颅。有些校友说笑说：“校长可以领着周恩来到蒋先生那里，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吗！”张伯苓笑了，周恩来和大家也一起笑起来。

此后，张伯苓的政治态度逐步发生变化。1938年7月，他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当时，张伯苓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交往各方面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翁文灏、范旭东、侯德榜、马寅初、柳亚子都先后住在那里。当时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钱千里、陶金等也常去学校。南开学生中的国民党要人吴国桢、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也常是张家的门上客。1938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开展工作的阵地之一。他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佘乃如，有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去，或者一人，或者与邓颖超同行。1939年1月初，周恩来应张伯苓和南开校友会邀请，到南开午晴堂作《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雄辩地论述了抗日必胜的原因，使张伯苓和在场的校友受到很大鼓舞。报告会后，张伯苓请周恩来、邓颖超吃饭，并请了周恩来的一些老同志作陪。席间，周恩来和张伯苓一起回忆起周恩来在南开上中学时演出新剧的情景，气氛相当热烈。继午晴堂演讲之后，1月9日，南开校友会又在市区陕西街留春幄餐馆举行新年后首次聚餐会。周恩来又应邀参加，并即席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话。他再次强调：“抗战十八个月来，我已打下抗战必胜之基础，而在争取胜利中又奠定建国的基础，抗战前途极为乐观。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穷干与实干。值此抗战转入第二期之际，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

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抗战、团结、进步”，还是“投降、分裂、倒退”笼罩着整个山城。周恩来多次向张伯苓分析抗战形势。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援救进犯南洋的孤军，日本侵略军在4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入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本来就要扩充兵源，准备反共反人民战争，便趁此机会，竭力鼓吹“十万青年从军”，打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旗号，欺骗青年。针对这个形势，周恩来又到津南村对张伯苓进行工作，向他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事后张伯苓对副校长喻传鉴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不是一件好事。”对这次“从军”运动，南开师生作出了相应抵制。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张伯苓闻讯十分高兴。8月28日，毛泽东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陪同下，到达重庆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谈判。在43天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广泛深入地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9月6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陪同下，曾驱车津南村拜访张伯苓。第二天，张伯苓又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泽东。

(四)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但不久他又审时度势，毅然拒绝蒋介石的多次“催请”，不去台湾，走上顺平时代潮流的光明道路，张伯苓的这一明智抉择，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友好同学的开导、帮助。周恩来在张伯苓这一决定性转变中曾经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是鲜为人知的。

1948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的时候，国内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特殊功劳的傅作义将军是张伯苓的老朋友，他十分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有一天，傅作义找到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谈此事。张希陆对傅作义说，此事最好告诉周恩来副主席。不久，傅作义给张希陆来电话：“我刚从周副主席那里回来，请你来一趟。”张希陆到达后，傅作义对张希陆说：“你想的很对。周副主席告诉我，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让他去台湾。”当时中罕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在北京，他要到香港去，便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王恩东是张伯苓的学生，让他想法透消息到重庆，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果然不久，张伯苓收到香港寄来的“无名士”的信，得到上述信息。他知道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使他最后下定决心，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蒋经国，从而掀开了晚年历史的新篇章。

张伯苓从重庆回到北方，也是在周恩来关怀帮助下实现的。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他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同意张伯苓北归。重庆军管会立即通知了张伯苓先生。1950年5月3日，重庆南开中学全体教职工欢送张校长北归，合影留念。喻传鉴等到机场送行。一架货机载着张伯苓夫妇腾空而起，向着首都北京飞去。

在北京，有关部门按着周恩来的指示做好了接待张伯苓准备，政务院接待室将飞机到达时间通知了张伯苓的家属。下午，政务院提前派汽车到达机场。周恩来派了秘书何谦等前去机场迎接。傅作义先生也赶到机场，随车还为张伯苓带了汽水。张伯苓下飞机后，政务院汽车把他们送到傅作义宅，还没坐定，周恩来就匆匆赶来。周恩来问候校长和师母在重庆的生活，共同回忆了在山城过去的种种情景，甚至谈到在张家与吴国桢的辩论。周总理笑着说：“校长，您看老同学唱对台戏很有意思吗？”张伯苓笑了。

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四个多月。其间傅作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常去聚谈。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先生从天津到北京，每周一次必到张伯苓处看望。周恩来也常去。秋天，张伯苓想回天津，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张伯苓饯行，并有潘世伦、李福景、吴勤以及张希陆作陪。张伯苓那天还带去了严范孙先生的照片。因为在重庆时，周恩来多次问校长有无严的照片。周恩来看着照片深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周恩来说得很有感情，在座的人都很感动。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校长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张希陆答道，就怕校长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恩来当即回答，我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后来周恩来让秘书写了信）。张伯苓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俞启威，南开学生）对他给予关照。为此，张伯苓还坐三轮车到

市府表示感谢。

以上可以看出，张伯苓从重庆北归后，周恩来对张伯苓关怀备至，并没有对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有所批评，而是热情期待他的自我认识，耐心等待他的彻底转变，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关于这一点，周总理早在1951年9月29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就谈过。他说，我和张伯苓先生总算是师生关系了，彼此了解，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过什么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坏，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对外政策，一个是清除贪官，经济建设。但是我没有让他写点什么东西。我觉得一个人要等他自觉地认识才最有力量。就是因为这样一耽搁，他就年老病故了。临死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尤其因为我们在重庆时常常吵架（为蒋介石不知吵了多少次。他曾经是很迷信蒋介石的。他由重庆回来以后才说他错了）。所以，我不想勉强他。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我更早提醒他一下，他可能多表现一点，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为什么采取那样态度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新中国，不采取勉强的办法。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到天津，到张宅吊唁。他先向张校长遗体行礼默哀，又到对面屋看望了张师母，问了后事安排，然后又到客厅同校友见面说：

“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本来他身体一直很好，从四川回来想让他多休息一下，再作安排，没想到突然故去了。”

“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周恩来还说，我们共产党对好的就承认是好的，但不掩盖他不好的地方，对不好就说他不好，但他有好的地方也不能一概勾销。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周恩来对张伯苓的正确评价，使在场的老校友心里佩服，很受感动。

当时还由周恩来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恩来送了花圈，上写“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张伯苓的追悼会在南开女中举行，黄子坚致悼词。

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仍关心张伯苓家属的生活。1961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的高干购物证送给张伯苓夫人，还送给五百元钱，并嘱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多加关照，直到这年冬王夫人去世。

一个教育家，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近40年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是南开教育史上弥足珍贵的篇章。

（梁吉生）

一片彩云秋后至

周恩来与李宗仁

李宗仁（1891—1969年），1910年参加同盟会，后参加护国、护法战争。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春，在粤军李济深部协助下统一广西，与黄绍竑、白崇禧等组成新桂系。1927年3月攻占南京后，参与蒋介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1930年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指挥台儿庄战役取胜。1948年当选为国民党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主张与中共“和谈”以图实现南北“隔江分治”的局面。“和谈”破裂后飞广州，后经香港赴美国。1965年7月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1969年在北京病逝。

——编者

1965年7月18日，一架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机舱的门打开，一位神情激动的老人走下舷梯，他就是旧中国最后一位总统李宗仁。

早已等候在此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迎上去，热情而真诚地伸出他那温暖而有力的大手，亲切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当两双曾经合作过，也曾交战过的手紧紧握到一起时，整个世界轰动了。人们不仅为前者的明智选择，也为后者的宽宏接纳而慨叹不已。这时候，只有李宗仁心里最清楚，没有周恩来的真诚召唤，何以有自己今天的落叶归根啊！

—

1955年4月，正是鸟语花香的季节，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了。会议期间，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篇令世界瞩目的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则声明竟如此强烈地震撼了一位栖身异乡的老人的心。他就是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蒋介石通电下野后，李宗仁代任总统。但是，李宗仁上台后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的命运，他是带着失败的耻辱离开大陆远赴美国的。在美国，李宗仁曾经企图依靠美元寻求第三条道路，但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这一选择的错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几年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李宗仁也不能不承认眼前的事实。他曾指着报纸上的大陆新闻对朋友赞扬：“共产党真了不起！”不过，最令他折服的还是周恩来这篇导致他改变人生道路、萌生“落叶归根”念头的声明。

万隆会议后，李宗仁异常兴奋地致信在香港的旧部程思远。要他代为起草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程思远收到信后，立即找到在中央大学任教的罗梦册先生商议此事，由罗起草了一份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大纲。李宗仁根据这份大纲亲自写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分别提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并于6月11日在纽约公开发表。这份建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完整部分”，“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所谓联合国托管、中立化或两个中国的理论，作用在使台湾与中国分离。这正与一般的统一倾向，如德韩及越南的情况背道而驰。”虽说建议的提出包含

着李宗仁复杂的个人考虑，但也的确反映出他在政治立场上的重要转变。

李宗仁的政治动向立即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重视。8月14日，李克农在向中央汇报中分析：李宗仁提出这一建议主要有两层原因，第一，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发表了关于中国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声明后，国际舆论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日高；第二，我国政府对蒋介石集团分子的宽大政策和这年卫立煌返国的实际影响。鉴于此种状况，加上我方的争取工作，“李宗仁靠拢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周恩来对李宗仁的建议也给了中肯的评价，他说：“这个建议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这番话是对李宗仁发出的真诚召唤，也是对一切身居海外的爱国人士的真诚召唤。从此，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秘密而稳步开展起来。

二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李宗仁身边究竟哪一位能对他起作用？工作究竟从哪里开始着手呢？

一天，有关方面的同志向他汇报工作。谈话间，有人提到李宗仁请程思远起草建议大纲的情况。周恩来眼睛一亮，“程思远？！”好熟悉的名字。他思索着，追寻着，终于想起1938年自己在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时，就是这个程思远奉白崇禧的命令，接他去给路经武汉出师抗日的广西学生军讲话。那时候，年轻有为的程思远就受到李宗仁的欣赏……对！就从程思远的工作做起。

经过慎重商议，计划定下来，周恩来的心也定下来。他令有关人员一定要把程思远请到北京来。

不久，居住香港的程思远得到一个口信，原国民党桂系元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李济深来了电报，请他到北京一谈。口信中允诺，这件事第一绝对保密，第二来去自由。后来，程思远回忆这件事时说：“策动我回国这件事只是以李济深的名义，而实际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

事关重大，程思远不能不反复权衡，周密思考。就在这期间，周恩来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呼吁：海外知识分子要为统一祖国大业做贡献。这一号召深深地感染了程思远，使他在事先没有征得李宗仁意见的情况下，独自做出了赴北京与共产党接触的决定。

1985年，程思远在他的寓所接见笔者采访时说：“我认为，共产党讲话算数，特别是这些话由周恩来公开讲出来，那么我感觉回国时机是适宜的，心底是踏实的，因为我信任周总理。如果不是周总理说这个话，我也许不会回来。”程思远的选择得到了许多老朋友的赞许。1965年，屈武陪同李宗仁、程思远到国内各地参观时对程思远说：“1956年，周总理的号召只是一个普通的号召，而你这件事却办成了，居然做到了，真了不起啊！”程思远不无激动地说：“如果没有周总理对我的关怀，结果还不一定是什么样子。”

三

事实正象程思远所感受的，在争取李宗仁回国长达近十年的艰苦努力

中，他五次北上京城，每一次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工作之细致，设想之周密，是程思远始料不及的。可以说，是周恩来为李宗仁平安回到祖国铺设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1956年4月28日，程思远第一次到北京。虽然他和周恩来还是18年前见过面，但周恩来还是一眼认出了这位高个子使者。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中，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周恩来深知，这些身居海外的同胞对我党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而这又是他们决定人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因此，第一次交谈，他就坦诚地向程思远阐明了中共的内外政策，说明当前中共的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他情意恳切地对程思远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把党争取李宗仁的工作提到国共再度合作的高度。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落到争取李宗仁的工作上，请程一定将这一信息转达海外人士和李宗仁。周恩来的真情深深打动了程思远，他当即表示要为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而努力。

1959年，周恩来获悉：李宗仁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提出有一批文物要无代价贡献祖国，并吐露了落叶归根的心愿。这一信息受到周恩来高度重视，他立即召见程思远，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出于爱国热情要向祖国贡献一批文物，政府表示赞赏。”“但国家接受文物是要给以报酬的。”对李宗仁回国的要求，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他提出要李宗仁先到欧洲与程面谈，然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的考虑是慎重的。第一，当时国内形势比较复杂，国民经济已出现困难；第二，从李宗仁的处境来讲一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蒋帮特务的监视。稍有不慎，出现闪失，造成的影响是难以补救的。更重要的是，李宗仁虽然有了归国的意向，但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对美国仍抱有幻想。

这些情况说明，工作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周恩来嘱咐程思远，一定要从思想上帮助李宗仁摆脱对美国的幻想，靠拢新中国。

1960年底，美国大选揭晓，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这使李宗仁产生一种错觉，他认为麦卡锡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国会中援蒋集团的头目诺兰也失去政治影响了，应该鼓动肯尼迪改变对华政策。因此，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祝贺他当选总统，一方面促进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肯尼迪的回信中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传话李宗仁：“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他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超然一点，不要对美国政府抱有幻想。”

事实的教育和周恩来的提醒，使李宗仁的思想日渐靠拢新中国。1962年11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中对尼赫鲁的思想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文章指出：尼赫鲁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矛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文中同时指出，美国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作法对美毫无裨益，只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1963年，李宗仁会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

赛丽时，承认自己同蒋介石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

四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李宗仁回国的准备工作也在悄悄地进行。

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赶到香港与程思远商定在欧洲会面的地点、日期以及联络办法。为躲避美蒋特务的盯梢，最后选定会面地点在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是中立国，又是著名的风景游览区，还有郭德洁女士的弟弟所开中国餐馆做掩护。李宗仁以旅游名义前往，不致引起外人的怀疑。为了这次会见，从周恩来提出建议算起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这一次李宗仁欧洲之行的意义直到1965年才真正为人们所理解。

1963年11月，程思远赴欧洲会见李宗仁之前又一次赶往北京，同周恩来彻夜长谈。他向周恩来倾吐了李宗仁“回国心情甚为急迫”的近况。说：“去年4月，李宗仁曾函告张发奎，他死后希望把骨灰扬于祖国东海；今年9月又致信黄旭初，说他已感到气喘，想到港居住；最近又公开表示要去法国。说‘只要对祖国有所裨益，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程思远又说：“这些都表明李宗仁有老年人的一种自然变化，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叶落归根，向历史最后交代。希望中共给予考虑。”周恩来注意听完程思远的话后，首先肯定李宗仁是有爱国心的。接着详细分析了李宗仁的基本情况，指出他目前还受到美国、台湾、第三势力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周恩来说：“我们着他是具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但要劝他摆脱以上四个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认为，李宗仁对第一第二两个方面的关系可能已经断了，这次经香港去欧洲要注意防止第三势力的纠缠。至于第四个方面可能还未完全摆脱，周恩来坦率地说：“李先生总想在中美之间做点事情，这不符合我们的国策。美国武装力量不从台湾地区撤退，就谈不到中美恢复邦交问题”，总起来说，“我们对李先生向往祖国表示欢迎，但不强求”，“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

对李宗仁到欧洲后的选择，周恩来设想了四种可能：第一，重回美国，料理些事情。如他有这个意思，不必勉强。第二，回来看看，住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去，我们保证他来去自由，保守秘密。第三，留在欧洲。他考虑留在外边为祖国做一点事情，我们欢迎，如生活上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第四，如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的考虑十分周到，他继续说：如果李宗仁决心回来，我们一定要从各方面替他设想周到。祖国已解放14年，变化很大，需要“过五关”（思想、政治、宗族、社会、生活五关）。国家还存在许多困难和不足，应该告诉他实情，这不是使他失望，也不是条件，而是言之在先，让他做好思想准备。

一旁聆听的程思远望着周恩来真诚的目光，胸中涌动着一股暖流，眼睛不禁湿润起来。

“至于李宗仁回国后的政治安排，”周恩来说：“1949年国共和谈时，我们曾许的副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没有这个地位了。鉴于上次这样说没有生效，这次不采取这个办法了。我们是老朋友，道义之交，不是谈判条件，只要他先下决心，我们自会妥善安排。”

谈话从深夜到黎明，程思远告辞出来时，心里感到十分充实，一夜的疲

倦仿佛消失殆尽。圣诞节前一天，他带着周恩来的嘱托满怀信心飞往苏黎世。

程思远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李宗仁了，但见面后他顾不上畅叙怀念之情，而积极转达了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的内容。话未尽，李宗仁已感动不已，仿佛置身于新中国温暖的怀抱中，他坚定地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李宗仁回国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五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美国新泽西州时，再一次震撼了李宗仁的心。回想起国民党统治中国多年连一部象样的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他对新中国由衷地折服了。如果说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那则声明使他萌发了回归祖国的初衷，那么这则消息就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心。

但是，就在这一年李宗仁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当时中法建交，李宗仁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在美国报纸发表，要求美国政府追随法国同中国建交。但在信中，他错误地断言朝鲜战争是中国发动的。不过，很快，他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言论。

1965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李宗仁的动态上批道：“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毛泽东的关怀加速了李宗仁回国计划的实施。

这年3月，李宗仁致信程思远，表示急于回国参加建设。程思远接到信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果断决定“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飞欧。此行是回国的第一程。由于有1963年欧洲之行的“预演”，李宗仁这次离美几乎没有受到美国情报系统的怀疑而很快获准了。直到这时，许多人才深深体会到周恩来1963年要李宗仁先到欧洲商谈的良苦用心和深远意义。

程思远前往欧洲迎接李宗仁。临行前，周恩来请他立即赴京一商。程思远因办手续耽搁了时间。6月18日，程思远赶到北京的当天，周恩来刚好离京出访。中央统战部的同志接待了程思远，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留下的意见：第一，送程思远一笔去欧洲的旅费，同时也带给李宗仁一笔旅费；第二，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统战部这几个同志商量，他们可代总理作答复；第三，要程思远立即返港赴欧迎接李宗仁回国。周恩来特别叮嘱：在苏黎世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中国大使馆帮助，那里已做了安排。

周恩来出访回国后，不顾旅途劳顿，立即着手迎接李宗仁回国。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在民主人士中，有一些人不理解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大气力来争取李宗仁，因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就在李宗仁飞离苏黎世的当天，周恩来召集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及桂系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借此机会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介绍了准备迎接李宗仁回国的情况。这时，有人提出，“李会不会转飞台湾？”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李宗仁不会去台湾。”他说：“李宗仁这次回来是自觉的，过去他就提出要回来，我怕他回来生活过不惯，劝他以后回来。毛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嘛。”

周恩来提出，李宗仁到京时，希望大家都去迎接。谈到这里，他转向张

治中说：“这次我是否去迎接还未报中央，你回来时，我没有去接，因为你先去奉化才来北平。这次我如果去接李宗仁，你可能会意见吧？”张治中连忙解释：“总理愿意接就去，我没有意见。”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大家说：“这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对李宗仁的安排要商量，你们同他如何相处，如何影响他，也请议论议论。我工作虽多，也要抽时间见他。你们工作不多，可同他多谈谈。”

由于周恩来的耐心工作，统一了民主人士中的不同认识。一些人十分感慨地说：无论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还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推翻的统治者不是送上断头台，就是送上绞刑架，只有在新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奇迹。

六

7月13日，李宗仁经雅典、贝鲁特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奇。

为确保李宗仁途中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亲自接待、陪送李宗仁回国。他指示丁国任一定要取得巴方的支持。

当李宗仁的座机抵达卡拉奇机场时，巴方出动警车驶入机场停机坪，军警登机进入机舱直接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接入警车安全送到中国驻巴使馆。

7月17日深夜，在丁国任陪同下，李宗仁程思远一行登上巴航公司的一架飞机飞往广州，开始了回归祖国的最后一程。

就在这天深夜，已到上海迎候的周恩来接到情报：台湾方面已获悉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在缅甸边境某地区布置了截击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李宗仁的座机。

周恩来彻夜未眠，静候在电话机旁。当接到报告：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已平安进入我国境内后，他才上床去休息。

7月18日，在上海虹桥机场出现了本文开始的一幕。

7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内部俱乐部会见了李宗仁、程思远一行。周恩来重申了“来去自由”的原则，特别强调了李宗仁与“四种关系”。谈到美国时，周恩来说：“经过抗美援朝，美国已经知道中国的力量。”他详细回顾了中美十年谈判的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从不拿原则作交易，这一点，连陈诚也不能不为之动容。据台湾方面有资料记载，陈诚去世前遗嘱中没有再提“反攻（大陆）”和“反共”，这一现象或许与中共在对美问题上表现出的民族原则与立场是分不开的。关于蒋介石，周恩来说：根据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接触，“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义待人”，然而“蒋虽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霸占去好。”劝李宗仁“对台湾问题不要干预”。至于第三势力，周恩来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中美关系还不是解决的时机，他希望李宗仁认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不要再抱幻想。

这是周恩来同李宗仁第一次长谈。谈话间没有更多的客套，却句句充满了真诚。程思远后来说：“周恩来关心的不是李宗仁个人，而是祖国的统一大业。李先生的归来也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对他个人的争取，而是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

程思远的结论是正确的。1969年，李宗仁去世前，在病榻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短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

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称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这封信包含了周恩来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全部意义。

（廖心文）

周恩来与末代皇族

爱新觉罗家族，是一个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家族。在这个家族里，笼罩过一段不光彩的阴霾，也出现过人世间的悲剧角逐；他们脱胎换骨，自食其力，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公民。

过去，现在；往日，今天，末代皇族成了一段历史的缩影。而这一段历史，同中国人民景仰的周恩来总理紧紧相连。

周恩来说：“你们是新人了，不是皇帝、总司令了，现在要以朋友相待。”

1959年12月9日，特赦后的第5天，溥仪来到北京，按照有关部门的安排，住进了崇内旅馆。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批特赦的10位国民党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陈长捷、曾扩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1个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由总理秘书负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几天过后，溥仪等人接到通知：12月14日下午，有首长接见，不要外出。

那天下午一时许，一辆大轿车接走了溥仪、杜聿明等11人，轿车驶进了中南海。

会客厅里，一位干部和蔼地向大家宣布：“今天是周恩来总理接见你们！”这太突如其来了，大家都不禁“啊”了一声。

周恩来与陈毅、习仲勋两位副总理先后进来了，后面还有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他们一齐来到了会客厅。

11位刚刚获得公民身份的“战犯”笔直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走到他们的面前依次握手，高声说：“你们是当标兵的，要经得起考验。”

周恩来坐下了，他挥手示意请大家也坐下，他看看拘谨无措的溥仪，笑着问起了满族的服饰和礼节。陈毅也打趣地冲着溥仪说：“我早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哩。”

杜聿明惭愧地对周恩来说：“黄埔军校时我是您的学生，可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周恩来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这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笑了。

一时间，会客厅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如家人一般，几个人刚才还很紧张的心情，顿然消失殆尽。

周恩来注视着大家，他习惯地扫了一下四周，操着带有淮安乡音的普通话，开始了严肃的讲话：“你们出来几天了，有问题要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谈。”“民族立场，人民立场，也就是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民族利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120年，中国人民翻身的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

周恩来说到这儿，看了看坐在身边的溥仪：“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嘛，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转而又向大家说：“国民党统治20多年，它没有搞好，今天6亿5千万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

“现在是你们的新生开始，今天是以新人的资格来相见的。”周恩来加重语气说：“你们是新人了，不是皇帝、总司令了，现在要以朋友相待。”

听着周恩来的话，溥仪心里暖烘烘的，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中国人了，堂堂正正的人了，他全神贯注地继续聆听着：

“不劳动不得食，有机会锻炼，对你们说来还有必要。……劳动观点以后不易巩固，大家要注意。10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10年生活好的一面，有了一定的劳动观点、集体观点，今后不要抛掉。”

周恩来向在座的11位发问：你们今后都准备干些什么工作呢？有人回答了，他点点头。又点名问到溥仪，溥仪说：“我要求派到工厂去当工人。”

周恩来脸上露出笑容：“还是力所能及吧，我看你到北京植物园工作比较好。”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实习。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开始了《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写作。第二年3月，他正式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从事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文史资料的编审、整理工作。

阳光明媚的那一天—1960年12月7日，溥杰获释了。他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踏上了南返的归途。

北京。家族团聚，欣喜未艾。溥仪、溥杰接到了周恩来要接见他兄弟俩的消息。

溥杰惊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他心里沉甸甸的。“皇上”哥哥却笑眯了眼，有些矜持地说：“我在头一次去见总理的时候，心情也是这样紧张。”他划了根火柴，抽着一支烟，又对“御弟”说：“总理无论对谁都是平易近人的，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你见了以后，就自然会感受到的。”

溥杰将信将疑，不管溥仪怎么说，他仍旧忐忑不安。

在周恩来的会客室里，溥杰忐忑不安。

周恩来进来了，溥仪站起来，溥杰也赶忙站了起来。

周恩来同他们边握手边说：“你们现在自由了，可以坐电车、汽车，我还没有你们自由呢！”他指着自身着的浅绛色便服说：“你们看，我费了好大的劲挤上电车，才到百货大楼买到这件衣服。”

溥仪、溥杰一听都乐了，溥杰悬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共产党是赦人不赦罪。他指着溥仪：“你在童年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的那一段，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见溥仪点点头，周恩来又转脸问溥杰：“你希望将来做什么工作？”

溥杰一下子愣了，他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太多，虽说夜晚在床上也曾浮想联翩，可着实还没有一个准头。他不知怎么，像是钟表上了发条一样，心里突突紧绷起来。他像军人似的站起来，硬梆梆地说：“总理，我愿意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周恩来笑了，溥仪也笑了。溥杰被笑得有点莫名其妙，难道自己回答错了吗？周恩来说：“这我知道。你说心里话，你真的希望将来做什么工作？”

溥杰羞极了，可周恩来的话又使他心里热呼呼的。他低声回答说，“我平生最喜爱的是文艺方面的工作。”

是的，溥杰自小就性格活泼，由于受过西方教育的影响，他几次都曾想遁出红墙，出洋就教，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却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编演过许多剧本，有现代的《从黑暗走向光明》、《侵略者的失败》，也有古代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他说过自编的相声，也高声朗诵过自己写的诗歌。

周恩来点了点头，对他说：“你还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好”。

不久，溥杰分配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溥仪一起担任了文史专员。

“论职务，那不过是‘弼马温’的官职，但就是这样的差事，我也感到十分荣幸，”

载涛说，“因为这也算是对人民的一点贡献。”

载涛是爱新觉罗家族的长辈，他与溥仪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有人说，一则因为他是皇叔，为宗室近亲；二则由于当时溥仪之父载沣政治上缺乏识见，因而不少事情都要仰仗载涛周旋。当时，载涛被委为陆军大臣，参与军机，他有一个酷好，喜欢骑术，凡是有关马的知识他均有特殊兴趣，在军马改良、繁育、驯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新中国成立以后，载涛赋闲在家。与他早在北京军咨府就有来往、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李济深前来造访。李济深熟悉载涛，知道他在晚清宫廷的地位、作用，也了解载涛“平民化”后思想发生的变化，于是向周恩来建议，邀请载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

1950年6月14日，一届政协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遇到了载涛，他既高兴而又颇有歉意地说：“载涛先生，首届全国政协会议没请您参加，我把您这位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

载涛不知所措：我算什么呢？不就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吗？可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却对我如此敬重。他语塞了。

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微笑着对载涛说，大家都在为新中国出谋献策，你也提一个议案吧。

周恩来离开了。载涛停立在原地，他不知怎么做才能回答总理，他不相信自己能够提出什么对国家建设有价值的议案。

这是一块心病。载涛找到了李济深和原国民党著名将领蒋光鼐，他问：我该怎么办呢？

李济深、蒋光鼐对视了一下，双目传神，两人不约而同地说：“发挥你的专长，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

载涛如释重负，他深深感谢两位朋友的启发，要说马，自己轻车熟路，再内行不过了。当晚载涛就认真地作了一番思考，拟就了一份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议案。

议案送到李济深、蒋光鼐手中，博得一致称赞。载涛又邀请他们同署，两人愉快地答应了。这份议案是这么写的：

案由：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案

理由：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甚多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须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讲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如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提案人：载涛

副署人：李济深 蒋光鼐

议案送到了周恩来手中，他很快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批阅了这份议案，他对载涛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广博的军马知识十分赞赏，亲自提议任命载涛为军委总后勤部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把这个议案转给了朱德总司令。

载涛上任了，他来到了西北军马场、东北军马场，他看到膘肥体壮的军马，兴致勃勃，拿起卷尺测量军马的高度、长度。他测观一匹马的步度，便毫无思索地说：“这是阿拉伯良种马。”他看到地上一匹马的蹄印又说：“这是安格鲁诺尔曼的马种。”他还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法国良马的特征……在牡丹江军马场，载涛还受到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他欣然命笔，写下了“牧马山庄”4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载涛住宅门首的匾额上，也有4个大字：“平淡天真”，落款是载涛手书，有人问他：“您是不是有隐居之意？”载涛直率坦诚地说：“是的，解放后我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载涛每逢说到此时，都要抬高他的声音：“说句笑话，任命我为马政局顾问，论职务，那不过是‘弼马温’的官职，但就是这样的差事，我也感到十分荣幸，因为这也算是人民的一点贡献！”嵯峨浩终于回来了。“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50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凡是和末代皇族成员接触过的人们，只要微微留心，就会发现，在他们住屋的墙上都挂有一幅周恩来和他们会见的照片。提起这张1962年6月拍摄的照片，溥杰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之情。

那一天，溥杰接待了我，专门取下这张合影，我仔细端详，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共有35人之多。

我把目光移到照片的第一排，溥杰用满口的北京腔，咬字清晰地一个个念着：溥仪，老舍，载涛，嵯峨尚子，周总理，嵯峨浩，我。

嵯峨尚子？嵯峨浩？这不是日本人的名字吗？我再看过去，呵，不错，嵯峨尚子，穿着一身整齐的日本和服，而嵯峨浩，却是紧身的旗袍。

溥杰敏锐地发现了我瞳孔里散出的诧异，连忙取来一份资料，让我仔细阅读去。

那是一份早年的报纸，微微呈现黄色，上面跳出一行醒目的标题：《末代皇帝日籍弟妇偕母女自日过港返北京与夫团聚》。下面写着：

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妇、溥杰的日籍妻子爱新觉罗浩（闺名嵯峨浩），昨午奉母携女自东京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飞来香港，将于今天乘车赴广州，和她丈夫共返北京团聚。

她看来相当谦厚，谈话时始终保持谦逊甚至拘谨的笑容，语调温柔。她穿着一袭银色绣黑碎花的织锦旗袍，外罩同样的织锦短外套。

爱新觉罗浩说，大夫和她别后，一直有信给她。她相信他正在广州等候她回来，说到这里，她笑了——这时她笑得不像矜持，显然她心里是甜丝丝的。

这是一段真实而曲折的故事。

火车向广州开来。

嵯峨浩陷入了一种不可梳理的困扰之中：

1945年8月12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第三天，伪满傀儡政府分崩离析，嵯峨浩随同皇室家族逃离长春“皇宫”，跑到通化大栗子沟。狼狈万分的溥仪、溥杰双双成了苏军的俘虏，而她们，四处流离，几经辗转，嵯峨浩最后被遣返日本……

广州，身材瘦小的溥杰正引颈相望，他不知分离10余载的妻子现在怎

样，他想起了3个月前……

1961年除夕之夜，周恩来以他自己的名义，邀请皇室家族成员到他家里作客，高兴地以中国北方迎新年的传统，用饺子款待他们。

饭后，周恩来请大家来到会客室，斟上了热腾腾的碧螺春茶。他微笑着说：“今天特意请你们来，也是同你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以你们的名义，邀请溥杰的日本爱人回中国来？”这句话，一下子暖热了皇室家族成员的心。自从溥杰获释后，家族里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溥仪，是坚决的反对者，提起日本，他心中有无形的烈火，他要溥杰与妻子一刀两断。

溥杰，他留连的不仅是和妻子的绵绵情长，他凭自己的良心，深深内疚，妻子为自己受尽苦楚，在日本拉扯大了两个女儿，而流逝了16年宝贵的青春时光。

意见如此分歧，现在该怎样解决，怎样回答周恩来呢？碧螺春茶冒着缕缕清香，座位上的家族成员一个看一个，面面相觑，沉默无言。几个人借着上厕所，悄悄离席了。周恩来叫住了他们，幽默地说：你们都去，我也会。

“轰”的一声，大家乐了。

周恩来问了溥仪，又问了弟弟金友之。金友之心直口快：“这是中央的关怀，我想嫂子回来了，大家一定会做她的工作，帮助她进步。”周恩来又一一问了溥仪的六妹夫王武贤、七妹金志坚，还有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周恩来缓缓地说：“我看过嵯峨浩给溥杰的信，她有做中国公民的愿望。过去，她入过伪满的‘国籍’，伪满是让我们解放的，所以我们可以批准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一直闷闷向隅的溥杰，抬起了头，他万万没有想到，周恩来说出了这些话。

他泪水纵横。

周恩来继续向在座的人说：“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试试嘛，让她回来，如果住的不习惯，不舒服，要回去，也没有关系。”

溥杰沉浸在后来的幸福中。他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给远方的妻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请她带着女儿，回来看看。同时，由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亲自出面，邀请溥仪、溥杰的三妹金蕊秀、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金韞馨、五妹夫万嘉熙5人，给嵯峨浩用日文写了一封代表家族的邀请信。

广州车站上，嵯峨浩正在向溥杰扑来，他们重新聚首了！岳母嵯峨尚子的眼眶里滚动着泪珠，女儿嫣生叫着“爸爸！”他们百感交集。

时过境迁，溥杰谈起来还是那样激动，他不时摘下眼镜，用手绢拭着眼泪。他对我说，当我和浩会面时，溥仪也是情感纷坛，他之所以不同意浩子回来，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溥杰找出了《我的前半生》，指着上面的一段记载说，这不，上边都有呢。

溥仪在他的一篇回忆中写道：溥杰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1935年冬天起在长春伪禁卫队步兵团当排长。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鼓吹让他和日本女性结婚。我和他对日本人的企图也有所察觉。有一天，我对弟弟讲：“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结了婚，往后可不好办了。”

溥仪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包办溥杰的婚姻和觊觎爱新觉罗的“皇位”，很快就把“皇后”婉容的一位亲戚找来，打算撮合溥杰和他的女儿结婚。不料伪满皇室“御用挂”吉冈闻讯后公开干涉“御弟”的婚事。后来，日本方面又由“九一八事变”的罪魁本庄繁和陆军大臣南次郎直接插手，为溥杰选定了对象，这就是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

婚后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即起草了《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溥仪没有子嗣，可见，溥杰的这桩婚事，不过是为培养有日本血统的继承人，耍了一个“政略婚姻”的手腕。

这在溥仪的思想深处，埋下了对日本人的恨。

然而不管怎样，嵯峨浩重返中国，溥仪到底明白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自己也知道关心弟媳妇了。感情融洽，交往随之十分频繁。

嵯峨浩时隔16年回到中国，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世界，她显得陌生；日本的宣传使她对中国不甚了了。6月，周恩来接见时，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心理。

周恩来谈起了中国一出京剧《平贵别窑》的故事，对她说：“王宝钏与薛平贵等了18年才相会，你等了溥杰16年。薛平贵后来当了皇帝忘了本，溥杰现在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嵯峨浩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寓意，她不时地点点头。

接下来，周恩来意外地提到了溥杰夫妇大女儿慧生的一件事。

溥杰从苏联解到抚顺管理所不久，慧生就背着母亲和全家人，用中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她和父亲通信。周恩来亲自阅办了这件事。从此溥杰和他亲属之间鱼雁频传，成为伪满战犯中的第一例。周恩来说：“我很喜欢这样勇敢的女孩子，青年人是需要有勇气的。”

这件事，连溥杰和嵯峨浩两人都蒙在鼓里，他们几年频频通信，却不知晓是周恩来和他们女儿联系的结果。溥杰哽咽着，而嵯峨浩则流下了更多的泪水。

他们无法启口告诉周恩来，他们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聪明貌美的慧生，已于4年前离开了人世。

慧生生活在战后的日本，在东京的贵族学校读书。她结识了同学大久保，相互爱慕。溥杰在和她通信中知道了此事，只是含混地告诉她凡事要多听听妈妈的意见。谁料，妈妈封建思想流毒太深，坚持要女儿等将来有机会回到中国，找一个满族青年结婚，以延续爱新觉罗家族的香火。终因双方家族的反对，一场悲剧出现了。

1957年12月末，在东京附近伊豆岛天城山的一个幽谷里，这一对恋人双双扣动扳机，殉情身亡，成了轰动日本四岛的一大新闻。

溥杰夫妇将永生以之为憾。嵯峨浩告诉周恩来，她已决定留在中国，也想把小女儿孀生留下来。

可是，孀生从小住在日本姥姥家，她仍想回日本去。

周恩来听了后，亲切地对孀生说：“你母亲是个日本人，和你父亲结了婚。你是个中国人，也可以同日本人结婚嘛！但是，你姐姐去世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你应该常来看望他们。我许可你常来常往。”

孀生默默地往肚里咽着泪水，告别之际，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跑到

周恩来跟前，鞠了一大躬，深情地说：“我从内心里尊敬您！”

1978年3月，嫣生终于和丈夫福永健治一起，带着4个孩子回国探亲。她带来了一束花，请有关部门一定要转交给邓颖超，以表达她对周恩来的怀念。

溥杰的叙述，深深拨动着我的心弦。溥杰一家的团聚，难道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团聚吗？不是，决不是。

溥杰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周恩来专门请我们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他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50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10多年后，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还有什么家庭之乐吗？”溥仪自悲地说。事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周恩来都在关心他的婚姻大事。

溥杰全家团聚了，溥仪却仍是孤家寡人。他先后有过4个妻子：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可是，皇后婉容和“贵人”谭玉龄分别在1946年、1942年病故；妃子文绣和“贵人”李玉琴也分别于1931年和1956年与他离婚。她们都没有留下子女。

“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还有什么家庭之乐吗？”溥仪怀疑地问自己。可是溥仪没想到，就在溥杰全家团聚半年后，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了他的婚事。

1962年的正月初二，毛泽东会见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李维汉、陈叔通、沈钧儒、章士钊等许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溥仪。毛泽东谈笑风生，问了溥仪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还特地邀请他进自己的卧室照了相。

毛泽东对溥仪说，你现在是单身，我可以当媒人，给你找个对象嘛。

溥仪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吱吱唔唔，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然而，毛泽东的话果真起了推动作用。这年5月1日，溥仪结婚了。北京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成了他的第5任妻子。

1963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溥仪和李淑贤。他热情地向溥仪道喜：“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

周恩来将目光落在李淑贤身上时，诙谐地向溥仪说：“你娶了我们杭州姑娘罗！”

周恩来和溥仪夫妇合影留念。他勉励李淑贤“要注意学习，好好工作”。

溥仪感谢毛泽东，感谢周恩来，可是他当时还不知道，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作过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叫《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这一段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毛泽东的话，经过实践证明是十分英明的。周恩来也正是站在这一历史的高度，做出了许多使后人惊叹的事来。

我们将过去的那一页翻开。就在毛泽东讲话之时，1956年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载涛作为人民代表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毛泽东听后伸过自己的手，用他那地道的湖南口音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

毛泽东的话，为载涛见到溥仪创造了条件，也正是这次会见，使末代皇

族的许多人受到了教益。

金韞馨和她的丈夫万嘉熙，一个是饭馆的会计，一个是编译社的翻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着……

载涛带着毛泽东的话，急匆匆地赶到溥仪的三妹金蕊秀和五妹金韞馨的家里，她们听完后，都感动得哭了。当时，她们的丈夫郭布罗润麒、万嘉熙与溥仪、溥杰一样，也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她们既高兴又手足无措，该给自己的亲人捎点什么呢？想归想，仔细盘算起来，经济上不免显得拮据。

但是，周恩来已经为他们考虑到了：这次行程，周恩来和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作了安排：去东北，两个姐妹需要棉袄，国家为她们每人制做一套新的；路费，让她们出有一定困难，国家全包下；再有，路途生疏，有关单位特地指派专人，负责一路陪同，直至送到抚顺。

载涛、金蕊秀、金韞馨一行几人到了抚顺，见到了溥仪等人，他们说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溥仪的良心终于受到了莫大的谴责：“没想到你们的身体这样好，人人都能自食其力了。”五格格（注：清代皇族的女儿称格格）金韞馨，站在丈夫面前。万嘉熙用惊异的目光瞧着她，问：“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

五格格回答：“那有什么希奇？这不是比什么都不会做好吗？”丈夫的惊异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前，像五格格这样的人，就连自己也认为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是羞耻的。平日只会打扮，搓麻将，游玩，只会按着宫廷礼仪行事，还有就是会支使仆妇和使女。可是，解放后仅仅几年时间，她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五格格对丈夫说，她是1956年就业的。当时金韞馨去劳动部门登记，一开始，分配的人说，可以当壮工。这一下使她犯了愁。论力气，自己哪有啊？当保姆，过去是别人侍候自己，从来也不会啊。后来，劳动部门根据她的情况，将她安排到饮食业的一个饭馆工作。那个饭馆在西直门，离家较远，她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去上班。

路虽然远点，可金韞馨感到了劳动的欢愉，她自觉身体比过去强壮了，有时晚上干到十一二点，第二天还接着干，也不觉得有什么疲累。后来领导上又让她当了会计，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家族时，他一个个地问了生活、工作情况，也问到了金韞馨：

“你现在在哪？”

“我在义和饭馆。”

“哦，你能做这个工作吗？”

“能。”

“那很不错嘛！”

大伙听了周恩来的话都会意地乐了。

金韞馨的丈夫万嘉熙是1957年释放的，回家后，他来到北京编译社从事翻译工作。10年内乱中他去世了。当时，在极左路线下，有人说他虽然免于起诉，可到底在战犯管理所呆过，有人说他有一个反动的老子万绳栻，他当过“辫子军”张勋的参谋长……万嘉熙有口说不清，有理辩不明，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开了人间。他走了，可他在战犯管理所写下过许多日记，那上面工工整整的记载，像是他心底无言的诉说：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是一九五七年的第一天，在去年年末写的学习总结中，最后曾说：“我将会念念不忘自己的罪恶，念念不忘祖国对我天高地厚的恩情，把认罪作为我终身的事情。”

从今天起我将实践下去。今日所方给我们吃的饺子，又给我们很多糖果，晚间我们演出了话剧《侵略者的失败》和《从黑暗走向光明》。在《侵略者的失败》中我扮演英国的工党议员登司，在《从黑暗走向光明》中我担任幕后朗诵。《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最后一幕，演出者和观众中有不少人声泪俱下。这本不是演戏，而是说明亲身感受的事实。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星期一）

接到姐姐二月五日来信，……说到蕊洁（即金韞馨）近况……

一个习惯于寄生生活的封建王朝的格格，今天能心安理得地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乃是一个巨大转变，只有生在现今的新时代才能如此。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的进步，更增加我争取进步的力量。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星期四）

午前崔仁杰中尉找我谈话，他说：“从你这许多年来的表现上已得到了政府对你的信任。党和政府对任何一个愿意改恶从善的人，都不会歧视的，希望你回到社会上后，继续努力改造自己。”我当场表示了自己一定这么做，争取立功赎罪！

离开抚顺管理所，万嘉熙努力从事翻译工作，他将日记继续记了下去。下面三则足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精神世界和工作态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日）

今日结算我本月工作的情况如次：

1. 译微生物：48500 字；
 2. 译粮食土豆：27500 字；
 3. 译日本历史：26000 字；
- 共 102000 字。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二日（星期日）早洗衣物，到社整理《养猪大全》试稿，午后找蕊洁同返家，略事休息后又到社译了三千二百字，夜十时许归。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

上午到平安医院看病，孙大夫让我休息两天，我因工作忙，没有休息。译《照像测量》二千字。

这不能不说明问题，万嘉熙在认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他的确是努力去做的。正像金韞馨向我说过的一句话：“周恩来总理是我们的恩人，老万他只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来报答。”

她过去是娇贵的格格，他过去是“残渣余孽”，可现在，夫妇两人都成了政协委员。周恩来对她说：“咱们是同事呵！”

她叫金蕊秀，在溥仪 7 个妹妹中排行老三，最受溥仪的钟爱。她有文化，在姐妹中长得最标致：水汪汪的大眼，高高的鼻梁，小时候就开始向溥仪撒娇、讨赏，是数得着的典型的“皇室公主”。她在日本前前后后生活过 6 年，因为是“满洲国”皇帝的妹妹，也享受了无比的荣华富贵：20 岁左右被捧为日本东洋妇人会的名誉会长，后又经日驻华公使夫人高尾宫子的介绍，给日本天皇裕仁弟弟三笠宫的夫人教中文，参与了上层生活。那时，只要三格格一个电话，一切需要享用的东西就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她过得太舒服了，几乎没有一点需要用脑用手的地方。她从东京曾给溥仪写过这么一封信：“我

现在坐在屋里，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仆在窗外浇花，小狗瞪着眼珠蹲着，看着一匣糖果，……实在没有词儿了。”这种空虚、贫乏、无聊的心境，连当时的“皇上”溥仪看过都吃了一惊。

日本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覆没，金蕊秀随傅仪由长春逃到临江，后来又通化。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来不及赶回北京。当时，财产没有了，她唯恐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目，便摆地摊，售香烟，卖旧衣度日。这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也上过不法商人的当，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后来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才干 1949 年回到北京，参加了街道工作。1956 年当选为东城区政协委员。

“我的变化是有过程的。在东京时，因为我的容貌和身份，我的照片常常成了日本报刊上的新闻，可是我当时还沾沾自喜。”

是新社会的生活慢慢驱跑了金蕊秀身上的臭味，社会实践逐渐使她懂得了不少道理。原先，她对获得解放的百姓是既恨且怕的。她说，在通化时，有一天，民兵把她叫到群众大会上去交代罪行，她吓坏了，浑身直哆嗦，以为这样一来，她这个汉奸亲属要完蛋了，便哀求说，你们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并主动向人们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来的人多极了。我交代完了，人们并没打我，骂我，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我的情况，作了从轻发落。我这才知道，共产党是最讲政策的，老百姓是讲道理的。

“那只是一个开端，周总理对我们家族政治上的关心，是促使我思想上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金蕊秀说起话来慢悠悠的。可是当她一讲起与周恩来有关的事时，就显得异常激动起来。那是溥仪出来后，周恩来第一次接见皇室家族全体成员，亲切地问她：“你是老三吧？”

“是的，我行三。”金蕊秀小心翼翼地回答。

周恩来又问：“你们东城区政协有多少委员？”

“有 300 多人。”

周恩来再问：“男委员有多少人？女委员有多少人？”

这一下把金蕊秀问住了。她实在想不起来，面孔涨得通红，慌忙说：“男委员比女委员人数多。”

周恩来看出了她心里的紧张，笑着对她说：“我在全国政协，你在区政协，咱们是同事啊！”

这一句话，像一股暖流，立时贯通了金蕊秀的全身，使她深深感到，党和国家是不歧视改恶从善的人的。

于是，她努力地工作着，积极参加政协的各项活动。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她还通过电台，向台湾同胞发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我们时常从电视里看到台湾的旖旎风光，时常听到《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等校园歌曲，我们感到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感人。我们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割不断的！我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能早日和祖国亲人欢聚，我在这个节日里衷心地祝愿台湾姐妹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金蕊秀的丈夫郭布罗润麒，今年已 70 多岁了，仍照样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他生性豪爽，爱开玩笑，对他自己在日本军校的经历毫不回避，他爽快地大声说：“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可以说是满清的‘残渣余孽’为伪满

洲国的复辟效劳吧！”

在日本陆军大学，郭布罗润麒学的是驾驶飞机。一次，他的练习机爬进了云层，地面乌蒙，什么也看不清楚，他胆颤心惊，紧张地握着操纵杆，一点不敢撒手。最后，好不容易降落下来。停机一看，乘坐在机上的溥杰等人早已面色焦黄，一个个赤脚提靴，狼狈不堪。原来，飞机倾来倒去，他们早已翻肠倒肚，呕吐不止，没有地方吐，只得把靴子脱下，全部吐进了靴筒。

日本留学毕业后，他回到伪满，担任了中校军官，伪满垮台后，先是和溥仪在一起，旋又一同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4月，人民政府根据他的表现，作了宽大处理，免于起诉，释放回京，分配到北京编译社工作。

现在，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前几年，六届全国政协开会，将他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郭布罗润麒喜欢画画，还特别爱好中医针灸。早在前几年，他就钻研针灸对人的交感神经的作用，颇有一些心得，治愈了一些病人，或减轻了他们的病痛。

在社会工作方面，郭布罗润麒也是一个热心者，他在家中办起日语讲习班，墙上挂满了日程表、字母音标表、学习情况表，他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春夏秋冬，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水平，分成初、中、高三组，有些中间插班者，他还负责“单独教练”。

几年过去了，经过辛勤劳动，种子结出了果实：有的学生过去是工人、售货员，是待业青年，现在，有的选送去日本进修，有的是大学日语专科的佼佼者，有的成为专职的翻译家。

这是金蕊秀和郭布罗润麒两位政协委员的骄傲，也是整个末代皇族的骄傲。

他们都有着特殊的经历，又都承受着共产党的恩泽。只要一提起周恩来，他们的眼圈就会湿润。

这是金欣如，溥仪的二妹。

前几年她这样打扮着：灰布中式褂子，下身一条蓝色布裤。齐耳短发，和一般街道妇女一样，一根卡子别在耳后。

她简朴得叫人看见她，决不会相信她曾经是一位“皇姑”。

那时，王府里花钱如流水，要吃的、喝的，有仆人端到跟前，要穿的，府里的裁缝定期做好了送来，至于钱，那是不屑一提的，溥杰就因为打听一样东西值多少钱，竟被呵斥为“有失体统”。金欣如从没想过钱是怎么来的。

1932年，由溥仪定亲，她嫁给了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孙子、工程师郑广元，才有幸飞出了那个不用寻食的“鸟笼”，学习了自己喜好的医学知识。

1959年，街道上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兴办服务事业。金欣如报了名，被分配去办托儿所。新开张的托儿所一无所有，只有人家送来的3个小孩。她从家里拿来方桌、木凳、小人书，开始了她的工作。

第一次发工资了，虽然只有10元钱，金欣如却激动得不得了，这是她在世界上第一次为别人服务，第一次拿到自己挣来的钱！

新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开了。以后她又调到碾儿胡同幼儿园工作，并当了那里的负责人。幼儿园里有五六十个工人的子女，她感到他们十分可爱，于是，她想方设法地把工作搞好：煮粥、洗衣服、洗澡、刷鞋，她样样都干；待孩子睡熟了，她又静静地坐在床边……

孩子们一批批长大了，他们见到金欣如，都亲热地称她“金老师”。她宛如隔世重生了。

这是金韞娴，溥仪的四妹，她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贤惠而平常。

她没有经历过大栗子沟的逃难生活，却经历了其他格格从未经历过的另一种生活。她的丈夫赵琪璠从抗战后就很少回家，1949年便杳无音讯了。这在当时，无论从个人来讲，从社会生活来讲，都成为一种莫大的精神负担。

她领着两个孩子，靠父亲卖房分得的一点钱维持生活。她身体很不好，闹过几次大病，几乎丧生。生活需要有出路，活命需要有钱粮，孤儿寡母面临着说不尽的苦楚。

周恩来，又是周恩来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亲自过问，让金韞娴进故宫博物院当了一名工人。

红墙之内，是末代皇族每个成员都熟悉的地方，在这里当一名普通的工人，金韞娴别提多高兴了。

可是，精神上的痛苦依然与日俱增，赵琪璠究竟在哪里呢？

随着国家的开放，中华民族的国度不再是闭塞的了。前几年，溥杰通过有关渠道，终于知道妹夫在台湾的信息，于是有了书信的往来。

金韞娴多高兴呵。1982年，她的女儿陪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去日本治病，赵琪璠听到这一消息，毅然只身飞到日本，随即提出回北京定居。

他的要求得到了政府批准，1982年4月26日，他从空中飞回来了！

那一天，他的心里像家族其他伙伴特赦之初一样，也是那么紧张。他从报上看到北京正上演《秋瑾》这部电影，心里一直发惊，政府还会不会算这笔历史的旧帐呢？

赵琪璠的父亲贵福，是杀害秋瑾的绍兴知府。当年他自知罪孽，惶惶不可终日。清王朝覆没后，他远离江南，隐名埋姓。有人说，他曾请人向秋瑾眷属转达过自己的口信：深悔当年孟浪，杀秋瑾是皇上意旨，不是自己力所能及。他说，现在家中供有佛堂，上供秋瑾遗像，每天朝夕礼拜，忏悔前非，何况风烛残年，只求与秋家解冤释怨。后来，贵福一命呜呼。

这段往事在赵琪璠的脑中深深留下，台湾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谁人都能迫害，何况我家之父与革命先烈有血海深仇呢？

赵琪璠苦恼怅然，溥杰知道了，他大笑起来：“共产党怎么样？我不用多说，你呆一段，亲身体会体验就知道了。”

不久，赵琪璠受到北京市政府领导的接见，他的家由两间破矮平房迁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他的专长得到了发挥，安排为市民委委员，后来又出任北京市的政协委员。

这一切，使赵琪璠信服了。

这是金志坚，溥仪的七妹。她比起几位姐姐来，要幸运些。

解放后，金志坚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不久，她与北京四中的乔志宏自由恋爱结婚。以前她什么事都不会做，乔志宏只让她干些淘米洗菜、扫地擦桌子之类的简单活，可她连这些简单活也干不好，淘米时有许多米粒随着水跑了，切菜时常常把手切出口子。丈夫心疼了，可她坚持从头学起，决不让别人代替。

在学校，金志坚也是这么一种韧性，她带的班十分出色，还搞了许多业余活动。后来，她当上了第二二七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位姐姐对她都十分羡慕。

金志坚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可惜她和自己的姐姐、姐夫一样，年龄大了，已到了退休的时候。但是，她还继续从事着崇文区政协常委的工作，在那里，她仍然大有可为。

金友之，也就是溥仪的弟弟溥任。今年整整 70 岁。

“人活七十古来稀”，在他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位记者这么写道：比起他的哥哥溥仪、溥杰，他还“嫩”着哪！

除了他身体好，显得年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清朝政府垮台时，他还没降临人世呢。这是玩笑话。可金友之却是个很认真的人。他不肯言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解放以后，醇亲王府的房子交给了政府，兄弟姐妹分了家，各人买了自己的房子，分开住了。”

“我住的房子多一些，怪烦的，我就想，办个竞业学校吧。于是我当了个校长，有时也代几堂课。不过，学校在的后海那一片，全是贫民户，学校办的全是赔钱事。后来，公立学校越来越多，私立学校办不下去了，1956 年我就把学校交给了国家。”

金友之谈话实诚得很。

“后来在西什库小学、西板桥小学、厂桥小学教过课，也于过财务；这些年岁数大了，学校照顾我，让我管管资料室，给学生、老师上上书法课。”

厂桥小学里，我见过金友之，他仍然是一板一眼，话里没有什么可让你激动的。

其实，金友之做了许多事，他在学校干了 40 年，早已桃李满天下！去年，北京市召开七届一次政协会，他出任了市政协委员，可他还是淡淡的一句话：

“世上的工作各式各样，敢情还是当老师好。”

周恩来的目光没有停留在末代皇族这一代的身上，他看到了末代皇族的后一代。

在爱新觉罗的家族里，有许多位知名的画家，溥雪斋，溥儁，其中还有溥仪的六妹金韞娱和她的丈夫王武贤。

金韞娱 1920 年出生，曾随父亲载沣在天津隐居 20 年之久，由于自小喜好书画，便延师学习绘画和诗文。

1945 年，她和擅长画兰花的王武贤成婚。解放后，两人的书画多次参加全国展览，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画院工作。

全国解放第 2 年，他们的儿子王昭出生了。家庭的熏陶使他迷上了绘画，10 岁就有了点小名气。每年“六一儿童节”前，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都要向王昭索画。他的作品先后被送到法国、日本、巴基斯坦、索马里等 10 多个国家展览。

1961 年，周恩来接见溥仪、溥杰那天，金韞娱夫妇也去了。当时在保卫儿童委员会任职的邓颖超同志，向周恩来介绍了小画家王昭的情况。周恩来高兴地对金韞娱夫妇说：“你们家学渊远呵，有画画的传统。从小就注意培养孩子，很好嘛，下次把你们那个小画家也带来。”事后，邓颖超亲自到荣宝斋买了笔洗，颜料和宣纸，派周恩来的秘书给王昭送去。

王昭的画技在突飞猛进，1965 年儿童节，他创作的大型国画《我们就是向阳花、太阳就是共产党》，参加了第二年全国少年儿童画展，后被《中学生》杂志转载。《人民日报》在报道展览会消息时，还特别提到“小画家”和这幅作品。

10年内乱开始后，王昭也和其他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到了祖国的广阔大地。可是由于受出身不好的影响，一直沉默在逆境之中。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支笔是周恩来总理让拿起来的，谁也无权让他丢掉。

生活总不是一种单调的颜色，在苦累中有乐趣，在灰蒙的天空中有几丝光明，在严寒的冬季里，也有青松的绿色。王昭在继续努力。

1978年，邓颖超同志直接关照，有关部门将王昭调回了北京。分到北京画院工作。王昭从此如鱼得水，大展身手。邓颖超和周恩来当年一样，做着默默的工作，她给金韞娱一家送去了古墨三方，上面还漾溢着古朴的芬香。

今天，末代皇族的后代人丁兴旺，溥仪的弟弟妹妹，子孙满堂。在他们的21个子女中，有闻名的医院大夫，有出色的人民教师，有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导演，也有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的国家干部。他们中，有15个大學生、中學生，有4人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令人感慨而赞叹的家族！

周恩来也是这样称赞他们：溥仪做过清朝皇帝，其他妹妹弟弟也都是清朝皇族，现在各人都改变了，都有工作，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

溥仪1962年2月曾写下这么一段话：

在阳光之下，地上有了生命。在一个伟大理想的实践中，我得到了新的灵魂，我的生命里注入了新的青春，我懂得了什么叫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我认识了世界和自己……

溥仪在进步，末代皇族在进步。

这些进步，倾注着周恩来的心血。溥仪曾在日记中这样表达：“总理对我真是慈父般的关怀。”这句话是他真心的写照，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虽然今天的人们已对“慈父”“慈母”般的用语不太习惯，可是我们如果从那个年代、那个特殊的时空来看，就不难体味到溥仪的心情，体味到整个末代皇族的心情了。

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溥仪和末代皇族。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接见中，他不仅对于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而且对溥仪及末代皇族的进步也给予了极大的勉励。

周恩来说：溥仪做过清朝皇帝，其他妹妹弟弟也都是清朝皇族，现在各人都改变了，都有工作，参加劳动，自食其力！这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

周恩来并不是只表扬不批评的人，他只是将表扬和批评处理得恰到好处，即使是严厉的批评，也让你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

有一段时间，溥仪感到自己差不多了，产生了自满自足的情绪。周恩来发现了，他先后几次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申伯纯转告溥仪：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

周恩来的话，在溥仪心里荡起了涟漪。他回过头去，仔细检查自己留下的足迹。他看到了自己的毛病，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后来在日记中，十分感动地写道：“总理及时提出来我有自满情绪，来挽救我，我一定改正这些毛病。”

溥仪对此难以忘怀，末代皇族的人们对此也难以忘怀。

溥仪先去了，嵯峨浩也去了。但他们怎能忘记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新中

国对他们的关怀，他们感谢不尽呵。

1964年11月的一天下午，溥仪突然尿血，医院责令他立即住院。当时，周恩来正好派人来接溥仪去参加一个临时决定的宴会，李淑贤将这不幸的消息转告了周恩来派来的同志。”

“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查清治好。”第二天，周恩来给全国政协打了电话，指示他们全力做好这件工作。接着亲自听取了溥仪病情的汇报，马上断定这样的尿血决不是一般疾病。当晚，立即召集泌尿专家吴阶平等一些著名专家进行会诊。

情况果不出周恩来所料，溥仪得的是恶性肿瘤，并已转移到膀胱了。周恩来再次指示申伯纯，一定要设法医治。

一年过去了，溥仪出了院，没想到“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又来临了。溥仪心情十分不好，又住进了协和医院。

这是国难当头的时候，周恩来有许多大事需要处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溥仪，特地指派著名中医蒲辅周先生来给溥仪看病。

那是12月29日，屋外大雪飘零，寒气逼人，虽然过一天就是新年了，可毫无迎新的气氛。

蒲辅周来到溥仪身边，第一句话便是向他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周总理很惦念。让来看看。”

这句话像热流一下涌遍了溥仪的全身，李淑贤也感动了，他们连声说：“谢谢！谢谢！”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去世了。周恩来又亲自派人来到溥仪家里，代表他表示慰问……

时间过去整整20年。1987年6月，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因肾功能衰竭，也离开了人间。

溥杰十分伤心，自从1985年春节过后，两年多来，他一直陪伴在妻子身旁。那是十分艰苦的日子。

溥杰已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开会、批文、接待外宾，每天都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他几乎每天在处理完公务后，就挤上公共汽车赶到医院去照料妻子，喂饭、喂水、喂水果，什么事都干，有的时候晚上还支上一张折叠床，睡在妻子旁边。

溥杰和妻子情深意笃，也因为嵯峨浩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1974年冬，溥杰夫妇东渡日本，首次探望他们在日本的亲属。12月10日14时26分，他们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

溥杰夫妇刚刚走下舷梯，日本记者便纷纷拥上前来，溥杰和嵯峨浩回答他们的提问，感想、家庭、行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机场上，溥杰也遇上了难题，伪满时代的日本军人的一个团体，闻知溥杰到来，专门打着这个团体的大旗前来欢迎。

当这个团体的代表请溥杰夫妇发表演说的时候，溥杰大声说道：“过去的溥杰已经死了，现在的溥杰是新中国的溥杰！”

下榻后，溥杰、嵯峨浩的朋友接踵而来。有个过去的朋友向溥杰夫妇提出了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的人，在那边恐怕没有个人自由吧？你们今后在日本长住怎么样？”他毛遂自荐，愿意给溥杰夫妇帮忙。

溥杰莞尔一笑，拍拍朋友的肩膀，他只是反问说：“你想想，像我们这样的人，今日能在日本见到你，没有自由能行吗？”溥杰“投桃报李”说：

“我希望你亲自到中国看一看，这个，我们也可以帮忙。”

这是一场朋友间的舌战。最终那位日本朋友服输了，他站起来向溥杰、嵯峨浩连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就在这次探亲全程中，嵯峨浩默默地给了溥杰很大支持，溥杰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现在，嵯峨浩离去了，这对溥杰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空白。

邓颖超听说了此事，派自己身边的秘书前来慰问。

溥杰流泪了，他深深地知道，家族里的事太让邓颖超操心了。从周恩来生前，到邓颖超现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呵！对这些，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话：感谢不尽呵！

1988年4月9日，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溥杰坐在主席台上，他不由自主地又一次向主席台正中的座位望去，他觉得周恩来的音容笑貌还在，仿佛还在向全国人民发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号召。

是呵，祖国在前进，祖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劈波斩浪，向着一个又一个新的目标冲击，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慰的大趋势呵！

在这个大潮中，在这个大趋势中，人们应该记住，在形成这个大潮的前浪中，曾有过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有过这么一朵耀人眼目的浪花——

这是一段永远值得人们怀念追思的往事。

这是一段永载史册有口皆碑的佳话。

（石肖岩）

跨越国界的友谊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1922—），民主柬埔寨主席。已故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和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之子。1955年9月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亲王出任首相。第二年西哈努克亲王首次访华，同周恩来发表了联合公报，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被作为今后指导中柬两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他执政期间，柬中两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编者

夜幕下的北京，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像一双双熟悉而热情的眼睛仰望着天空。1979年1月6日晚，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携夫人莫尼克公主和两位小王子又一次从金边匆匆飞回了北京，来到他的“第二故乡”。此时，“故乡”已是冬季，但西哈努克亲王却感到十分的温暖。一下飞机，迎接他的中国朋友们依然是那样的热情，回到“家”——反帝路15号，依然是那样的豪华、舒适而温馨。然而，在欢声笑语之余，一切收拾停当之后，他们似乎感到有点孤寂，心中好像有很大的缺憾。噢，是周恩来总理。如果他今天还健在，他也一定会去机场迎接，他会一直把他们送到家，然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可是，现在……莫尼克公主像是想起了什么，她走进书房，在自己的书柜上恭恭敬敬地设了一个神龛，他们要用自己传统的方式来悼念周恩来。

莫尼克公主在周恩来的遗像前献上鲜花，点着香，和西哈努克一起默默地悼念着……

北京的冬夜沉寂极了，时间一秒一秒地从手表上清晰地跳过。西哈努克亲王静静地站在那里，久久地端详着周恩来的遗像，思绪随着袅袅的香烟飘向那遥远的地方……

万隆会议上第一次相识

1955年4月中旬，印度尼西亚著名的避暑和旅游胜地——万隆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它以秀丽妖媚的风采迎来了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由渴望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29国第一次自行召开的国际会议。许多市民和游客走上街头，翘首期待着各国领导人的到来。苏加诺来了、尼赫鲁来了、纳赛尔来了、西哈努克来了……“啊，周恩来！”最令人瞩目的中国总理终于也来了。这些天来，人们对周恩来的到来既期待又关切。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去印度尼西亚途中被美蒋特务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炸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11人不幸牺牲。这一谋杀事件矛头是对周恩来总理的。碰巧周恩来总理应约先去仰光，改变了旅行计划，谋害周总理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周恩来的到来，不仅带有传奇色彩，而且使人们受到极大鼓舞。

来自佛教王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对周恩来传奇式地来到万隆，除了受到鼓舞之外，还对周恩来另有一种特别的好感。信奉佛教的人都知道，化险为夷，大难不死乃平时积德多年修来的福气。

西哈努克亲王过去并没有见过周恩来，但对这个新崛起的东——999——方大国的总理和杰出外交家的为人和才华早有所闻。而真正使西哈努克对周

周恩来直接了解和敬佩还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

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非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反帝反殖的浪潮日益高涨。当时帝国主义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他们阻挠会议召开的阴谋失败后，就转而利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隔阂进行挑拨离间。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不同倾向。有人在会上提出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所谓的“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矛头实际指向中国。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许多人对此感到忧虑。但是，周恩来沉着地听完了几乎所有的发言，一直到全体会议接近结束的时候，一面决定把原来的发言改用书面散发，一面在会场亲自起草稿子，即席发表讲话。

周恩来上台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立刻扭转了会场的气氛。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还以确凿的事实和有力的论据令人信服地回答了所谓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允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西哈努克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会场，他对每一位发言者的言辞和论点都作了一番思索、分析和比较。周恩来在会场上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周恩来刚才的发言，使整个会场顿时由暗转明，使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使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一切都使西哈努克对周恩来非常佩服。他回忆说，“万隆会议有4位超级巨星，他们是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位夸夸其谈的雄辩家；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一位才智多谋、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演说家；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一位具有胆略和气魄的非洲人；再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比以上三位都要杰出，是他的讲话把大家团结起来的。”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之后，西哈努克细细琢磨着中国“求同存异”的政策立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有了更新的认识和了解。假如说当时的西哈努克也曾受诸如“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之类的谣言所搅和而弄不清真相的话，那么现在他心中的疑团已开始解开。而后来他与周恩来的接触和交往更增加了他对中国的信赖。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是第一位主动与西哈努克亲王接触的人，当然，还有随同周恩来一起赴会的陈毅元帅。仅几天时间，他们三人的交往就已相当密切。有一天，周恩来要请西哈努克亲王吃饭，西哈努克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午餐之前，当西哈努克亲王抵达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别墅时，周恩来和陈毅已站在门口迎候他了。双方在会客室喝茶小叙之后，便入席就坐。

这是一桌隆重而丰盛的宴席。周恩来热情地为西哈努克夹菜，指了指桌上的菜肴说，这些都是他让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厨师专门为他做的，要多吃一点。西哈努克眼睛一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想这不仅仅是一桌精心烹饪

的佳肴，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周恩来对自己的态度，周恩来这般盛情和刚才那亲切友好的举止足见他对自己的尊重、重视和诚意。他微笑着频频向周恩来表示谢意。

宾主边说边谈，时而频频举杯，时而笑声朗朗，气氛热烈友好。周恩来高度评价和赞扬西哈努克亲王为实现柬埔寨的完全独立所进行的胜利斗争和不懈努力，尤其是对西哈努克亲王所奉行的不管别国的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只要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中立和领土完整，柬埔寨就和它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大加赞赏。周恩来还十分清楚地对他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尊重柬埔寨的主权和中立，永远不干涉柬埔寨的内政。

这席话像春雨入土甜甜地滋润着西哈努克的心田。

西哈努克亲王满面红光，兴高采烈。他品尝着每一样佳肴，觉得样样味美可口。唯独那浓烈的茅台酒有些难以接受，但闻起来却香气浓郁，给人一种梦幻而奇妙的感觉。常言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西哈努克虽然没有喝什么酒，但他确实醉了，他陶醉在友谊的海洋之中。周恩来的话使他强烈地感到，中国，这个世界大国和柬埔寨这个小国是平等的，而他和周恩来也是平等的。

西哈努克亲王还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从他第一次与周恩来接触就有了。那就是中国很希望同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虽然有这种想法，但他并没有要西哈努克立即作出决定的意思。周恩来清楚地告诉他，建交的时间问题完全取决于西哈努克亲王。这些都证明周恩来在相互尊重上确实言行一致。西哈努克当场决定邀请周恩来和陈毅就在当年访问柬埔寨，周、陈满口答应。同时，西哈努克也高兴地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在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访问中国。从此，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朗诺事件后更见真情

1970年3月19日凌晨，莫斯科气候突变，天空昏暗阴沉，乌云遮住了早起的太阳。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顶着寒风来到莫斯科机场，一架苏联客机早已等在那里。

飞机在空中盘旋之后，向北京方向飞去。大概是遇到了寒流，飞机不停地颤抖，在乌云中时隐时现，或高或低，弄得人提心吊胆。西哈努克亲王叹了一口气，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昨天他还是一位君主，今天一下子变成了平民。

是的，昨天，也就是3月18日，正当西哈努克亲王以国家元首身份在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时，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两位死心塌地的亲美派人物在金边发动了政变。这天一大早，金边的街头就出现了坦克，接着军队包围了议会大厦，国际机场被关闭，对外电讯联络中断。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开会决定，“撤销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信任”，“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不再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2小时后，西贡的美国电台向世界宣布西哈努克下台。

这次政变从表面上看似乎突然，但实际上政变的发动者和支持者蓄谋已久的。1969年8月，朗诺—施里玛达内阁上台后，施里玛达就职不到两星期就设法控制了外交事务，他指示所有柬埔寨驻外大使必须向他汇报工作，而不是向西哈努克亲王汇报，到了1969年12月份，施里玛达已设法把被认为是忠于国家元首的四名内阁成员清洗出阁，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为政变打下基础。

然而，这次政变的真正幕后人却是美国。由于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维护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不满，尤其不希望西哈努克与北越有关系。美国曾多次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要把柬埔寨纳入美国阵营，但西哈努克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便唆使政府中的右派分子——朗诺、施里玛达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美国参议员麦戈文也证实说，“美国一直在柬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同这个国家的右派集团有关”。到了3月11日，即政变前一周，金边发生了反越暴力事件，那时局势已急剧变化，朗诺集团和美国人的行动都已公开化。由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立刻宣布给柬埔寨167万美元的优惠贷款，又给了8万美元的赠款。在同一期间，一艘满载武器和军需品的美国轮船据说由于两名船员“哗变”驶进了柬埔寨水域。随后，美国的两艘军舰以帮助修理这艘轮船为名也开进了柬埔寨水域。另外，还有军舰多艘在柬埔寨领海外游弋。接着柬埔寨军队就用上了美国新式的M—16步枪。

政变后的第二天，也就是西哈努克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公开宣布，美国承认柬埔寨新政权，南越傀儡总统阮文绍也声称愿意同柬埔寨“恢复外交关系”。

西哈努克亲王对政变前柬埔寨国内局势的发展当然也清楚，3月11日金边发生暴力事件时，西哈努克正在法国，他是上月6日出国的。当西哈努克听到这一消息时，他说，这一事件是“右派和极右分子组织的”，“右派希望我们加入自由世界阵营，也就是美国阵营”。分析家们认为，当时，如果西哈努克及时赶回柬埔寨，哪怕是租一架飞机也好，那么，他就有可能控制局势。

可是，西哈努克却另有打算，他要通过访问法国、苏联和中国来对美国 and 北越同时施加压力。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访问还没有结束时，他已被废黜。而更叫他哭笑不得的是，访问竟然成了朗诺集团推翻他的借口。朗诺集团宣布废黜西哈努克的理由正是“西哈努克在最近几天中造成了政治危机”。

西哈努克坐在飞机上越想越气，越想越后悔。可是，路还得走下去。他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乌云，他闭上眼睛，心中是乌云一片。他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他似乎失去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流亡？政治避难？无家可归？他脑子里的问号越画越多。他累极了，闭上眼睛躺在座位上，随它去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飞机已平稳了。西哈努克睁开双眼，定了定神，窗外已是晴空万里。他又看了看表，大概快到北京了。北京又怎么样呢？那里有周恩来。想起北京，他的心头掠过一阵甜蜜的回忆。自从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和周恩来成为朋友后，他已多次访问过北京，不仅与周恩来的感情越来越深，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中国给他的印象是：热情、亲切、友好和隆重的高规格的接待。可是，那都是他当国家元首时的待遇，现在他已不是元首，他已落难。周恩来和其他中国朋友还会那样对我吗？

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西哈努克急切地向舷窗外望去。当他远远地看到那边站着黑压压的人群时，他沉重的心情已减轻了一半。而当他走出机舱，踏上舷梯时，北京的春风已吹散了他的愁容。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国政府重要领导人站在那里迎接他。西哈努克亲王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此时此刻，他心中的千言万语都倾注在这紧紧的一握和拥抱之中。他激动地把同机到达的亲属和随行人员一一介绍给中国领导人。夫人莫尼克公主、姑母诺罗敦·凯卡妮姬公主、莫尼克公主的母亲博夫人、

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宾努亲王和夫人、柬埔寨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西索瓦·梅达维亲王、国家元首技术顾问努呼中将和夫人……周恩来微笑着一一与他们握手，表示欢迎。

使西哈努克亲王高兴和更为惊奇的是，排着长队等待着同他握手的驻京外国使节竟如此之多：匈牙利、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阿富汗、挪威、瑞士、芬兰、也门、马里、丹麦、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瑞典、儿内亚、法国、越南南方共和国、叙利亚、越南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荷兰、伊拉克、苏联、南也门、摩洛哥、印度、缅甸、古巴、毛里塔尼亚、南斯拉夫、蒙古、波兰、赞比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老挝、朝鲜、刚果人民共和国、英国等国的大使或外交官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都到机场来迎接他

在一辆飘扬着中柬两国国旗的大型高级轿车里，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昨天晚上，我通知驻京所有外交使团，中国政府把你看作是柬埔寨唯一合法的国家元首。我告诉他们，我非常希望所有的驻华大使和临时代办都到机场迎接你。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天他们几乎全都来了。”

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进了西哈努克亲王下榻的宾馆，邓颖超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全。

这是一处庞大而豪华的别墅，靠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解放前，它曾是法国的公使馆。西哈努克亲王对这套住宅相当满意，后来也就成了他在北京的家，或者说，是西哈努克在北京的一座小“宫殿”，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服务人员，包括出类拔萃的厨师和花匠，有一个庞大的秘书处和众多的工作人员，并具有他在柬埔寨王宫中通常具备的服务设施——车队、运动场和自己的电影院。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都是周恩来亲自为他安排的。这种高规格的待遇使他感到他依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只是在中国延长访问而已。

是的，从西哈努克一下飞机开始，周恩来曾多次向他表示，中国只承认西哈努克为柬埔寨唯一合法的最高领导人。当然，这也要看西哈努克自己的态度。在西哈努克抵达宾馆稍事休息之后，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次认真、诚挚的会谈。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尊重西哈努克亲王所作的任何决定。关于昨天（3月18日）金边的政变，如果他自己想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中国将尊重他的意愿。但是，如果西哈努克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并且决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美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话，中国将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并向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除了军队。只要坚持这场正义的爱国斗争，亲王就会胜利。”“但是”，周恩来接着转达毛泽东的话，“必须提醒西哈努克亲王，这场斗争可能会很长，而且艰苦。有时他也许会感到泄气或失望。因此，大家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各方面的问题都必须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和研究。万一在斗争中遇到困难，西哈努克亲王是不可以回头的。西哈努克亲王本人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应反复掂量，深思熟虑。”

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方面的重视和关切十分理解。他自己也十分明白。他说，如果他在半途中放弃了斗争，不仅他本人和他的追随者会脸上无光，而且也会使中国遭到讥笑。因此，尽管他当时心里没有多少底，甚至有些自我怀疑，但他最后还是作了斗争到底的选择。他决定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他

必须继续担任柬埔寨国家最高领导人，接受外国的支持与援助，投身于解放祖国的斗争。几天之后，西哈努克在北京发表告同胞书和庄严声明，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任主席。他在告同胞书中写道：“反动派的背叛、无耻行径、卑鄙的诬蔑和攻击，使我擦亮了眼睛，并使我沉痛地意识到我的不可饶恕的幼稚和错误，在于我原来以为在这些堕落的知名人士、腐败的王族、法西斯分子、反动派，即金边现‘政府’和‘议会’成员之流的帮助下可以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繁荣和幸福的国家。”

“他们已经使我遭受和正在使我遭受的这一‘沉重打击’，对我是一个十分惨痛的、但又是十分有益的教训。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教训。”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的使命尚未完成，因为我决不能让叛逆的反动派依靠美元的力量和刺刀继续不受惩罚地践踏我的国家的理想、法律和基本方针。”

“我十分怀念我所热爱的祖国，我现在和将来活着，就是为了我所热爱的祖国。”

“我也非常怀念我可怜的母亲，怀念僧侣和我所热爱的人民。”

“如果我没有在斗争中牺牲的话，我一定在击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取得胜利的时候拥抱你们。”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侨居欧洲和欧洲附近的子民们（同胞们）如果愿意参加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话，就请你们来找我。”

一场新的斗争终于开始了，并且得到了世界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声援和支持。然而，这场斗争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是相当长而艰苦的。金边不可能在一日之内获得解放，他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回到金边，立刻恢复他往日的荣华富贵和直接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每当那个推翻并代替他的政权在金边耀武扬威、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消息传入他的耳际，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另一方面，西哈努克在北京的深宅大院之中，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但时间长了，心里感到过意不去。

每当西哈努克思想上出现消沉或者情绪波动时，周恩来总是耐心地劝他、安慰他。周恩来对他说，所有的担心和忧虑都是多余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切都会好的。只要耐心地等待，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那段时间，周恩来隔三差五地去看西哈努克，一个星期就去好几次。周恩来和他谈心、通报和讨论柬埔寨国内的最新局势以及国际上对西哈努克的支持等问题。

为了让西哈努克能在国际上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支持，周恩来建议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访问。那期间，西哈努克亲王先后访问了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乌干达和索马里。

为了使他不至于长期呆在“家”中寂寞，周恩来亲自安排，甚至亲自陪同他到中国主要城市去访问。所到之处都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欢迎和接待。

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中国旅行，周恩来都为他安排专机或专列。尤其是出国访问，有时还额外配备专门运送礼品的飞机。与此同时，周恩来每次都要亲自到机场、车站迎送。就是在北京，每次西哈努克从人民大会堂或者从周恩来家出来，周恩来总是一直把他送上车，等西哈努克的车子离开才回去。

西哈努克也经常到周恩来家作客，尤其是每次西哈努克的两个小儿子（一

个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留学，一个在苏联莫斯科留学）放假回到北京之后，周恩来都要请他们全家到自己家吃饭。

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套北京老式的房子里，面积不大，但安静、幽雅。家里的布置与摆设和主人一样朴素大方。除了墙上有几幅画、柜子里有些雕刻艺术品和几样老式家具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摆设和装饰。西哈努克喜欢去周恩来家里，是因为在周恩来家里他感到轻松愉快。周恩来夫妇热情、好客，每次都让厨师做些西哈努克最喜欢吃的法国菜，常常是中西餐结合。后来次数多了，只要西哈努克夫妇一去，厨师不用吩咐就知道该做些什么。

周恩来知道西哈努克最爱吃法国菜，所以在从上海为西哈努克挑选厨师时还特意安排了一位法国菜做得很好的厨师。此外，还吩咐把西哈努克的食谱用中法两种文字图文并茂地印刷出来发给厨师。

然而，在西哈努克眼里，周恩来自己却过得十分朴素。西哈努克说，“当你去他家作客或者看看他穿的衣服，你永远也不会想象得到你的面前竟是世界大国的一位总理。”

在西哈努克的印象中，周恩来的衣服不多，基本上老是那几件。但却非常干净、整洁。衬衣领子和袖口上打了补钉，但穿在他的身上不仅丝毫不影响他的帅气和风度，反而更令人敬佩。

“要说吃的”，西哈努克接着说，“周恩来除了在宴会上吃得好一些，并能喝上几杯茅台，但回到家里，他吃的相当简单”。

周恩来是这样一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共产党人；而西哈努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位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君主。可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呢？西哈努克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向周恩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你确实是一个地道的王子，但你真诚地爱着你的国家和人民，而且人民也爱戴你。你是柬埔寨唯一被人民所热爱和尊敬的最高领导人。因此，我们不是把你看作一位君主，而是把你看作是人民的象征，你属于人民。”

在西哈努克的记忆中，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和他讨论过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相反，周恩来曾这样对他说，“你们不一定非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你也可以仍然是位君主嘛。”

周恩来的这席话，当然也使西哈努克想起自从他在万隆会上认识周恩来、与中国建立关系后，中国曾派出大批科技人员和教师帮助独立后的柬埔寨发展工业和经济建设，但这些人也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方面去影响或干涉柬埔寨人。许多柬埔寨学生在中国留学回去后，也只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建设和经济发展。

西哈努克深信周恩来对朋友的真诚。这些年来，中国对柬埔寨正义斗争的援助和支持是无私的，无条件的。周恩来常对西哈努克说，援助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民自决。

1973年，西哈努克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600人的盛大宴会，欢迎他胜利归来。席间，当乐队演奏西哈努克谱写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周恩来放下筷子，专心致志地欣赏着，有时还伴着乐曲小声地哼上两句。这首曲于是1965年西哈努克亲工和夫人访华时作的。那天西哈努克夫妇在周恩来和陈毅夫妇陪同下游览了长江，当西哈努克在船上看到长江两岸秀丽的风景时，他激动不已，谱写了这首曲子，献给中国人民。周恩来在宴会上选了这首曲子并如此认真地欣赏着，除了对这首曲

子的喜欢，更重要的是他对西哈努克的尊重。

还有一次，西哈努克在天津度周末，当他作完一首圆舞曲——《阿，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之后，他很激动，让中国陪同赶快去告诉当时也在天津陪同几内亚总理访问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请他的国宾一起到天津音乐厅去欣赏这支曲子的首场演出。

1971年9月30日，周恩来送给西哈努克一张请贴，邀请他参加10月1日国庆节的午宴，然后，毛泽东主席将邀他到公园一起散步。

自西哈努克亲王1970年到北京之后，这是他第二次应邀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上次在天安门广场盛大、隆重的庆祝活动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这次似乎要简单一些。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准时赴宴，人们对他们的到来给予长时间的鼓掌欢迎。午宴快结束时，周恩来首先讲话，举杯对西哈努克夫妇来这里一起参加中国国庆节的庆祝活动表示感谢，并祝西哈努克亲王健康、长寿、胜利。接着是西哈努克祝酒。他按过去的习惯，首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然后才是祝周恩来总理健康。翻译十分流利地把西哈努克的话从法语译成汉语。译到“祝林副主席”时突然卡了壳，原来林彪已于9月13日在逃往苏联的途中机毁身亡。当时西哈努克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翻译尴尬极了、把目光投向周恩来求助。周恩来当然知道西哈努克刚才说了什么。但他微笑着向翻译点了点头，暗示要尊重客人，翻译必须忠实西哈努克的原意。这位翻译遵命译下去，但仍然显得十分别扭。

后来，当西哈努克知道林彪事件之后，他对周恩来更加敬佩。他想，要篡权的不仅在柬埔寨有，在中国也有。周恩来作为中国的总理，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劳。在处理国家具体事务方面周恩来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他永远忠于毛泽东主席。即便是“四人帮”要迫害他，他对毛泽东的忠心始终不变。他说，如果柬埔寨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来当领导人，柬埔寨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局面，就会遏制朗诺之类的浩劫。

回避尼克松

1972年的一个晚上，大约10点钟，周恩来派人来问西哈努克晚上有没有空，他想来西哈努克家聊聊，西哈努克当然很高兴。半小时后，周恩来到了。他告诉西哈努克，亨利·基辛格要来北京讨论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事。西哈努克吃了一惊，他完全没有想到局势会变化的这么快。因为不久前，中国各大城市还举行了反美示威游行，人们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焚烧“山姆大叔”的肖像。西哈努克暗暗想，这下子他在金边的敌人——朗诺集团该高兴了。他们肯定会觉得中美和好，中国一定会把我西哈努克丢在一边，转而支持他们的政权。

尼克松真的要来了，而且在基辛格的陪同下代表团还很庞大。西哈努克讨厌美国人，可是，中美解冻是他们自己的事，何况，中美和解确实不仅对他们两国有历史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局势也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怎么办呢？他索性离开北京，免得尴尬。因此，当尼克松到北京时，他已去了河内。

没想到尼克松刚回到华盛顿，周恩来就到了河内。周恩来是来分别向北越领导人和西哈努克亲王通报情况的。周恩来首先会见了北越领导人，主要向他们解释了中国对美国的新政策。周恩来说，中美改善关系将有助于导致

印度支那的和平、加速柬埔寨的解放及越南的统一和独立。

周恩来与越南领导人会谈之后就立即来到西哈努克的住处。

一进门，西哈努克就看出周恩来不但非常疲劳，而且面带愁容。原来越南人对北京与华盛顿解冻感到不快。

西哈努克看出周恩来的心事，便设法安慰他，对周恩来格外的热情。他说，中国此举确实也是为了使柬埔寨问题能尽快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这是毫无疑问的。周恩来告诉他，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他和尼克松会谈时都一再为西哈努克说话，并向尼克松施加压力，让他会见西哈努克，面对面讨论柬埔寨问题。他还强烈要求美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以便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由西哈努克来领导民族和解政府，使柬埔寨重新获得统一、独立和中立。但是，尼克松拒绝了周恩来上述的所有建议。说到这里，周恩来坚决地对西哈努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支持你和柬埔寨民族抵抗力量”。

最后的告别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终于获得了解放。那年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和英萨利夫人专程到北京来接西哈努克一家回国。离京前，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与乔森潘及英萨利夫人一起到医院向周恩来告别。当时，周恩来身体虽然很弱，但脑子相当清楚。当他知道西哈努克亲王终于如愿以偿，又能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国时，周恩来由衷地为他高兴，也由衷地为柬埔寨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解放而高兴，他紧紧地握着西哈努克和莫尼克的手，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周恩来还热情诚恳地和乔森潘和英萨利夫人谈了许多，他祝贺他们的成功，同时也祝愿他们的未来，真诚地希望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周恩来说，“我冒昧地劝告你们，不要一下子就想到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要谨慎，每前进一步都要考虑周到。如果过于激进，将只会给你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苦难。共产主义必须被理解为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不顾人民的思想 and 心态，抛开本国的实际情况，硬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那么就会冒险使整个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

西哈努克终于回到了金边。1976年1月，他出任民主柬埔寨政府国家元首。同年4月宣布退休。当他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悲痛极了。他曾要求去北京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能如愿。直到1979年1月，越南侵略军逼近首都金边时，他才得以再次来到中国。

月光为大地盖上了白纱，万物静静地沉睡着。西哈努克双手合十，在周恩来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老朋友，请接受这迟来的一拜，我们将永远怀念你！是的，从那以后，莫尼克公主每天都在周恩来的遗像前献花、上香，寄托他们对周恩来的永远怀念和哀思。

（刘爱成）

周恩来与罗别愁

格玛达莲娜·罗别愁（1899—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医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来中国。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并结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1968年留居联邦德国，任法兰克福德中友好协会主席

——编者

一谈起曾经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并与中国人民同心协力，为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做出贡献的外国人士，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埃得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而对于曾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捷克斯洛伐克国际友人罗别愁（MAG DA LENA ROBITSCHÉ——ROVA），知道的人却不多。其实，罗别愁不仅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帮助过我们，而且还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罗别愁1899年6月21日出生于捷克的卡洛维发利城。青年时代在莱比锡和布拉格两次获得牙科博士学位。在布拉格，罗别愁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1939年，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践踏了她的国家，破坏了她的家庭，仓皇中她领着十五岁的儿子逃亡到南美洲，后又转往美国。

在美国，当她得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正在为中国物色牙科医生，其宗旨是要帮助所有在二次大战中因抗击法西斯而遭遇不幸的人们时，她极力要求到中国去工作，借以实现她梦寐以求的去中国解放区的愿望。因为在布拉格时，她就看过新闻记者埃贡·埃尔文·基希所写的《秘密的中国》一书，“知道中国有着两个不同的地区”。凭着博士文凭和她自愿的申请，“联总”批准了她的要求。

1946年5月，罗别愁乘飞机到达上海后，“联总”即把她派往太原工作。但她认为在太原“不能做到”她“要做的事情”，“坚持要求”派她“到延安或烟台去”。经她“尽力争取”，再三致电上海“联总”办事处，终于批准了她到延安去的要求。去延安意味着主动放弃“联总”对她的照顾，并且要经受生活上的严峻考验，意志坚强的罗别愁认为“这一切算不了什么”。

1946年11月4日，中等身材，身体健壮的罗别愁搭乘一架小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当晚，傅连璋、苏井观两位卫生部长陪她共进晚餐。罗别愁表示，“虽然我晓得这里物质生活条件差，但我喜欢这里的民主”，我“希望尽我的力量，我不晓得能帮助多少，或者竟成为大家的麻烦”。傅、苏两位部长热情欢迎她来延安帮助我们工作。

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罗别愁参观了延安的白求恩和平医院门诊部，下午就开始和同志们共同工作了。她领导一个牙科诊所，每天上午给四十名学生教授牙科基本知识，下午为患者治病。11月11日、12月9日，她先后到抗属子弟学校和子长市为百余名干部、学生检查牙齿，讲解新法刷牙和口腔卫生的知识，对检查出病情的同志，次日就抓紧医治。她尽心尽力为普通老百姓看病。在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治病中，结识了他们，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毛泽东渊博的知识，朱德的朴素大方，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让她经久难忘的还是仪表英俊、才思敏捷的周恩来将军。

1946年11月，经马海德介绍，罗别愁结识了周恩来。在她听了周分析局势的谈话之后，对周恩来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当时，国共双方内战一触即

发。罗别愁担心，国共双方交战，共产党要吃亏，因国民党不仅拥有较好的武器，而且得到外国援助。共产党却十分艰苦，且武器装备也很落后。事后罗别愁回忆说，周恩来的谈话，几乎是直接对着她的想法讲的。“他的两眼洋溢着智慧之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你，语言生动、机智，令人信服。他不时地爆发出一阵洒脱的大笑，脸上烟诏生辉。他如磁力强大的一块磁石：坚实有力，能抓着你，把你吸过去。”周恩来的讲话，驱散了罗别愁心头的疑云，也坚定了她同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正是由于罗别愁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作风的影响，受到延安军民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民主作风的感染，并亲身感受到“一个年轻而健康的社会……正在奋斗以摆脱困苦”，才使早已心灰意冷“对世上之良知已不抱希望”的她，心头“重又燃起……乐观主义的火花”。因此，这位习惯于近代文明种种舒适条件的捷克女博士，不但能适应陕北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而且还经受了战争和死亡的严峻考验。即使在接到“联总”的调令时，她仍然一方面致电，一方面还亲自到北平“联总”办事处交涉，要求延长其在延安的时间。由于她留延之心异常坚定，也由于周恩来和苏井观从中斡旋，“联总”终于同意她回延安再工作三个月。

1947年5月，“联总”安排的限期已满。罗别愁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晋绥解放区。临行前，贺龙将军设宴欢送，并赠予绣有“热爱中国人民”六个大字的红绸锦旗一面，以示感谢。

1947年年底，罗别愁辗转到达上海后，又经巴黎、瑞典、波兰，直到1948年2月才平安回到布拉格。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底，罗别愁生活、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中间，总共不到七个月。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这只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间，然而却使她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罗别愁回国的第三天，即1948年2月18日，发生了捷克的二月革命。由于罗别愁操德语，又是犹太人，因此，朋友们疏远她，工作待遇上也受到冷遇，加上亲属的亡故，这一切更激起了她对中国的怀念。中国人民何尝不惦念罗大夫。卫生部的负责同志曾写信给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证明罗别愁曾在中国解放区忠诚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政府部门也多次邀请罗大夫重到中国来。

罗别愁大夫是多么想看一看新中国，看一看她一生中最难忘的土地和人民啊。她盼啊盼，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但不是她访问中国，而是周恩来总理访问捷克。那是1953年3月14日，继斯大林逝世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同志逝世。噩耗传来，正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立即致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瓦茨拉夫·戴维，向捷外长及捷克人民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并于17日晨，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捷克，参加哥特瓦尔德葬礼。1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偕同郭沫若等到捷克总统府向哥特瓦尔德遗体告别，敬献花圈，并在灵前守灵。

听到这些报道后，罗别愁激动万分，于3月18日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知道你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参加我们亲爱的哥特瓦尔德总统的殡仪。我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和我国那些欢迎你的人，一同去欢迎你……你亲自代表我在我国时所热爱和钦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来访问我国，表示同情。这一事实，就是我们这些悲哀的日子里的很大安慰，而且我知道许多朋

友都跟我有同感。”“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捷克女牙科医生），我曾在 1946 年秋来到延安，在第一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先在延安后在山区里工作。如果你不记得我，请不必介意我给你写的这封信。知道你在我国内，我很希望有机会亲自见到你和你握手。”

遗憾的是，周恩来公务繁忙，没有能和罗别愁大夫见面，但他怎么也忘不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

4 月 30 日，周恩来给罗别愁写了回信。

亲爱的罗大夫：

你三月十八日的信收到了。

我很遗憾，我这次到捷克参加哥特瓦尔德总统的葬礼时未能遇见你。对于曾经在战争的艰苦年代中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致以亲切的问候！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

周恩来的信，给了罗别愁极大的安慰，温暖了她的心。她越发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了。当她得知 1959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消息时，4 月 29 日立即致电周恩来。电文中说：“请接受我对你的再度当选所表示的最热烈的祝愿”。“作为人民中国忠实和真诚的朋友，我再次表达我的良好祝愿”。“祝你身体健康，以便能担负你面临的重大任务，并且取得更多的成就”。

5 月 15 日，周恩来写给罗别愁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玛格达莲娜·罗别愁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承来函祝贺，谨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我的同志们经常愉快地回忆起你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与中国人民一同进行艰苦斗争的情景，并十分感谢你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祝你身体健康，并在为人民造福的医务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邓颖超同志向你致意。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于北京

罗别愁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终生致力于反法西斯、反非正义战争的运动，虽年事已高，仍自强不息。周恩来的两封诚挚热情的信，以及我驻捷使馆派人对她的探望，更激起她尽早访问中国的热望。她急切地希望率领一个医疗小组和携带设备到新中国建立一个诊所，为联结捷中友谊的纽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960 年，她向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递交了一封申请书，动情地历述了她受“联总”派遣，自愿到中国解放区，在延安第一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情况；以及回国后，在众多亲朋惨死于德国法西斯集中营中，自己

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却“终身工作不息、两袖清风”的情况。最后，她殷切地要求重访、考察中国。因为她“热爱并尊敬这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她感到“和他们已结为一体”，而且“十五年前的情况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现在，她还可以出上一把力”，使联结捷中“两国友谊的纽带结得更牢”，“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她郑重指出，“当时我是中国红军中唯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倘若你们承认我毕生为反对侵略战争，反法西斯而付出的努力，倘若你们能肯定我的一点点贡献，从而把我派到中国去，我将不胜自豪与感激。”但她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

1968年8月20日，罗别愁到西德探亲，后来定居西德，进了西德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社团养老院，不久成为法兰克福德中友协主席。

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用录音机，把对中国的回忆录在磁带上。即使在她的健康日益衰弱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中国，怀念中国的领袖和人民。当西德朋友埃林问她：“回忆在延安的那段时光，你觉得哪些东西经久不忘，印象最深？”77岁高龄的罗别愁回答说：“我在延安能有机会认识战斗的中国的领袖人物，印象迄今难忘。……但是，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是普通的中国人。”可是罗别愁再也没有精力长途奔波，重访中国了。捧着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信，她激动万分。在她离开人世前的一个星期，她还到波恩的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祝贺我国国庆。罗大夫遗嘱的最后一项，是嘱托忠诚于德中友谊的埃林，把她珍藏的一些中国革命文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送她的照片，周恩来、朱德写给她的信，贺龙将军送她的锦旗等，转送给中国。1977年10月10日，国际友人罗别愁离开了人世。

（刘春秀）

